

中共党史资料

忆参加援越帮助土改的岁月
彭真与建国初京郊土地改革
“大跃进”在安徽亳县
我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
雷任民与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
陶铸与汤池训练班
1924—1929年的苏中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75

总第七十五辑

2000年9月出版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七十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北京

主 编：李海文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常务）
文献编辑：王晓峰
执行编辑：刘荣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75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9
ISBN 7-80136-352-3/K·308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K.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7181号

中 共 党 史 资 料 (75 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北门10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7.375印张 170千字

2000年9月北京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ISBN 7-80136-352-3/K·308

定 价:10.00元

目 录

文献资料

- 关于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政策的几组文献 (1)
- 邓子恢向毛主席的第一次报告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六日) (1)
- 邓子恢向毛主席的第二次报告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2)
- 王首道向毛主席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六日) (1)

回忆录

- “大跃进”在安徽亳县 梁志远(5)
- 我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 黎 白(32)
- 忆参加援越帮助土改的岁月 周星夫(17)

专题资料

- 彭真与建国初京郊土地改革 赵友福(59)
-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认识和思考 张士义(76)

- 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 鹿 松(93)
- 1949—1952 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状况的历史分析..... 向 新(107)

人物介绍

- 雷任民与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 何仲山 李军晓(122)
- 陶铸与汤池训练班.....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153)

史实考证

- 红军师长侯中英赣州战役后的情况..... 文 生(160)
- “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 穆 欣(166)

小 资 料

- 华北财经办事处..... 许卿卿(171)

民国史·现代史

- 司徒雷登与美国百年侵华政策的破产..... 王 森(182)

译 文 选 登

- 1921—1929 年的苏中外交关系
..... [俄] П. И. 彼斯科娃 著 李 颖 译(204)

关于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政策的几组文献

编者按：保存富农经济是建国初期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实行的一项新政策。它对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顺利完成土地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土地改革实践中通过调查研究和民主协商制订出来的。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致电各大区中央局负责人，征询对富农政策的意见。各大区中央局和各省、市、区党委就此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并将收集的各方面的意见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本辑刊登的是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3月16日、3月25日给毛泽东的两次报告和湖南省政府负责人王首道3月16日致毛泽东的电报。

这几组文献按照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在此首次公开发表。为保持历史文献全貌，本辑编发时仅作了最必要的技术处理。

邓子恢向毛主席的第一次报告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六日）

电奉悉。当与各省同志商谈，并核算豫、鄂、湘、赣四省十个村的土地调查材料，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我们了解不动富农的具体内容是不动新式旧式富农的自耕土地与所有财产，但对旧式富农出租土地及新式富农租佃来的

土地,应拿出来分配,实行新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地分配原则,即中农、富裕中农、新式富农、旧式富农的自耕土地不动,而将地主与雇贫农及手工业者的土地打乱平分。反动富农财产则应没收。

(二)如按这种办法,照四省十个村的材料来看,则雇贫农所得的土地比之全村人口平分土地的数量要少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比之过去中间不动两头平(即中农不动,地主富农与雇贫农平分土地)所分土地要少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因此,这对雇贫农的土地要求基本上仍可解决,住房粮食亦可解决,所较难解决者只是牲口、农具,这只有靠雇贫积蓄、政府贷款及社会自由借贷来解决。

(三)根据上述了解与材料分析,我们完全同意主席所提不动富农的方针。这在政治上极有利,而对雇贫的基本要求又大体可以解决。但旧富农出租土地与新富农租佃土地,必须拿出来分配才能解决雇贫农的问题。据王首道同志材料,湖南富农占有百分之十五至三十的土地(滨湖一带富农占土地百分之三十左右,邵阳、衡阳一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湘西、湘南占百分之十五)。如全部不动富农土地,则无法满足雇贫农要求,对我依靠贫雇巩固人民政权不利。

邓子恢向毛主席的第二次报告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中央召集各大行政区负责同志商讨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时候,我再提供下述意见供参考。

一、我主张,在新区土改时,对地主政策不变,仍是没收其土地及其牲口、农具、房屋、口粮等四大财产,其他财产不强调,不扫地出门,不挖底财。对富农之所有财产及自耕土地不动,但其出租土地及佃富农之租佃土地,应交农会分配。佃富农土地不够者,亦应

与雇贫农一起平分。富农在解放前所放之高利贷，应该按减息条例处理，解放后所放之债不加取缔。没收地主土地及富农出租之土地，由地主、雇贫农、农村工人等按人口平分之。

二、上述这种办法有几种好处：

(1)可以少树敌人，孤立地主，减少震动，减少叫喊。

(2)便于划阶级(只要把地主划出来，其他富农、中农、贫农划不清不要紧)。可完全避免侵犯中农毛病，避免中农动摇。

(3)可以保持富农生产情绪，保持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保持农村生产力。

(4)更可以稳定工商业。

(5)对雇贫农土地要求基本上还可以解决，理由见前电^①。

三、是不是可以连富农出租土地都不动？我认为不可以，因为这样会发生下列毛病：

(1)难以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难以说服雇贫农；而满足贫雇是土改的基本目的，贫雇农是我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依靠。此次湖北省农代会一千二百个代表没有一个赞成不动富农之提议的。

(2)如把地主富农的出租土地都拿出来分配，这很简单；如只分地主土地而富农出租土地不动，则又要先将富农划清楚才可以分，反增加划阶级之麻烦。

四、如果此次订出新的土地法，执行时要求将河南除外。因为河南土改条例已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现在又已经省农代会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并在各地开始实行；河南土地是北方性质，不同于南方各省，土地比较分散，一般地富土地只占总土地三分之一左右。因此，主张河南仍照已批准之土改条例实行，不再改变。

上提各点妥否，望考虑。

① 即邓子恢 1950 年 3 月 16 日向毛主席的第一次报告。

王首道向毛主席的报告

毛主席并告林李¹：

我看了毛主席提议，暂时不动富农（包括半封建富农）的电报后，认为对目前新区土改是很有利的，对新区工作防止混乱可以取得主动。

第一，在目前干部数量质量不足，农民觉悟与组织各方面薄弱的情况下，更有必要。

第二，广大农村经过长期战争与灾荒之后，农业生产普遍降低百分之三十以上，如暂不动富农，对迅速恢复生产有利。

第三，有一不利条件，据一般材料，湖南富农占有百分之十五至三十的土地（滨湖一带富农占土地百分之三十左右，邵阳、衡阳一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湘西、湘南占百分之十五），如全部不动富农土地，则无法满足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要求。对我依靠贫雇农，巩固人民政权不利。我主张对半封建富农出租部分土地，可以分配，其余富农自己经营之土地及全部财产不动。是否妥当？请考虑。

王 首 道

十六日²

¹ 林即林彪，时为中南局第一书记；李即李雪峰，时为中南局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² 即1950年3月16日。

“大跃进”在安徽亳县

梁志远

原亳县(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边陲,西、北、东与河南省接壤。全县总面积 2200 平方公里,1957 年耕地为 273 万亩。亳县农业以麦豆为主,同时是以亳芍、亳菊为主的药材之乡,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从 1958 年 5 月“大跃进”开始到 1961 年 6 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下达,亳县大刮了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加之受 1959 年旱灾的影响,广大农村普遍发生了荒、逃、饿、病、死等现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在三年“大跃进”期间,我先后任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农村工作部生活福利科长,在机关上报下达,到农村蹲点跑面,对当时亳县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至今还记忆犹新。作为见证人之一,为使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汲取历史教训,我根据保留下来的近百万字的《农村工作笔记》,就“大跃进”在亳县的一些情况作一回顾。

浮夸风与“高产卫星”

1958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大跃

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个方面开展起来。就是这时,亳县在继续反右派斗争中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上半年在农业上批判“条件论”、“增产到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接着到处“拔白旗”、“插红旗”,大抓“秋后算账派”。

1958年6月14日谭震林副总理来亳县视察,见亳县谷子、秫秫(高粱)面积大,提出搞谷子、秫秫“挂帅”(高产)。县委随即当作政治任务向全县发出号召,并放任纵容,全县拔掉谷子、秫秫三类苗几万亩,留一类苗作为“挂帅田”,二类苗作为“丰产田”。

7月28日县委发出了为“迅速培养大豆丰产田的指示”,要求“丰产田”亩产1000斤,“挂帅田”亩产3000斤,“卫星田”亩产10000斤。而1957年全县亩产平均是101斤。

9月27日,亳县召开党代会,县委负责同志宋××在工作报告中宣布:1958年预计粮食总产24.9亿斤,比1957年实产提高4.92倍。皮棉亩产100斤,总产1300万斤,比1957年提高近4倍。油料总产可达8900万斤,比1957年增产8300万斤。9月30日,党代会作出决议,保证全县今年要成为粮食亩产“千斤县”,明年成为粮食亩产“万斤县”。

10月,县委为适应“大跃进”形势的需要,成立了“跃进”办公室,抽调干部十余人,由县委直接管理,专门掌握各类“大跃进”数字和情况。县人委统计科和有关部门的计划统计资料,均以“跃办”材料为标准,上报下达统一口径,助长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浮夸风。

11月7日,县委发出《关于培养小麦大面积丰产与卫星田的指示》,要全县培养小麦亩产3—5万斤“丰产田”70万亩,5—10万斤“卫星田”7.8万亩。

1958年秋收期间,各类农作物掀起了竞放“卫星”的高潮。县委提出全县13万亩水稻预产每亩1500斤,并在《阜阳报》上公布。

当时高估近五倍的产量,并不能满足浮夸的需要。县委积极学习外地的“经验”,决心放出惊人的“卫星”,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搞亩产超4万的并田计划。县委除有一位负责同志坐镇指挥外,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多次前往具体安排。社队也建立了专业班子,日夜突击,把一百零几亩黄熟前期的水稻,移并到1.3亩多的水田里。

并田移栽的方法是:先在地里打梗、深耕、施肥、灌水、活田,打上横竖成行、距离相等、出地面不足一米、高度一致的硬杂木桩,约10平方米为一方。后在边行木桩上紧紧牢固地缠系铁丝,再拉一行行竖铁丝,形成胡同式的铁丝行。接着顺着胡同挤栽移来的水稻,栽够一方时,用木板挤、铁棍撬,以挤实为标准,拉上一条横铁丝,这样反复进行,栽出了一个用铁丝、木桩网成的水稻“卫星田”。最后田边上再栽上青草,以表其实。

这块“卫星田”造好后,县委随决定组织县直和社队干部参观。参观人群连续多日不断。参观者有不少人在“站”稻穗上合影留念。泥店大队也搭棚设灶,杀猪备酒,招待参观客人。

为使自己的“卫星”放在其他地方的前面,稻还没有收完,县委负责同志就提出了向省、地委报喜的提纲,交农业局干部起草,并要求“卫星田”亩数字要到毫,产量到斤。收获脱粒结束,县长亲自到场,县委负责同志亲自过磅,最终这块1.389亩的“卫星”水稻,总产56683斤,亩产40808斤。县委在稻谷场上召开了庆祝大会,奏乐鸣炮,三级书记讲话,大吹一通。

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为《亳县报》写了社论,报社记者连夜赶写了题为《稀罕稀罕五马水稻亩产超过四万大关》的长篇通讯,以号外专版发表了这颗特大“卫星”的消息。《阜阳报》和《安徽日报》都及时刊登了这一消息。

之后,全县水稻、红薯、棉花、油料等作物并田成风,双万斤薯、千斤棉等不断涌现。向县委、县人委各种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其

中贴在竹木架子上的喜报，堆满了县档案馆西厢库房，在确实涨库无法时，县委才决定焚烧。

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成绩，县委要农业局将农作物“丰产”、“卫星”情况汇集成册，印发社队，广为人知。

由于浮夸成风，大幅度虚报农业产量，亳县在省地的知名度大为提高，1958年加入了阜阳地区农业高产县的行列，五马公社以农业高产夺得了全县的帅旗，泥店大队为放“卫星”立了大功。1959年10月，县委负责人和泥店大队负责人均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国务院向亳县和泥店大队颁发了奖状。

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7日到17日，原有71万农村人口、9个区、40个乡、241个高级社的亳县建成了13个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团），下划分153个大队（营）、1345个生产队（连）和若干生产组（排）、生产专业组（班）。同时以自然村或以生产队、生产组为单位建立了农村公共食堂，多以大队为单位建立了敬老院、幼儿园、妇产院、小农场、火箭连、饲养场、铁木厂、缝纫厂等单位。各种活动室如党员之家、团员之家、妇女之家、民兵之家等也相继建立。

人民公社成立的同时，亳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全县城乡红旗招展，诗画满墙，大力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男婚女嫁，由公社统包下来。公社实行供给制，社员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过共产主义生活。

由于供给制需要大量的物资和钱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也

刮了起来。原高级社和社员的一切财产，如高级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粮、款，社员的房屋、树木、自留地及锅、碗、瓢、盆都归了公社所有。原高级社不管经济条件和贫富差别，一律拉平，多不退，少不补，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对社员的家畜家禽，多数公社限期集中办饲养场，最短的是十九里公社，规定一天一夜集中起来。集中起来的畜禽普遍饲养差，不少传染疾病死了。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养鸡场集中 2000 多只鸡，不到一个月就全部死光了。

在大刮共产风中，各部门乱箭齐发。银行实行存实贷实，连地里的庄稼也算上了存款，强迫储蓄，强收贷款，税务部门拉平调税，乱抵税款。收购部门所收农副产品一律实行非现金结算。张集公社财贸部竟印制了“张钞”，在社内流通，抵发社员的工资或用于在公社供销社购买物品。该公社党委一位负责人说：“我一个公社照样到共产主义。”

9 月 27 日，县党代会在决定大放高产卫星的同时，作出了全县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利河网化、深耕园田化、植树园林化、城乡沼气化、工具改良轴承化、公路砂石化、学校工厂化、工厂学校化、人人学文化、语言普通化、诗歌漫画满墙化、积肥经常化、体育运动全面化、干部劳动经常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十五化”的决议，并提出大办钢铁、水利、民兵、福利、文教、机床、档案等十个“大办”，但惟独没有大办粮食。

为全面贯彻执行党代会的决议，县委宣布了“全民皆兵”，县为民兵师，县委、县人委分别为师党委和师司令部，县委、县人委办公室合署办公，公社以下均为军事组织名称。各项战斗任务均在全县范围内展开。“月亮当太阳”、“黑天当白天”、“雨天当晴天”等战斗口号响彻全县。

与此同时，全县实行全民搬家，村庄合并，男女分开，集体住宿，按时上操，进行军事训练，生产一律实行大兵团作战。一般不大

的农活也要班、排、连行动,动不动就是苦战几昼夜。大活大轰隆,小活小轰隆,时而人海战,时而无人管,生产受到严重损害。大杨公社郭万大队 21 个村并为 4 个,居住拥挤,场地、田间住了不少人。刮风下雨齐哭乱叫,有的骂干部害人,有的说没打仗像跑大反一样。这个大队,秋收时许多红薯根本没收,秋种任务到“立冬”还未完成,抛下了许多白地,不久即出现全面饥荒,大部分社员陷入了极贫困的境地,人民公社由“一大二公”变成了“一大二空”。

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8 月下旬,亳县开始大力宣传大炼钢铁,让钢铁元帅升帐。9 月 30 日,县党代会作出决议,提出要完成 1380 吨的大炼钢铁的任务。

10 月 27 日,县委下达了《关于分配炼钢任务的指示》,指出“为早日赶上和超过英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加强国防建设,党中央、毛主席指示要大炼钢铁,我们必须全党全民动手,马上掀起一个炼钢运动和土法炼钢高潮,让百吨‘卫星’早日上天。”同时规定:(1)土炼炉在三天内按分配任务完成。(2)每炉 16 个劳力,日夜生产。(3)一切工作以钢为纲,全力支援钢铁生产。(4)全县分配土炼炉 700 个,参加 4600 人,炼钢任务 1900 吨,日进度 147.5 吨。

指示下达后,县委要求每天汇报一次任务完成进度,并几乎每天召开一次电话会议进行评比。大杨公社要求每一小时汇报一次炼钢情况。全县几天内建土炼炉 2000 多个,参加 20000 余人,砍伐了大量树木,开炉生火炼钢。县委、县人委机关的土炼炉,由县委第一书记亲自点火,县长亲自鼓风,搞了几天几夜,炼出的尽是废料。

正当县委急需先进典型总结推广经验的时候,11 月 9 日大杨

公社放出了建立土炼炉 201 个、炼钢 12 万斤的大“卫星”。县委及时发贺信通报表扬，并向地委报喜。地、县准备召开现场会，派人前去检查总结经验，经查实际建土炼炉 50 个，炼钢 1.2 万斤，大部分大队数字都是空白。原报喜数字中，公社明知有假，又多加报 12 万斤，并让供销社给开了收购新炼钢的假发票。虚报最多的第三营（大队）负责汇报人员说：“这叫以虚代实的跃进数吧！”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随声附和并叫以后再补。地委严肃追查，县委无法交代，被迫给大杨公社党委书记崔××和供销社主任纪××以党内警告处分。

全县大炼钢铁的原料，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群众献的废铁，二是公社食堂收的农民的饭锅，三是供销社收购的废铁，燃料多是砍伐了的硬杂木树，结果炼出的钢铁全是次品和废品。到 11 月底，难以为继，在无奈中全县大炼钢铁运动草草收了场。

阜阳地委继 10 月份由各县出人出资在凤台县建起了炼钢厂后，于 11 月份又一次向各县紧急集资，再次分配给亳县集资款 130 万元，人均近 2 元，限期 11 月底完成。11 月 7 日，县委发出集资的通知，对农村规定：“资金来源：公社集资和发动群众集资，开展全民投资运动，要第一书记挂帅，做到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发动群众自报现金及金、银、铜、铁、锡等金属及其他各种易售的实物，售后由银行办理手续。”通知下达后，全县农村集资炼钢运动又掀高潮。由于公社化初期“共产”风乱刮，各种形式的集资搞过多次，致使在这次集资中许多农民已没有多少现金和金属之类的东西可以拿出，他们被迫变卖了各种易售的物品。市场上家具用品的价格大跌。如一对半新的大门只能卖 2 元左右，一张半新的老式雕花双人床仅 3—4 元，一张坚固的棕床仅卖了 5—8 元。

亳县的大炼钢铁运动，正如一首打油诗所云：砸锅献资千万家，大炼钢铁见火花，月夜苦守土炼炉，产品多是废炉渣。

罕见的秋收秋种

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一哄而起之时，正是秋收的黄金季节，而这年的秋收是最粗放也是最浪费的一年。不少成熟的黄豆炸在地里，晴天中午可不断听到响声；成熟的玉米棒颈枯干，垂吊在秸秆上；盛开的棉花，挂满枝梢，无人采摘，被在棉田里大便的人用作手纸；春红薯收的不净，夏红薯收的迟，由于天气冷，就地人窖，不少冻烂在地里。所以，农民有顺口溜说：“豆子乱放炮，棉花像穿孝，棒子（玉米）上了吊，红薯就地窖，小红薯都不要。”

秋收损失如此严重，主要原因是：1. 领导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反右倾、争上游、放“卫星”、大轰大嗡和秋种上，放松了秋收；2. 劳力大量被省、地上调，主要劳力用于大炼钢铁、大搞小麦亩产千斤运动、水利运动提前上工等；3. “一平二调”损害了社员的利益，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只知道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不爱惜粮食。

1958年的秋种，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全县掀起了小麦亩产千斤运动的热潮。在整地上越深越好，施肥上越多越好，下种上越密越好。其中心点是“一深”、“二高”。

“一深”就是深翻土地。要打破耕作层，深耕一尺二寸。对“丰产田”、“挂帅田”、“卫星田”分别深翻2—5尺。

“二高”就是高指标和高密度。小麦计划产量指标，由1957年的亩产101斤提高到亩产1000斤。对“三田”（即“丰产田”、“挂帅田”、“卫星田”）要求亩产2000斤、3000斤、5000斤、10000斤、100000斤。每亩下种量：大田40斤，“三田”分别为100斤、200斤、300斤、500斤、600斤……当时有人按越密越好的“理论”计算，下种千斤以1收10，就可亩产10000斤。这年小麦的下种量超过了

平常年份的亩产，一时难以筹集到如此多的种子。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县委对社队做了部署：

一、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挖麦种。县委指出，“秋种是一场恶战，每个公社要写上万张大字报大挖麦种，对典型人物可用漫画，要同时开展大辩论”等。公社、大队都办了有小麦种嫌疑户集训班，用大字报、漫画、批斗、吊打等多种手段逼迫交出麦种。十九里公社有一个大队竟把人放在缸底下用硫磺熏，以致把人眼搞瞎。魏岗公社为挖麦种扣押 100 余人。张集、古城、十九里等公社都出现了为挖麦种导致农民自杀事件。

二、实行大兵团作战，秋种“十到田”。即在田野里建灶、搭棚，干部、食堂、住宿、托儿所、医务室、铁木工、物资供应、学习、宣传、文艺活动全部在田间，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少、壮一齐上战场，到田间参加秋种。田野里到处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战斗口号此起彼伏。劳动时虽按编制进行了分工，但仍是一片混乱，时而麻雀战，时而无人干，耕作粗放，马虎了事。

这种形式主义，劳民伤财，无助于提高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由于大轰隆，许多社队耽误了农时，早茬变成了晚茬，“霜降”过后，不少社队抛下大片白地，只好提前虚报完成了秋种任务，导致 1959 年全县夏收作物的实收面积只有 122 万亩，比 1958 年麦收作物面积减少 63 万亩，总产减少 5000 万斤。

三、要大种“三田”。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挂帅，夜以继日，大干特干。在县委第一书记的带领下，县直机关干部在城南七里板桥口大种“三田”，深翻土地最深的 5 尺，将生地都翻上来，分层施肥后高出了原来的地面，下种量最多的每亩 100 斤，出苗后又密又黄。各社队的“三田”大致也是如此。不少社队不得不采取疏苗、搭架等措施，虽代价昂贵，但收获寥寥。全县的实产没有向干部、社员公布。

大 办 水 利

早在1957年9月24日,为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亳县以高级社为单位以开挖水塘为重点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

1958年9月27日,县党代会提出了十个“大办”,其中就包括大办水利,提出“两年实现河网化,誓把淮北变江南”的战斗口号,并把河网化工程提高到共产主义建设的高度来看待。

1958年10月20日,全县的河网工程全面展开,20多万的劳力被抽调去挖河、打塘、筑路。当时较大的工程是亳涡(涡阳县)公路,抽调劳力几万人,采取“河成路就”的方法,先开挖亳县到城父的引水干渠(亳城河),10月28日起在渠岸上修筑长37公里、宽28米的亳涡(涡阳县)公路,仅月余便完成。与此同时,开挖龙凤、油?名一、油?名二、亳宋、亳永、大观、安芦等数条大河,20余条大沟和部分小沟。

1959年2月全县水利枢纽工程大寺闸破土动工,由于人力、财力困难,“大跃进”期间仅完成土方87万立方米,混凝土7000多立方米,1961年被迫停建。该闸经过三上三下,到1978年才完成主体工程。

1959年10月8日,全国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全县的河网化运动再次全面展开,接着上年度未完的工程进行大干。

亳县的水利建设,其任务之重,要求之急是前所未有的,其失误也是严重的:

1. 工期时间长,任务要求高,对人力、物力损害巨大。当时的水

利建设,工期一般从当年10月中上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时间长达近半年,而且是日夜苦战。这段时间大多数月份又处于冬季,在地冻天寒中,民工劳动付出是巨大的。而每当春节时,民工不仅得不到休息,还要搞“突击”,当时喊出的口号是:“挖河挖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再动手”、“打塘打到年初一,吃了饺子不休息”等。

不仅如此,民工的日工作量也被定得太高。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民工日均只能完成土方1立方米左右,但由于上边的压力,工程开工之初,一般要求每个民工每天完成土方20立方米,五天之后要求完成25立方米。全县一个年度的总土方量要达到1.2亿到1.6亿立方米。这样就不得不浮夸虚报,往往一条河开工几天,就把应完成的土方报完。由于工期长,要求高,加之口粮不足,一些民工身体消耗大,全身浮肿,体力不支,大病一场,甚至死亡。后来不得不提出“水利工地牛群化”,在工地上使用了大批耕牛运土,但由于饲养差,使役重,死牛现象也不断发生。

2. 上工早,上工人数多,影响了农业生产。水利建设,一般是利用农闲季节,在冬春进行。但在亳县,一般是在10月中上旬开工,而这时正是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候。上工的人数虽是先少后多,但到11月20日左右,一般达到20万人,11月下旬最多达到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5%以上。不少生产队除饲养员、犁地手和较弱的劳力以外,其余全都上了工地。这不能不使秋收秋种、冬季生产和积肥受到严重影响。

3. 盲目大干,影响了水系。当时大办水利,只注意了满足大面积改种水稻用水,开沟引水,打塘灌溉,忽视了河道疏浚和排水。由于贪多求大,引水工程出现了许多半截工程,有的严重阻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涝灾。如1963年8月,由于降水量大,在县河网化重点双沟公社任小庙网区,南北向的油河名一二两条大河,阻水倒灌,造成了加重内涝的严重后果。此外,花费了沉重代价开挖的水

塘,由于降水冲刷,大部分报废,有的不得不再退塘还田。

严重的旱灾

1959年夏秋,在“大跃进”和“五风”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同时,亳县又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可以说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

1958年前,全县年平均降水量820毫米左右,1959年降水量为634.1毫米,属于偏少,但旱情出现在7—10月的关键时期,就形成了严重的旱灾。据气象部门记载:

7月:上旬降水23.5毫米,中旬降水0.2毫米,下旬降水9.5毫米,月降水33.2毫米。

8月:上旬降水16.7毫米,中旬降水1.5毫米,下旬降水33.3毫米,月降水51.5毫米。

9月:上旬降水0毫米,中旬降水4.7毫米,下旬降水56.8毫米,月降水61.5毫米。

10月:上旬降水0毫米,中旬降水2.3毫米,下旬降水33.7毫米,月降水36毫米。

从四个月的降水情况来看,虽然不是百日无雨,然而7—10月的严重干旱,直接影响了秋季作物的生长和抢种晚秋及菜类。这不仅使当年秋季作物减产,还使1960年小麦减产成为定局。

面对关键时刻的严重干旱,各级党委发动全县农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旱运动,挽回了很大的损失。但由于“大跃进”形势所迫,没能摆正保水稻与大田抗旱保苗、抗旱抢种的关系。省委强制推行的旱地改种水稻,必须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死保。全县45万亩水稻任务,花费了很大的代价,仅插秧15万亩左右。当时的形势是大田禾苗旱死没事,稻田缺水就整人。为了死保水稻,塘

边田头到处可见批斗整人的场面。大田抗旱保苗和抗旱抢种无形中被放在次要地位。保一亩水稻,要抵10亩以上旱粮作物的用工用水。1959年只保住水稻13万亩,亩产仅有193斤,比1958年每亩减产108斤。秋季粮食亩产由1958年的150斤下降为107斤,较上年减产28.7%,秋季总产由上年27500万斤下降到19700万斤,较上年减产28.9%。全年粮食总产由上年45500万斤下降到32700万斤,减少12800万斤。

在大田抗旱中,全县实行大兵团作战,全用军事组织指挥行动,没有到人的责任制约束。抗旱中有一个大队,在几个生产队搞了包工到人,有的夫妻包打一眼井,包浇一亩胡萝卜,给多少工分,这样既进度快又质量好。县委发现后,当作了倒退的典型,在全县批判了“夫妻井”。这一批判,谁也不敢再搞包工到人或到组,因此抗旱始终是大轰隆,形式上虽然轰轰烈烈,实际上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抗旱中的浮夸风也相当严重,在浇水的亩数和遍数上,普遍虚报,从而为秋收以后大吹抗旱夺得了大丰收,为粮食高征购提供了依据,引起了随后的饥荒。

通过1959年的旱灾,充分暴露了全县大办水利中的失误,1958年河网化运动虽全面展开,但大部分是半截子工程,群众反映“挖河没见人,引水更不来,旱天不能浇,涝了不能排”,对抗旱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使粮食大幅度减产,总产量由上年的45500万斤减为32700万斤,是1951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反右倾”运动和“更大跃进”

“大跃进”以来,全国到处都在大刮浮夸风。1959年1月29日,毛泽东给六级干部发出指示信,浮夸风有所收敛。但时隔不久,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通知将指示信全部收回，浮夸风又有所抬头。

1959年7—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8月29日，县委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随后，全县城乡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左倾”错误更是变本加厉，浮夸风越刮越大。

1960年1月5日，县委召开了全县群英大会，会议通过了题为“欢庆伟大成就，再鼓冲天干劲，为实现1960年‘更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不顾1959年减产的事实，大肆鼓吹1959年在天大旱中粮食产量超过“大跃进”的1958年，生猪、山绵羊、家禽等项生产增长一倍和几倍。报告提出了1960年的各项指标：农、林、牧、副、渔等要比1959年加番加倍，粮食总产量保证15亿斤，争取17亿斤（亩产千斤以上）。棉、油、烟生产要比1959年增长4倍以上。生猪饲养量达到人均3.41头，大牲畜发展保证9万头，争取10万头。水利要实现河网化，要完成每人植树610棵的任务。

就植树任务来说，1960年初全县农村有70万人，若每人植树610棵，就要植树4.2亿棵，当时全县总面积220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要栽19万棵。如按林业育苗方式株距1米，每里植树500棵，可以绕地球赤道10周以上。

“更大跃进”所放的各种卫星更是“稀奇”。如魏岗公社王岗生产队放出了40亩高产优质烟叶，实际上一棵也没种；县委向省、地委报喜的宽几十行长达160余华里的“皖西北防护林带”，不久就销声匿迹。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960年1月17日双沟公社杨庙大队以“妇产院里产妇多”为名向上报喜，经逐人检查十多个“临产妇女”全是用衣服填怀假装的产妇。

“左倾”中的粮食统购统销

“大跃进”期间的粮食统购统销，是在高估产下的征购，是在低标准并有脱销情况下的统销。1958—1960年全县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是：

1958年农业人口71万，粮食实产45500万斤，征购13119万斤，商品率33.2%，人均负担量213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526斤。

1959年农业人口70.8万，粮食实产32700万斤，征购12924万斤，商品率39.5%，人均负担量183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357斤。

1960年农业人口56万，粮食实产27885万斤，征购7336万斤，商品率24.5%，人均负担量122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464斤。

从以上粮食统购统销来看，每年的粮食征购占到了实产的1/3左右。而留给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除去种子、饲料、社办工业等项用粮外，口粮的标准很低。1960年全县口粮人均日均仅有半斤左右，而且大部分是红薯片。1960年春天最困难时期，全县日人均口粮仅有2两左右，不少地方日人均口粮只有一两几钱。

浮夸风带来高估产，高估产又引起高征购。为了完成这些征购，许多地方不顾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不仅把农民的口粮作了征购，而且一到播种季节，向社员逼交种子。1960年春许多人挨饿的情况下，竟把干菜等代食品也纳入到粮食征购，同时又顶粮返销。有的地方连农民的“回销”粮也不放过。如1960年2月，五马公社竟把县委安排全社每人每天不足4两的“回销”粮，于3月初“结余”上交4500斤。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一些地方不得不大搞批斗和搜家,甚至对私藏粮食的农民关进监狱。一些农民反映说,党的粮食政策没有了,也不要农民了。

在粮食统购统销中,不少干部或因没有完成任务而被“拔白旗”,或挨批斗、受处分。1958年不少干部群众因如实反映粮食统购统销的问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1959年春因1958年粮食征购未完成,要回销,被视为“西北风”,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1959年秋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不顾上地抛荒和早灾减产的实际,以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情况为标准,把大批干部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无情的打击。例如上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邢占秀,向县委汇报了“粮食征购中有些地方卖了豆种,明春会出问题”,被阜阳地委点名批评为右倾,并停职反省。

1959年11月中旬县委召开了分支(大队党支部派出的支部简称分支)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会上除批斗了邢占秀等人以外,用大搞人人过关、解决一批走一批的办法,进行逼粮追粮。会后,在全县掀起了大反右倾、大放粮食入库“卫星”的新高潮。上河公社孙大庄大队,为过关,无奈向邻近的河南省某大队借粮几千斤,放出了粮食入库的“卫星”,免除了一次批斗。全县农村全面进行复收复打,普遍翻箱倒柜,许多干部群众迫于政治压力,卖种子、卖饲料、卖口粮,但最终全县也没有完成1959年22000万斤的征购任务。

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作为共产主义因素的农村公共食堂,在亳县全面迅速兴起。公共食堂多以自然村或生产队、生产组为单位建立,全县13个人民公社的1345个生产队共建立4700多个食堂。其房子绝大部分是占用社员的住房。食堂一般由生产队长或

会计负责。炊事员由生产队抽劳力或干部家属担任。所需的粮食由公社、大队统一调配,蔬菜由生产队自产。当时县委的口号是:“柴、米、油、盐、酱、醋、菜样样都从社里来”。吃、烧都有公社统包。

食堂建立后,传统的家庭小伙被严令禁止,社员的锅、碗、瓢、盆都集中起来。全村(队)的老老少少在一起吃不要钱的“大锅饭”,食堂多的几百人,少的几十人吃饭。一到开饭的时候,老老少少排着长队领饭。有的食堂占用社员房屋作了饭厅,也有的社员领饭回家吃。食堂乍建立时,一般随便吃,吃饱为止。由于是“大锅饭”,社员对粮食不是那么爱惜,丢馍丢饭、红薯吃中间丢两头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过路人也被允许到公共食堂吃饭,并且不收粮(票)钱。

这样吃“大锅饭”的“好日子”并不太长,一些生产队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三个月,粮食便被弄光了,公共食堂被迫停火。许多社员不得不冒着风雪严寒,到地里扒剩下的坏红薯吃。全县农村的饥饿从此开始。

事情发生后,县委并没有认清事实的真相,而是认为1958年粮食获得大丰收,公共食堂停伙是“假象”。于是在全县范围内批判斗争了一些干部和群众,到处翻箱倒柜,搜粮食交征购,但对公共食堂没有粮食、社员没有吃的仍不解决。

1959年3月,在阜阳地委工作队的帮助下,县委终于搞清了事情的真相,停止了粮食征购,安排了少量的粮食回销,大部分公共食堂恢复起伙。但由于粮食不多,直到1959年秋,公共食堂一直处于时起时停状态。

1959年8月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安徽省委负责同志说:“人民公社的食堂为什么被一风吹?主要是对敌人打击得不狠。有人认为食堂是一片黑暗,有的在动摇军心……”据此,全县城乡在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对不少因食堂停伙和对食堂有意见的干部进行了无情打击。如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程庄生产队长

程中德因说：“食堂食堂经常没粮，小孩没吃，饿得叫娘”，被批斗多次，并受到撤职和党内警告处分。

从这以后，公共食堂不仅不允许停伙，而且越办越大。十九里公社张宽庙大队刘庄分支 6 个食堂合并为一个食堂。大杨公社中修大队板桥修等 8 个小庄合并为一个食堂。观堂公社刘集大队刘集 450 人一个食堂，开饭时常要治安干部去维持吃饭秩序。沙土集 850 人一个食堂，常常不能按时开饭，晚饭往往要等到 9 点钟以后。有打油诗云：“早饭等到日正南，午饭红日偏西山，晚饭等到更鸡叫，不知明日再多晚。”

全县在实行公共食堂的过程中，除开始几个月外，一直存在以下问题：

1. 口粮标准低，社员普遍吃不饱。当时农村流传着“食堂的馍，洋火（火柴）盒，打的稀饭不粘勺，排队晚了摸不着”的歌谣。1960 年春天，在一段时间内全县人均口粮只有 2 两左右。同时绝大部分食堂常年不供应开水，整年不吃油、肉，还有的食堂几个月不吃盐。

2. 干部多吃多占，经常吃掉社员的口粮。干部多吃多占是食堂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1959 年夏，当全县城乡副食品供应出现紧张的时候，县委为副部长以上干部开办了小食堂，透支的粮食由县委财贸部如数解决。上行下效，公社、大队一般也有自己的小伙，多吃的粮食由社办小农场等有粮食收入的单位解决或直接扣社员的口粮。不仅如此，有的干部也带自己的家属、亲戚到小食堂和小伙吃饭，甚至有的还安排家属、亲戚到小农场或敬老院等单位安渡生活困难。1960 年春节，由于大批社员挨饿，国家和社队给食堂调剂了一些细粮，大部分仍没有吃到社员肚里。在口粮标准低、社员普遍吃不饱的情况下，干部多吃多占害的是老百姓。1960 年全县农村流传着“刮大风，起大雾，饿死社员留干部”的歌谣。

3. 干部经常通过扣饭来惩罚社员。各地扣饭的名目繁多，主要

有：不能干活扣饭、少干活扣饭、上工迟到扣饭、不服从领导扣饭、对检查人员反映情况扣饭、私起小伙吃青苗扣饭、偷庄稼扣饭，等等。古城公社一名北大队河北张庄生产队长公开向社员说：“我就靠食堂里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活谁就活，想叫谁死谁就得死”，他任意扣饭，多吃多占，致使全村人饿死40%以上。有些地方也出现了因扣饭而引起自杀的事件。如古城公社油河大队梁庄生产队社员梁景志因病不能干活被扣饭后上吊自缢。从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4. 跑路吃饭，给老、弱、病、残带来严重困难。不论烈日当头，还是刮风下雨，老老少少都要一天几趟往食堂里跑，特别是路远在大食堂吃饭的老、弱、病、残困难更大。有的晕倒或死在领饭的队里及途中。有的因吃了凉饭而腹泻，加重了原有的病情而死亡。

5. 砍树扒房烧锅。公共食堂建起，柴火紧张起来。全县80%以上的食堂不得不砍树，树砍光了就扒房子。有不少地方因扒烧了房子，搞的社员无家可归。如十河公社王桥食堂，1960年1—3月，共扒烧社员的房子50间，其中小张庄40间房子被扒烧了19间。有的食堂还烧了一些农具。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指出“经县委批准可采取食堂统一管理，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12月15日，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征求意见，结果除小农场、敬老院等食堂和一些鳏、寡、孤、独不愿分散起伏外，绝大部分社员同意分户做饭。县委打算全县分两批停伙，报地委批准，但实际上未等报批即一哄而散。

广大农民对解散食堂奔走相告，说这下子家里的小锅保险了，口粮低标准可以全部吃到肚里了。

大饥大病和食物中毒

从1959年到1961年,亳县农民口粮标准低,吃不饱,因饥饿引发了多种疾病,面积之大,危害之重,实属罕见。

早在1958年底,全县缺粮的地方,就有农民出现脸黄、消瘦、浮肿。1959年春,全县浮肿曾几度普遍发生,严重不能起床者达万人以上。1959年冬到1960年麦收前是浮肿的高发期,最多时有10万人以上。1960年下半年虽有减少,但持续不断。浮肿者的惨状,目不忍睹。轻者,下肢或者眼睛肿胀;重者,全身肿胀,面部膨大,眼睛睁不开,呼吸急粗,行走困难,甚至卧床不起,天热时,皮肤开裂流水,生蝇生蛆。

由于口粮少,为了能活下去,农民极力寻找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充饥。三年中,全县农民食用的代食品主要有以下几类:

1. 树叶、树皮。这是农民缺粮后最早的代食品。到1960年春,全县杨、柳、槐、榆、桑等树,其可食部分,均早已吃光。其中不少村庄榆树因剥皮食用而绝迹。

2. 烂红薯、红薯秧。1958年秋收时许多红薯没收和没收净,被烂在地里。冬天来后,许多吃不饱的农民不得不到田间,把这些红薯,不论烂到什么程度,统统捡回吃掉。第二年春天,他们在吃完育过苗有毒的薯块后,又接着吃田间的鲜秧、鲜叶,至秋季又吃干秧、干叶。

3. 大麦、小麦、豌豆、扁豆的幼苗。特别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有不少过旺苗吃光。如1960年2月14日张集公社黄营大队就把100多亩大麦和大部分小麦过旺苗吃光。据魏岗公社几个大队的统计,700多亩大麦被吃净,需改种其他作物。

4. 糠、皮、壳与烧柴。谷糠、高粱壳、稻壳、花生壳、棉子壳、牛草

穗、麻梭子等这些原来喂牲畜的东西被人们当作代食品。高粱杆、葵花杆穰子、玉米芯等原用作烧柴的东西也加工食用。1960年没有高粱杆的生产队，就把地铺（床）、房薄（用高粱杆作的在房内作隔间用）上的高粱杆拆下，剥去外壳，加工食用。十河公社1960年3月上旬，用2天时间大动员，就收集原料20多万斤，先后加工成品4万多斤。

5. 茅草根、刺刺芽、芡草等野草。茅草根能加工淀粉，是较好的代食品，甚至以它作粮食统购、粮食回销。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县在农村全党全民发动，第一书记挂帅，抽调大批劳力，大兵团作战，掀起一个又一个扒茅草的高潮。由于茅草分布面广，含糖量高，又有药用价值，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刺刺芽又叫七七芽，是田间和荒野到处可见而一般牲畜不吃的野草。在茅草根扒完以后，由于其味道尚可，也成为主要的代食品。1960年春，在一段时间里，全县大采大食刺刺芽，一般食堂每天要食用数百斤。

芡草是一种水生植物。1960年春凡是靠河有芡草的地方，都进行大动员大采食。不少社队党委书记挂帅，造筏下水捞芡草。

从1959年到1961年，农民因为大量吃野草、野菜，腹泻、痢疾等疾病也在全县流行开来。1960年全县发病人数达25万人以上。1960年4月，十九里公社余集、崔寨等六个大队，农民因吃刺刺芽过多，普遍引起腹泻，仅崔寨大队就有腹泻、痢疾595人，致几十人死亡。

农民因为大量吃槐叶、椿叶、榆娃娃（林学名称虫瘿）、苍耳子、蓖麻子、育过秧的红薯母子、蝌蚪、蛇出溜子导致的食物中毒，也是不计其数，导致不少人死亡。五马公社丁双庙生产队高思曾因吃臭大麻子一家五口死亡。

在大饥大病过程中，某些领导不顾农民的死活，不实事求是，

仍然大搞浮夸。如1960年春天,全县人均口粮只有2两左右,但大部分食堂仍向上汇报是三干(馍)三稀(稀饭)吃粮十两以上。1960年2月17日县委向省、地委检查团汇报:全县已扒茅草根2亿斤以上,人均300斤之多,可以安渡1960年春季灾荒。全县为大吹代食品的数量,为应付检查,不少生产队把茅草根等堆在柴草垛上。

不仅如此,有些领导还以种种手段隐瞒实际情况,千方百计封锁消息。1959年春,全县严重浮夸病人在万人以上的时候,国家内务部农福司杨善存来亳县检查工作,县委事先定好检查地点,一个浮肿、外流人口都没上报。杨善存无奈而走。1960年冬,中央某部司长朱农来亳县检查,县委紧急通知社队,做好“迎接”检查的准备,同时召开县直有关部门会议,统一数字口径。隐瞒灾情、封锁消息已成为全县上下的通病。1960年4月中旬,双沟公社有各种病人约5000名以上,而他们以正式文字向县委报告,全社仅有浮肿病人59名。该社洪深大队有各种病人500多名,为怕上级检查,竟把他们集中多处锁在屋里。1960年初春,五马公社在罗庄大队召开扒茅根现场会,大队害怕发现病人,竟把一部分病人提前集中送到边远的荒野里,到会议结束,因冻饿而死数人。

更有甚者,有些领导还对于如实反映情况者给予无情打击。从1959年初到1960年底,全县因反映生活困难、疾病等问题的干部群众,受到打击者数以千计。1959年1月张集公社干部孙彩良向国务院写信反映农民生活问题,被当作右派势力反攻的“西北风”批斗。1959年夏双沟公社农民随毛因反映饿死人问题,县委主要负责人亲自前往处理,指使大队书记张××将随毛批斗后交大队火箭连关押,以致饥饿迫害而死。1959年冬魏岗公社党委委员董××,因反映群众无粮、批评某些领导不实事求是而被逮捕法办。十九里公社小学教师任怀林因向中央写信反映饿死人问题被忝列为反革命信件而被逮捕判刑。

查禁不止的农村人口外流

随着农民生活的不断困难和疾病的不断发生，一些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外出逃荒。全县农村人口大量盲目外流，开始于1958年底粮食被搞光、农民无吃以后。最初的形式是部分农民抛弃集体生产，先内地后外地到田间扒收获未净的坏红薯，后来则发展成带着炊具、行李，出外以乞讨为生。

当时人口外流的主要去向，是河南省的郟城、鹿邑、虞城、永城等县。1959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是人口外流的高峰期。全县外流人口在2万人以上。特别是靠近河南省的双沟、十河、十八里、魏岗、张集、五马、观堂七个公社，外流的人口接连不断。观堂公社刘集大队去永城的人数达2000人之多。

河南省向中央反映后，县委一方面派人去接回外流农民，另一方面拒不承认外流是生活困难所致。县委在大批右派势力反攻的同时，层层设卡阻拦。但不论如何“批”、“拦”，也难以控制农民盲目外流的发生。直到地委工作组到亳县帮助搞清无粮的事实，并安排了粮食回销后，农民盲目外流才得以缓和。

1959年麦收时，外流人员大多数回归。但麦收后不久，由于浮夸，粮食统购又过了头，人口外流又有发生。7月份以后，由于连续几个月大旱，夏荒接着秋荒，外流人口急剧增加，查禁不止。

1959年冬，面对严峻形势，县委并没有安排农民的生活，却一方面大抓粮食征购，另一方面指定严管措施，部署各公社大队建立劝阻站或劝阻所。到12月14日全县共建立劝阻站、所212处，抽调人员717人。其中生活困难比较严重的五马公社就建站、所50个，抽调专人150人。城关公社设17个站、所，分布在出入城的主要街道和汽车站，并在村头、街道设有许多流动岗哨巡逻。这些站、

所,大部分有专门的房子,用于扣留、关押外流人员。不少地方连正常走亲串友的农民也予以查扣。除此之外,县委还加强了外线封锁,增派了大批干部到商丘、郸城、鹿邑、永城等地,查扣外流农民。

外流农民在被查扣送回的过程中,受到了多种多样的折磨。在被任意拦截检查时,不仅通常被没收钱物,特别是食物之类的东西,均予没收。他们常常被搜身,受到人身侵害;在关押收容中,经常一关押就是许多天,夏天热晕、冬天冻坏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转送途中管理更严,大小便都要经过批准,稍有违抗,便遭到训斥、打骂或绑铐。不仅如此,还遭受饥饿之苦,虽然每天都有少量的饭吃,但都吃不饱,吃不够规定的口粮标准。而且有病也得不到及时治疗。许多农民从外流长途跋涉,到扣留、收容、转送,经过多日折腾,饿病交加,中途死亡者,屡见不鲜。

尽管如此,但由于生活日趋困难,一些不甘心在家挨饿的农民,还是冒着风险,拖着瘦弱的身体,穿着脏烂的寒衣,挎条筐,背破被,顶风冒雪,扶老携幼或者单独地背井离乡。他们用走背道、沿河崖、装探亲、白天藏、夜间走等方法外出,但大多数被查扣送回。

1960年春天,生活更加困难,但由于农民体质越来越差,许多人想走而无力外出。不少人认为,既已如此,死在外边不如死在家里,全家走散死不如死在一起,因而农村外流人口比1959年有所减少。从1959年秋到1960年冬,全县农村人口外流约有4万人以上。

1960年11月,“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发出后,中央开始纠“左”,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深入贯彻,到1961年春节,外流农民大多数回乡,全县范围的农村人口外流基本结束。

三次转折减少了人口非正常死亡

在1960年整风整社以后的若干年内,也不知道县委研究过多少次,为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定案?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死亡人数做到有数,要我安排一个大队进行人口死亡比例调查。我分姓名、性别、年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等内容拟好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等人去古城公社李沃大队调查。该大队原有3130人,1960年1月1日到5月8日共死亡771人(不含外流死亡在他乡的),占总人口数的25.3%。我向县委汇报后,县委认为“死亡比例太大,选点不准,重新选点调查。”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中等大队,我派县委生活检查组李运曾等人前去调查,结果该大队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1人,占总人口数2980人的29.15%。1960年底,我又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偏重的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它们原有127户,共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死绝的18户占原户数的13%。其中小李庄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许庄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那么究竟全县农村两年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县委最后公布的数字是:1959年、1960年两年减少28824户,占原户数的15.9%;减少150503人,占原人口数的21.1%。而1996年出版的《亳州市志》刊载1960年全县城乡总户数比1958年减少29400户,人口负增长9.6万人。

在人口非正常死亡中,以下十种人死的最多:1. 儿女不孝和多病的老人;2. 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3. 因提意见而被撤职的干部及家属;4. 上吵下闹好搞不团结的人;5. 手脚不干净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6. 不讲卫生,乱吃东西的人;7. 在外地工作的职工

的家属；8. 老实人；9. 残疾人；10. 有传染病无人敢接近的人。

在分阶层死亡人口比例上，据典型调查，1960年1月到5月中旬，贫农死亡占本阶层的28.25%，中农死亡占本阶层的12.5%，地主、富农死亡占本阶级的44%。

在全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中，有过三次转折，从而减少了人口的死亡。

第一、1959年春天，全县大多数社队粮食统购过了头，人口浮肿外流，非正常死亡也有发生。县委仍坚持大力反右、大批“西北风”、对农民生活困难不予承认的时候，阜阳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来到亳县，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搞清了大多数地方无粮的事实，及时对绝大多数社队安排了粮食回销，从而迅速扭转了形势，减少了损失。

第二、1960年春节过后，人口非正常死亡日趋严重，有些领导回避问题，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等人，在大杨公社中修大队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调查，发现全大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非正常死亡282人，占总人口数的9%，浮肿严重的劳力444人，大部分农民都有轻度浮肿。他们把情况如实全面地向县委作了汇报，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作为“中修事件”通报全县，处理了有关责任人员，对问题严重的地方增派了力量，震动了全县，对减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1960年入冬以后，不少地方因生活困难，浮肿、人口外流、非正常死亡不断发生。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等人在古城公社焦瓦大队周寨、周瓦房两生产队检查发现，从10月到11月下旬，非正常死亡29人，浮肿病人占总人口数的32%。其他检查组也发现类似的问题。我接到报告后如实地向县委作了综合汇报。县委办公室干部刘志良将问题写进了“生产生活第二期简报”，报送阜阳地委。地委及时通报全区并上报省委，从而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

视,增派了大量干部来亳县,帮助整风整社,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紧急指示 12 条等一系列的纠左政策,重点落实农民的生活问题,迅速扭转了形势。全县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到 1961 年春节前基本停止。

粗 浅 的 认 识

“大跃进”在安徽亳县农村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但在阜阳地区各县,都是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1959 年早灾也大体相同,为什么有的县问题不太严重?涡阳、临泉两个县 1961 年初还支援了亳县大量粮食。这与干部执行政策的水平、素质很有关系。邓小平讲得很对:“‘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1959 年到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 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1963 年、1964 年情况比较好。”挫折教训教育了全党,我们深信: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进一步改革开放,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

黎 白

(一)

1958年5月,我和寒风背着反右派运动中受的处分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被下放到昆明军区分配工作。

到昆明后,寒风和我拜会了军区组织部和宣传部的程、任部长。他们十分热情,几乎是每三天分头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每周假日必定请我们吃饭、看戏。只是闭口不谈分配工作问题。

寒风对我说:“我们是关羽入曹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日子过得不赖!”他当然是讲反话。

我说:“你看,我的长篇都快写完了。急什么?咱们俩都是营团干部,又都是政治工作干部,又都受了留党察看的处分,让军区如何分配?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么!咱们在创作室这一年多,除了反右,谁有时间写东西?”

不着急工作,反而有了着落。总政治部谭政主任发电到军区,申明寒风和我仍是总政的干部,到昆明军区只是下放。于是,军区很快下令,寒风任十三军三十七师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我任十三军三十八师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或是助理员。我们立即到任。实际上,我们内心还是急于工作的。

到了师里,我的工作分工也给师首长和师政治部主任带来了

麻烦。我背着处分，有些会议不能参加，有些文件不能阅读，有些事情不应知道，只好让我分管文化娱乐工作。恰逢此时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各种“卫星”满天飞，战士们连下盘棋打几把扑克牌的时间也很少，结果是我分管的只有一副法国军队留下来的、无缝钢管制成的、可以推动的、专供师直属队和团直属队用的篮球架子。偏偏严重的问题就发生在这副篮球架子上。

这里地处滇南，森林不少，最缺少的是矿石。没有铁矿，但是，钢铁还是必须大炼的，于是，就要机关单位、企业、住户居民把凡是铁制的东西献出来用以炼钢铁。例如单位的铁栅栏、铁门、铁柜、窗户上的铁合页，居民家里的铁锅、铁壶，甚至于摊贩的铁秤砣。部队当然也不例外，更要积极争光。

一天，师部宣传科的通讯员跑来向我报告，师部和团部共用的篮球架子被从操场上往下运，准备砸碎了炼钢铁！

我立刻奔去制止。我向战士们说：“谁也不准动它！”我捅了大漏子！

宣传科长马泽民、副科长翟维青找我谈话，很关切地说：“这是张政委决定的，你怎么不许砸呢？”

他们两位和我相处很好，又都是积极热情的战友，他们那种关切中带着些紧张的神色也使我很感动。然而，我却说：“张政委下命令也不行，篮球架子就是不能砸。”

马泽民说：“张政委要和你面谈，别顶他！”

我于是去见张政委。

张政委是三八式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很儒雅，也很和气。他客气地让坐，递来大名鼎鼎的“云烟”，笑着说：“你为什么不准把篮球架子砸了炼钢铁？是我同意的啊！”

我也笑着说：“政委，您是抗战前读过大学的，我是大学毕业的。高炉炼铁，平炉炼钢这个常识我们都懂。篮球架子是无缝钢管

的，砸烂了它再去炼钢铁不是荒唐吗？何况，现在炼铁的炉子简直和北京烤白薯的炉子差不多，不要说是钢，合格的铁都炼不出来，只能炼出烧结铁，那是毫无用处的废料啊。”

张政委严肃地说：“大炼钢铁是中央的指示，全民炼钢是‘大跃进’，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拥护和执行的。党员，军人，更应该坚决执行。你是总政的干部，更应该懂得纪律。你再想一想，你还带着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为什么还要为一副篮球架子犯严重错误呢？我没有再下命令砸篮球架子也是出于对你这总政来的同志的尊重，或者说是对你的关心啊。你不能再犯大错误了。”

我内心确实很感动。张政委是会关心人的好同志。不过，我的毛病确很严重，我却说：“政委，咱们师直和团部只有这么一副篮球架子，也是唯一室外运动和娱乐的工具，砸了它，就打不成篮球了。我分工负责文娱活动，我认为没有非砸烂它的理由。刚才我也说过，无缝钢管再砸烂去炼钢铁，实在是荒唐，您有这个知识水平，会批准保留它的。”

张政委的脸色很不好看了。

我说：“我可以写一个书面报告给您，请求保留篮球架子，一切后果我承担！”

张政委说：“可以，你写个报告给我，我负责转给军首长。在上级没有决定之前，篮球架子可以不动。就这样吧！”

我们似乎谈得很僵。我写了报告交给张政委，篮球架子仍在，战士和干部或许知道了这场争执，尽管大炼钢铁极累人，篮球场上打球的人却大大多了起来，好像再不多打几场，就没有篮球架子了。我站在球场外，真说不出是什么心情，感慨？忧烦？迷惘？百感交集？

“大跃进”确实是讲速度的。第二天，军里通知师政委和我即刻到军政委处。

找我们谈话的是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三位军党委常委包括书记。

军长朝我说：“你的报告和张政委的汇报已经讲清楚了。大炼钢铁是党中央的决定，师直机关打不打篮球不是问题，本来可以简单处理的。因为你是总政治部的干部，所以，我们几个常委研究了一下，两个办法解决，你可以讲你的态度。一个是以你们的政委指示为准，砸了炼钢铁，至于你的建议和你的书面报告，可以还给你，就算了事。第二个办法是你如果坚持，军里负责把你的报告呈报给秦司令员，由军区首长决定。说明一下，这是因为你是总政下放到我们军里来的，你还是总政的干部，我们无权处理，并不是我们同意不砸篮球架子。”

师政委说：“军长是出于对你政治上关心和爱护啊，希望正确了解你的处境啊。军首长和我们几个师的同志也是出于好的愿望啊！”

我的确很感动，也深知我的处境，也了解为了一副篮球架子而坚持己见实在是愚蠢，但是，烤白薯式的炉子炼无缝钢管是反科学的，是非不能不坚持，我既然懂得这个常识，就不能学鲁迅杂文中写的那种聪明人。我站起来，向军师首长敬了个礼，说：“我由衷感谢首长们对我的爱护，也了解自己的处境，不过，我同意军长说的第二个办法。”

军首长仍然热情地留我和师政委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当然放开肚子大吃，因为近来部队的伙食直线下降，肉、菜几乎难以吃到，云南那种辣死人的小朝天椒是唯一下饭的菜了。我问过司务长，他吭吭巴巴地说：“汽车都运钢铁了吧？”

篮球架子的事就暂时放置下来了。谁料到又有了变化，为了反映“大跃进”，拍摄故事片，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到了昆明，带来了编剧黎阳，导演沈刻。通过军区把寒风和我极快地调回军区。

住进了九号楼高干招待所。寒风和我都是原总政创作室的创作员，我又是电影创作小组的成员，所以，和陈播、黎阳、沈剡还算熟悉。

当天晚上，陈播对我们讲：目前云南有三个要立刻写的剧本，立刻投入拍摄的题材。一个是《人民日报》已经发了头版的新闻，标题是《一步登天》，将来影片的片名也可以用，就是佤族从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的制度一下子建立人民公社，跨入了社会主义。保山县的佤族一个寨子这几天之内也建立人民公社，你们和省、地领导一起去参加庆祝大会，访问三天左右立即回昆明交提纲，研究之后，一周内，最迟半月内写出文学剧本。第二个题材是十三军有一个学哲学的标兵向胜昌，目前在北京参加英模代表大会。你们先到他所在的部队去访问，军区小报有半版报道，到团里找找还有什么材料，再访问一下连排干部战士，时间也不能超过十天，回来讨论提纲。第三个题材是将军当兵，可以稍靠后几天，因为厂里也派人到其他军区去了……”当寒风、黎阳和我听得发怔的时候，陈播说：“‘大跃进’嘛，一切要争时间，抢速度，一天等于二十年嘛！中宣部开过会，要求全国人人能读书、写诗、唱歌、画画、舞蹈、表演、创作……让我唱歌，跳舞蹈恐怕困难，创作嘛，我到很想‘大跃进’一下的。”

谈话结束，我和寒风立刻上街，彼此心照不宣，一个心意：喝一杯鲜菠萝汁，吃一次过桥米线。遗憾的是，转了几条街，小摊贩一个不见，大饭馆不卖米线，十分冷清。

寒风说：“奇怪，徐水县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人家徐水书记发表宏论：一县进入共产主义！怎么昆明一下子变成什么吃的都没有啦？”

我们败兴而归。招待所秦管理员看见我们，立刻叫起来：“到处找你们两位首长呢！秦司令员来了，请你们和八一厂首长吃饭。”

寒风说：“秦基伟是个热心人，没什么要小心的。”

我们进屋，秦司令员笑着说：“寒风是个好向导，想上街吃米线吧？缺货？我请客！”

大家入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秦司令员朝我笑着说：“你这个黎白，年龄不大，胆子不小哇，竟敢顶住十三军和三十八师两级领导坚持不准砸篮球架子？一副法国鬼子丢下的篮球架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家铁门拆去炼铁，我家窗户上的合页全部拆去炼铁，我都不吭气。早晚会给我装新的，我着什么急？篮球架子么，留下了，总有人去打球。我这个司令员的大门有警卫，铁门开来开去多麻烦，拆了好，省事么！”

秦基伟讲得挺风趣，听不出他是拥护大炼钢铁，还是反对大炼钢铁。不过，三十八师的篮球架子经他批准保留下来了可算一大喜讯。

(二)

为了准备参加佤族村寨建立人民公社“一步登天”的庆祝大会，我和黎阳连夜访问了省民委的有关同志，向他们了解一些佤族的知识，免得现场失仪。在少数民族盛会上失仪是很严重的问题，不懂民族风俗礼仪习惯而出了差错是会影响团结的。

民委的同志告诉我们，佤族过去称“佻佻”族。“佻”是娃子即奴隶的意思，对兄弟民族有歧视的含义。“佻”又分“生佻”和“熟佻”两类。“熟佻”居住在高山之下，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会讲汉语，有的还认识汉字，某些习俗也有些变化，能与汉族互相适应，互相往来，彼此也比较团结，生活水平也接近于当地汉族。“生佻”居住在高山上密林中，极少与其他民族往来，基本上是奴隶社会，三权统治，政权由头人掌管，还有一位神权或鬼权的至上领袖人物。他们信鬼，还没有达到神权的时代。人分三等：贵族——头人（佻语，

称“朱米”、“夜郎”等),其实也很穷苦;自由民——永远升不到贵族却很容易降成奴隶;奴隶——没有任何自由,可以交换,买卖,与黄牛差不多。生产方式是刀耕火种,所以常常迁移。耕种之前要“人头祭谷”,就是下山砍掉别人的人头,提回山上插入竹签上用米“祭谷”。人头分等级,优等的是汉人头,以大胡子最为优等,其次为其他民族男性的人头。实在找不到这些类人头可砍,山下“熟作”人头也可以。每个寨子都有两三个扎红头巾的壮小伙子,红头巾是砍过人头的光荣,勇敢的标志,一切女性崇拜和顺从的英雄。

回到招待所已是深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冥思苦想,佤族或许应该属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还达不到封建社会一般具有的初期特点。我在建国初期在部队里曾经编写干部理论学习丙组《社会发展史》教材,为乙组《政治经济学》班讲课,为甲组班担任辅导员,多少懂得一点人类发展和几个社会制度的重要特征和分期。怎么想,也想不出佤族如何“一步登天”踏入社会主义。如果仅仅以公有制成了唯一的条件,那么,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昆明到“佤山”要乘汽车,走山路,过几个州县,行程几天并不好走。何况省地政府准备了相当多的礼物:布匹、盐巴、糖、火柴、药品、衣被、粮食……不过,也有好处,路过沿途城镇,见到了大炼钢铁的大小炉子和辛苦的群众,不断敲锣打鼓“放卫星”报喜的群众队伍,特别是村庄寨子里的茅草屋门前大都有一个新的装置——信箱,每天黄昏,有专人开箱从里边掏出形形色色大小不等的纸,抓起这些纸往背篓里一塞。开头,我们很惊奇,问当地衣着很破旧的少数民族干部这是怎么回事?对方答:每家每户每人每天写“一张”诗,放入纸箱,天黑前,统一收取,交小学教师阅读。我问:“教师看得过来这么多的诗吗?”对方摇摇头,不回答。我问:“我能看几篇诗吗?”对方一指背篓,说:“随便看!”

我看了看背篓里那些被揉得一塌糊涂的诗篇，选了几张揉得还不算太烂的纸，小心铺开来一看，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应该是太阳的不圆不扁的球，周围有大小无数见楞见角的似是星星的东西，写着几个实在难认的汉字是：“太阳挂，放卫星。”另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写尸多，笑也多。”这“尸”字，应当是诗吧！我把诗篇放回背篓，沉默了。再大的跃进，也做不到要文化程度很低的少数民族群众天天写诗啊。莫非是疯了？还是神经病？贯彻下来的结果就是小学教师每天黄昏背着背篓挨家挨户收烂纸，纸上有字：“尸”！古今中外也没有这样出格的荒唐事啊。我们却有，而且颇为自豪，复何言哉？

我问对方：“你们把这些诗怎么办？”

对方答：“每天晚上向上边报个数字，选一二十篇，一起送上去。”

我问：“你怎么选？”

他答：“纸完整些的，纸上写的字多一些的。我看不过来，就这么选。报告数字是按每户有几口人就有几张诗上报，天天一样的。上头只管收下，我知道他们不看的，只统计数目再往上报就完成任务了。”

我问：“群众愿意吗？”

他答：“管他们呢！早晨、黄昏上山砍树，准备烧火炼铁，白天炼铁，吃得饥一顿饱一顿，又没得多少睡觉时间，再说，多数不识字，不敢不写，画个东西在纸上也就成了。开头，群众很害怕交不上诗，慢慢也就不怕了，纸头上划几条道道，画个圈圈，塞进信箱，没人查问的。我管收诗上报，开头还看几遍，如今是不看的‘罗’。”他朝我笑了笑，背起背篓，里边盛满诗篇，疲惫地走开了。

一路上，所见甚多，大都如此。我带着这种心情进了伟伢山，只觉得身心交瘁。

亲眼见到今天就要“一步登天”的“生佧”寨子，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几乎是原始部落。一个方圆不足百米的坝子，尽头处最宏伟、最显眼的佧族首领的“官邸”是一座没有剥皮的树干搭起来的两层阁楼，没有窗户只有充当窗户的栅栏，没有玻璃，没有纸的栅栏，风雨无阻，一目了然，颇大的屋内只有一个火塘，没有桌椅，没有任何现代或古老的陈设，一面墙壁上挂着带毛的牛肉，地下堆着一堆包谷，杂乱地放着不少粗陶坛子。

我们的民族干部带着山下的“熟佧”翻译已经把寨子里的三巨头请来，他们身后是几十位“生佧”男女。显然，政府已经和寨子里的佧族首领沟通了感情，达成了协议，经翻译再加以解释，佧族首领向全族人叫喊了几句，立刻传来一阵欢呼声。三巨头与我们的领导人相会了，居然是互相把臂。我似乎从什么古书上读过的，这种把臂礼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的。成箱、成袋、成匹的礼品抬到坝子上，佧族老幼们的表情是亲切、诚恳、愉快、充分信任的。

庆祝佧族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结束后，首领的厅里和坝上都举行宴会。我和黎阳与省地政府代表是贵宾，都坐在厅里的地上参加宴会。厅角摆着的粗陶坛子被搬来，是他们自酿的美酒。我们面前都有一坛插了一根竹管的美酒，用竹管吸酒，面前的酒必须喝干才算对主人的尊敬。

宴会和歌舞延续了一整夜。本来应该等待佧族首领分配政府送来的大批礼物，看一看是不是人人一份，平均分配，娃子即奴隶是不是除外。省代表却指示返回昆明。我其实也是愿意尽早离开的，不通语言，三五天采访就写出一个“一步登天”的电影文学剧本？无论怎样“大跃进”，我也是办不到的。

(三)

回到昆明,我向陈播厂长表示,我采访战士学哲学的事迹,写这个题材,因为模范出在我们军。这个理由很充分,所以,我又回到三十八师。陈播给我的时间是半个月带详细提纲到军区向他汇报。军首长更加具体,指示我一周内采访完毕,提纲写出,师团研究通过。而我现在手里只有一份军区报纸,上边有小半版关于向胜昌学哲学的报道,他本人仍在北京。任务艰难,我却极有干劲,用“大跃进”的速度拼起命来!

我用了半天时间聆听了军、师首长关于如何写向胜昌学哲学的指示。他们的指示是:向胜昌学哲学是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开始的,接着是读了马列经典著作,读了多遍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最后是读了毛泽东的两篇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写的时候,要把次序颠倒过来,写他学哲学是从毛主席“两论”开始的,并且是在实践中用的。我没有明确表态,不过,我已经看了多遍军区报纸上的报道,就是这样写的。我对军、师首长对一名战士学哲学了解得相当具体,还是深为钦佩的。

我用了三天时间在向胜昌所在的连队、排、班进行了逐个的访问和座谈。他们已经接受过多次访问了,发言积极踊跃,谈起来倒背如流,套路极熟。不过,他们讲完之后,我提出的问题却大多是他们想不到的,但又是他们熟悉的。加上我这三天的就住在班里,和他们一起吃,一起打扑克,一起操课,很快就彼此融洽了,谈及向胜昌的经历、性格、生活琐事也就很自然的多起来了。我相信这些情况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真实材料,但也显示出部队政治工作的深入,向胜昌学习的刻苦,他学哲学毕竟不是吹出来的。这使我增加了信心,也增加了创作的激情。第五天,召开连营两级有关干部会研究

怎样表现战士学哲学，营、连是怎样领导战士展开学哲学的……当晚我回到师部，向政委、主任汇报了设想，深夜，和宣传科长等三人研究结构。拂晓，思考结构提纲，第六天上午，写出剧本提纲请师首长审查。为了“大跃进”，抢时间，师政委决定由他和政治部主任、宣传科正副科长和我立即乘车赶往军部，进行军师两级一次性的汇报和研究。提纲仅仅是主题思想，粗略的故事梗概，只要不太出格是不难通过的。所以，晚饭前，我就到了军区，见到陈播。距他要求的十天完成提纲的时间提前了四天。回想起来，难以想象，实在是“大跃进”的速度。也不可否认，尽管我对大炼钢铁、佻族的“一步登天”、人人每天写一首诗是持异议的，但是，大跃进的精神，我是拥护的，而且是全力以赴去拼搏的。如果说我那时就对“大跃进”有深刻而正确的认识，同样是“天方夜谭”，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水平。

提纲很快就被陈播通过了，给我的任务是一周内写出文学剧本初稿交他审查。又是“大跃进”速度。我连续作战七天七夜，毫不含糊地完成了初稿，而且，我自信是竭尽全力去创造一个有人物、有一定思想性的故事片剧本的。我为剧本定名为《插翅高飞》，按时交给了陈播。他连夜看完，通知我带初稿返京交八一厂打印，并指定沈剡执导，而且把沈剡和我找来一起商量组成摄制组和选演员的诸般事宜。真是“大跃进”的速度。这时，人人都在拼搏，效果和结果都来不及去想。

我奉命回京，而且要快，当然是坐飞机。招待所的同志去买票，我终于有了一天一夜的空闲，也实在要好好大睡一场了。就在这个时候，省文联秘书长李鉴尧来看望我们。我和李鉴尧并不熟，他却和寒风很熟。他一到就约我们去参观或者是参加深挖田以备亩产十五万斤小麦的大规模夜战。

当我们来到田头，只见几盏聚光灯照耀如同白昼，虽不算万头攒动，也可以形容成人山人海，呼号声响彻云霄，景色壮观，气魄宏

大。

一亩见方的田已经深挖近丈，翻起的土用粗绳和筐吊上去，人们上下用梯子，田——深坑下的人们仍在挖土不止。

我问李鉴尧：“这是干什么？”

他说：“深挖一丈，分层施肥。计划用五千到一万斤化肥，三千斤优质谷种……”

我打断了他的话：“不用秧苗？”

他答：“种谷，唔，小麦！”

我问：“你是农村出来的吗？”

他答：“一半吧！”

我说：“我连一半也没有，纯粹城市出来的。不过，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深挖一丈，八尺土全是生土，寸草不生。万斤化肥丢进生土里会起多大作用，我不懂，只知道会起副作用。三千斤谷种，怎么下种？一亩地铺满了下种？”

他答：“梯田式下种。”

我说：“太荒谬了！我敢保证你们这三千斤种子播下去的结果是颗粒无收。大秘书长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超出一般常识的事情来？”

李鉴尧沉默了一阵，才吞吞吐吐地说：“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亩产十五万斤小麦的照片啊，上边还坐着几位中央领导人，我能不信吗？我敢不信吗？我能不执行放高产特大卫星的指示吗？我敢不执行吗？”

我说：“要是我，就坚决顶住，绝不执行！”

李鉴尧说：“我知道你和寒风的情况，留党察看两年离开除党籍就差一步，是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说良心话，我不敢。就算颗粒无收，也不过是扔了万斤化肥、三千斤谷种，大家劳累了几天。我顶了，还会派别人来的。”

我叹了口气,说:“你知道这样干一定是颗粒无收啊?”

李鉴尧不回答了,聚光灯照得他那劳累过度的苍白面孔更显疲惫和憔悴,还显出一种悲伤和无奈的神色。我把要冲出口的几句“慷慨激昂”的话咽回去了,只说:“我们走吧!”

我在云南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却是经历了太多的不可想象的事。带着无数的迷惘和惆怅飞回了北京。而且,陈播也改变计划,为了促《插翅高飞》上马,他和我一起飞回北京。

反映战士学哲学的文学剧本《插翅高飞》本来是陈播厂长主张迅速上马投入拍摄的。我也住进八一厂正在拼命加速地修改剧本。谁知大跃进的奇想是任何人也难以预料的。上级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下放交给北京市卢沟桥人民公社领导和管埋。这个变动太突然,也太震动人心了,何况还有一系列的交接。八一厂有故事片、军教片、纪录片三个室,还有洗印、录音、制景、特技、化装、服装、道具等八大车间,有厂部政治、行政、管理等机关部门,专业性极强。人民公社尽管已经接近了共产主义,社员们正在“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创作”,却实在难以达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办好一个电影制片厂,胆子再大,短时间也是无法实现的。而厂里的军官、职工的思想不能有一点混乱,工作步调不能有一点失控,剧本最后审查通过和投入拍摄也不能有一点推迟。

我呢?只好是边修改剧本边待命了。我和陈播想“大跃进”也跃进不起来了。其实,我很明白,《插翅高飞》是飞不起来了。改了三四遍剧本,已是1959年5月。早在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解放军正在平叛。这时,总政治部决定派几名部队作家去西藏参加平叛,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寒风、黄宗江和我都准备进藏,同行的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海默。6月初,在北京站正待

登车，我突然被总政召回。要我参加刚刚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下令组成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的二方面军编委会去编战史。我再三要求去西藏参加平叛，却不获批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开始了编写战史的工作。说起来，从1958年5月下放昆明军区所属部队到调来编战史，时间整整一年，而我在云南只有七八个月，上上下下跑了许多地方，甚至“深入不毛”，却真可称是一事无成，愧对了“大跃进”这热火朝天的时代。

我于1959年6月到“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报到。需要调来的许多编写人员还没有到齐。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7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定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并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接着，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又是来势猛烈的“反右倾”运动。

我们编委会虽是刚刚组建，“反右倾”的斗争是毫无例外必须全力投入的。而原红二方面军改编的一二〇师及后来的第一、第二兵团几乎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一野战军于西北战场进行战斗的，指战员们对彭总崇敬有加，更要说清问题、划清界限、反对右倾、投入斗争了。

本来，我当时比较平静。我认为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我没有什么反对的错误，战争期间我在华北作战，又是下级干部，也没有什么可以要与彭德怀司令员划清界限的必要，只遗憾又将拖延了编写战史的时间。

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我们编委会开始“反右倾”不久，原军委训练总监部军校部部长兼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和党委书记杨秀山就找我单独谈话。他让我坐下，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卷宗，却没有打开。他对我说：“庐山会议开过，中央决定反右倾，我们收到总政治部转来有关你反对大跃进的言行，你的问题可

真不少,也不小哇!你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办农业增产,反对人民公社化,反对人人写诗,反对的很全面呢!我们党委研究决定,首先,你要写一份书面检查,把事实和错误言论行动都要交待清楚,交待仔细,写完直接给我。第二,你思想上必须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真的懵住了。在云南的几件事,不分大小,不分真假,不分是非,居然全有文字报告上报给总政。我虽知道,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了,但却按捺不住,一股冲天怒火,居然打断了杨秀山主任的话,说:“我不认为我有错误言论和行为,我可以讲清楚的。”虽然,我也认为依据历次运动的规律,我讲清楚也没用。

杨秀山却笑了,说:“莫急,让我把话讲完嘛。我就是心性很急的人,你比我还急?你听着,你调来参加编写二方面军战史,是贺老总指示的,写个材料给我就没得你什么事囉。接受教训就可以囉。我是洪湖人,去年回洪湖看过,有名的鱼米之乡搞得缺粮少鱼,我也讲过怪话的,跟不上么,改了就是,不要再讲就是,讲几句怪话嘛,算囉。安下心来,好好编写战史,莫辜负了老总的期望!”

天哪,灭顶大祸,片言解除。我实在是运气太好!囉!以我这一年的言行,不划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反右派斗争中所受的处分,我还有什么希望?我虽然从来不讲迷信,也不由我不默默地感谢上苍对我的宽厚啊!

忆参加援越帮助土改的岁月

周 星 夫

新中国成立之初，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法战争还处在战略相持阶段。法军占领了城市、交通要道、沿海港口，蚕食分割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根据地，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共中央根据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的请求，作出了援越的重大决策。先派罗贯波为我党中央联络代表，赴越沟通两党关系，调查了解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以便确定对越南帮助的方针和计划。接着派以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方训练、武装部队和作战，后又派陈赓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越南，帮助越军组织实施边区战役，于1950年10月间取得边界战役重大胜利，使越方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越北中央根据地不断得到扩大。为巩固和加强这些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又应胡志明的请求，决定从中南、华东、华北三区中调一名省委副书记并各调一名地委书记和三名县委书记，赴越帮助开展土地改革。党组织决定我参加了这支负有艰巨和光荣使命的援越队伍。

接 受 任 务 前 后

1953年6月，我在济南参加中共山东分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分局组织部负责人找我谈话，说分局决定将我担任书记的沂水地区与临沂地区合并，调我参加赴越政治顾问团任土改顾

问。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并按组织要求遂后在济南做了体检。

7月初，我交代了沂水地委的工作。10日就带警卫员江玉泉一起到了北京中央组织部，报到后我们的组织关系遂由中组部转到中联部，并安排我们住进了中联部招待所。这时已有数名赴越帮助土改的干部在此集结。记得中南地区的干部全是从广西调出的，有乔晓光（广西省委副书记，任土改总顾问，后任政治顾问团副团长，先我们一步赴越）、王浩（地委书记）、林克武（地委副书记）和肖寒艳、马平、杨武成、张志民、张士俊等；华东地区除我外，有沈云（浙江绍兴县委书记）、邵晋潘（江苏松江县委书记）、涂竹溪（安徽六安地委科长）。

约两日后，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召见我们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原准备请少奇同志接见你们并讲话，因他抽不出身来，就叫我向同志们讲讲。他讲了党中央、毛主席应胡志明要求派赴越土改顾问的决定后说，党中央派你们赴越帮助土改，是一项很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越南现在进行抗法斗争，你们是到他们的根据地帮助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这是支援他们尽快夺取抗法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在强调我们这次赴越的重要性时还说，中国与越南唇齿相依，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我国的南大门，我们援越抗法，既是为了兄弟民族的解放，又是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我们派军事顾问团协助他们训练、武装部队和作战是重要的，派你们赴越帮助土改也是重要的。他在讲话中也对我们赴越后的工作提出了原则要求，说我们党与越南共产党是兄弟党，是同志式的关系，要平等友好相处，不要以大国、大党自居。中央要求你们最重要的是与越南同志搞好关系，赴越后要做到：关系第一，工作第二。因你们是顾问，就是参谋，出主意、想办法、协助领导。但不要

包办代替,要谦虚谨慎,严守纪律,尊重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他还强调指出,越南有越南的国情,要从该国的实际出发,不可照搬我国的土改经验。你们提建议要着重有关方针、政策和原则性的问题,对方若有不同意的,也不要强加于人,要注意同他们多商量。他在讲话结束时说,从华北抽调的四位同志还未来到,就不等了,你们可以先走。并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们都表示,请中央放心,一定按中央的指示要求做,并提出可否在赴越沿途参观一下,以便向越南同志介绍我国的情况。他当即表示赞同。

7月18日,我们启程赴越。中联部根据我们的要求,安排我们乘火车走京沪线,经南京、上海转道杭州、株洲、桂林抵南宁。出发前一小时,我忽然吐血,中联部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对我说,到南宁后去医院检查一下吧,票已买好,不好退了,这样我就带病上路了。

沿途一路,我们参观了上述各市的市容和工厂、商店及山水名胜古迹,到南宁后我经医院检查和拍片诊断,是浸润性肺结核,建议休息治疗。当时这种病还属很难治的疾病,大家都很关心,建议我马上回北京治疗。我说战争时期咱们流血牺牲在所不辞,在那么艰苦条件下,坚持工作战斗是常事,也曾带病工作,战胜病魔。现在为了执行援越任务,已经到了边境,就再上越南抗法战场上经受一次考验吧。

我们继续前行,于7月底抵达靠近友谊关的凭祥县。这里设有转送援越军用物资的兵站。我们到后兵站的负责同志说,这里去越共中央驻地有两条公路。一条是经友谊关走越南的谅山省,一条是经水口关走越南的高平省,还说最近法军飞机轰炸过这两条公路,投放了定时炸弹,企图封锁我运送援越物资。你们最好在这里停留两天,看看情况再决定入越时间。

过了两天,我和王浩、林克武见无什么情况,即商定于当晚乘

汽车出友谊关入越。不巧，我们出友谊关后，天就下起了大雨，又是山路泥泞难行，一夜仅走了三四十公里。为防敌机空袭，黎明前我们便在公路旁一个有树林的村庄隐蔽了下来，于第二天晚上终于到达临近越共中央驻地的我政治顾问团所在地。

为实行“双减”和土改作准备

我们到达目的地休息了两天后，驻越总顾问、政治顾问团团长沙罗贵波和副团长乔晓光召集我们谈了越南抗法根据地的区划情况和他们与越共中央研究的群运计划。对越南根据地情况罗贵波介绍说，目前有越北、西北和南方三个联区，联区下是省，越北联区主要有太原、谅山、高平等省，西北联区主要有宣光、山西、富寿、安沛等省，四联区（南方）主要有清化、河静、义安等省。这三个联区只有越北和西北两个联区连成一片，与我国广西、云南两省的边境接壤，均是山区；四联区与这两个联区之间，因有河内、南定等敌占区相隔，联系的通道要经老挝、柬埔寨边界，越南同志称其为胡志明小道。在谈到与越共中央研究的群运计划时，罗贵波说，我们双方认为目前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改革条件还不成熟，主要是越南全国还处于战争环境，根据地的农村未划定阶级成分，干部没有领导群众运动经验，基层党组织不纯，群众缺乏阶级觉悟等。但我们双方都认为必须抓紧进行土改，决定采取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以下简称“双减”）；第二步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逐步将土改运动展开。但第一步非常重要，我们帮助越南已搞了几十个行政村的“双减”，我们务必协助越南同志把工作做扎实。要通过“双减”和增加雇工待遇，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发展和整顿改造好党、政、群基层组织，摸清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使各级干部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树立起基本群众优势，

削弱地主封建势力,以有力支持抗法战争,为第二步搞土改打好基础。这两步不能截然分开,要穿插进行,在“双减”搞几期后,就可一方面继续开展“双减”,一方面在已“双减”过的地区分期分批进行土改,使运动由浅入深,积极稳妥地发展,以适应和发展越南整个形势与任务的要求。

中国政治顾问团帮助越共中央制定了两个开展“双减”的文件,一个是“双减”条例,其要点规定在平分基础上实行“二五”减租,对放高利贷者实行“分半”减息,增加雇工待遇,使其工资达到能养活一口至一口半人的标准。另一个是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基本上参照中国土改中划定阶级的办法制定的。一、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靠剥削农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贷等不劳而获的为地主。二、占有大量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也剥削农民劳动,超过其全家全年总收入的25%或自己参加主要劳动的同时,经常雇用两个以上长工者是富农(每年雇用零工或月工达120个劳动日即相当于一长工)。三、占有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劳动,不剥削其他农民或只有轻微剥削,不超过其全家全年总收入的25%的是中农或富裕中农。四、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部分劳动力的是贫农。五、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是雇农。六、孤、寡、独、残等丧失劳动能力而出租土地的为小土地出租者;医生、小学教员等家有少量土地,不能兼顾耕种而出租或雇人耕种者为自由职业者。七、地主、富农子弟参加越南解放军,立场坚定的都定为革命军人,牺牲的为烈士,其家庭为烈军属,本人可分得一份与农民同等的土地。

对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文件的贯彻实施,实行以行政村为单位,在村政权的领导下,分别召开村民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允许其中辩,三榜定案,报乡一级政权批准。在

帮助制定这两个文件中，我们政治顾问团还帮助制定了农民协会（以下称农会）章程（试行草案），使农会通过运动，壮大组织和强化其作用。同时我们还向越共中央提出了整顿发展基层党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建议。

越共中央对将开始的“双减”工作非常重视，总书记长征、政治局委员黄国越于运动展开前特来顾问团看望我们，并和我们一起座谈商定了第一期“双减”工作的部署，决定三个联区各抽调 400 名左右干部组成三个工作团，在各区的 40 个行政村展开工作。我们政治顾问团负责协助土改的同志，除少数同志留在顾问团团部工作，大部分到了三个联区工作团。我被分到了越北联区，工作团团团长由联区民运部长黄友仁担任，我任顾问，邵晋藩任助理顾问，在太原省的 40 个行政村进行；王浩和沈云、涂竹溪等人被派往西北联区工作团，分任顾问和助理顾问，在山西省和富寿省的 40 多个行政村进行；林克武和另两名干部派到南方四联区，在清化省的 40 个行政村进行。约在 10 月间，中共中央从华北抽调来的地委书记王乐天与三名县级干部到来，顾问团除从中派王达到我处任助理顾问外，其余三人赴四联区工作团工作，先期去的林克武即调回顾问团团部工作。

“双减”工作的展开

越北联区工作团与其他工作团一样，全团干部经一周学习培训，制定了工作规则，要求做到与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站稳立场，不吃请，不收礼。

工作团干部住进村后始终贯彻深入发动群众的方针，既防止包办代替，又防止放任自流，使运动扎实健康的开展。其工作大致是分四步展开的：

第一步,展开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干部进村后,在发动群众中首先到苦大仇深的贫雇(佃)农中,进行扎根串联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形成骨干力量,并依其深入了解全村各方面的情况,充实建立健全农民协会委员会。然后通过农会组织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说明我们工作团干部的来意,宣传党和政府的双减方针政策,提高广大群众对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认识和觉悟。已摸清是地主的,我们住村的干部也召集他们当面讲清党和政府的政策、规定,要他们老实遵守,不许收买群众和抗拒、破坏。

第二步,划阶级,定成分。这一步基本上是按照文件规定的要求进行的。由于住村的干部工作做得较深较细,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第三步,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在住村干部的领导帮助下,由农会组织主持召开村民大会,对地主进行了说理斗争。许多贫雇农泣不成声地以其亲历、亲人、家庭遭受地主残酷迫害,被逼卖田卖房、卖儿卖女和被逼致死的血泪控诉,使全场众人也不禁泪下,一片哭声。地主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低头认罪,一再保证按规定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贫雇农也表示积极搞好生产,如数缴纳租息,双方并签订合同,由农会监督执行。在这些村有力地树立了贫雇农的优势,削弱了封建地主的势力。

第四步,发展、整顿、建立、健全基层党政群组织。在这一步工作中,首先对农会进行了整顿加强。由工作团的干部向住村群众讲解农会章程的总则,使他们懂得农民协会的性质、任务和当农会会员的权利、义务等。还向他们说明了加入农会须经行政村农委会批准方为会员的申请程序。在住村干部的宣传引导下,不仅雇农、贫农积极参加,一些农村的手工业者、工人及贫苦的知识分子和中农也纷纷申请参加,村农会很快得到了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遂对

行政村农会委员会进行了充实调整,不仅选举苦大仇深、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贫雇农参加到村农会的领导班子,还在我们顾问团的建议下,吸收了一定比例表现好的中农或其他方面人员担任了村农会的委员。其后又相继整顿发展了妇救会、青救会、民兵、自卫团等群众组织。整顿改造了村政权,清除了地主、富农分子,充实了坚强可靠的贫雇农出身的成员,也吸收了中农代表参加。对于越共基层党组织整顿与发展,主要是通过形势任务教育、阶级教育和怎样做一个越共党员的讨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其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提高认识,清除了混入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坏分子,发展了一批“双减”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调整充实了支部委员会,有力地加强了党的基层建设,提高了战斗力,从而使树立起来的群众优势得到了巩固、加强和保证。

在第四步工作进行中间,我与在西北联区工作团任顾问的王浩,于10月下旬回顾问团团部一次,由罗贵波主持,乔晓光等参加,听取了我們两处的工作汇报后,研究确定起草三个向越共中央建议的文件。一个是关于第一期“双减”工作的情况经验及第二期“双减”工作的部署意见,由王浩起草;另一个是关于第一期“双减”工作的总结评比,由我起草,乔晓光改定;再一个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双减”工作开展,由我完成。在这个文件中,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在越北联区工作中了解的情况,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双减”工作的开展,应采取各民族群众一齐发动的方针。各民族的群众都是受其民族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压迫和剥削,是一家人,要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与地主恶霸进行说理斗争,干部要依靠各民族的贫雇农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农会委员会与其他组织领导成员中,要吸收各民族的贫雇农、中农及其他方面人员参加,不可偏废。

完成文件后,我即回到了工作团。当第一期“双减”工作结束

后,全团按照越共中央的指示要求,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总结评比。在这次评比中,采取了上下结合的方法,在总结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也正视存在的缺点与不足,表彰了先进组织和个人。通过这次总结评比,普遍提高了全团干部的工作水平,为第二期“双减”工作的展开,从根本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团干部在下边工作生活比较艰苦,在全团干部集中总结评比期间,越方杀猪宰牛,改善大家的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团干部的工作热情和做好工作的信心。这期“双减”结束后,邵晋藩被调到西北联区任工作团助理顾问。

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5月,先后在太原和谅山、高平省进行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双减”工作,为土改工作的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三期“双减”工作中,为了实事求是更好地帮助越方工作,我和助理顾问不仅定期听取工作团的综合情况汇报和工作团巡视员到基层了解的情况汇报,还经常深入到住村干部工作组和群众中了解情况或召开座谈会,也经常翻译的帮助下看工作组的报告,故能比较及时、全面地了解着全团的工作情况,及时向越北工作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土改的展开与结束

在我们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在抗法根据地开展三期“双减”工作中,越南部队又在我国大规模援助和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组织实施了奠边府战役,于1954年5月7日攻克奠边府,取得了越南西北地区解放的重大胜利。是役也促使日内瓦会议对印度支那停战问题达成协议,确定以义安省内北纬17度划为南北分界线,分界线以南为法军临时驻地,以北为越军驻地,越南问题因此得以和平解决。

越南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后,越共中央在我政治顾问团的建议

下,决定实行土地改革,并相继公布了土地法大纲,阐明了土改的目的意义和路线、政策。指出,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指出土改是民主共和国推进农村建设的基本工作,是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在路线上,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推动农业生产。在政策上,对富农土地的剥削部分,实行征购;对小地主的土地实行征收,但给他们留出一份与农民相等的土地;对大、中型地主的土地实行没收,同时也分给他们一份与农民相等的土地;对抗战军人,家是地主者或民主人士是地主的予以照顾;对工商业实行保护,不得侵犯。

1954年7月,越共中央抽调了400余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由政治局委员、全国工会主席黄国越、农业部长胡曰胜,分任工作团正、副团长,进驻西北联区的山西省,在已搞过“双减”的行政村进行土改试点;并计划先在40多个行政村,用两个月时间搞完这期土改试点,然后总结经验在三个联区根据地双减的基础上展开;我政治顾问团先派帮助党建工作的顾问张德群后又派我任工作团顾问。这次土改试点,干部进村后大体也是分四步展开的:

首先是进行土改教育,培养土改积根分子。干部住进村后,在“双减”的基础上,依靠村的党、政、群组织,先在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中扎根串联进行形势教育和谁养活谁的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形成带头响应党的土改号召的积极分子力量。尔后召开村民大会,由住村干部向群众宣讲土改的目的、意义、方针和政策。其后,还以村政权的名义召集地主讲话,向他们宣布政府的政策、法令,警告他们服从政府的法令,不准反抗、破坏。同时在已摸清的阶级情况的基础上,对现有土地的所有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为实行土改做好准备。

其次是发动群众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在农会的主持下，召集群众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大会。深受地主压迫剥削的群众在土改积极分子的带动下，纷纷涌到台下，在农会负责人的主持下，一个个登台向地主进行了血泪控诉。有的揭发地主以高利贷为诱饵，把他家几代人借以糊口的命根子田盘剥了去，逼得全家人背井离乡，使亲人死于逃难之中；有的揭发地主乘灾年交不上地租，被逼上吊、跳井，或卖身抵租；有的以在地主家当雇工的亲历和目睹，揭发地主对他人格的凌辱和对其他雇工与女佣人的毒打与侮辱……使地主在一桩桩、一件件血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按政府的政策交出土地。

再次是严格按政策分配土地。对征购、征收和没收的土地与耕畜、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和财产，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分配。为有利发展生产，避免不必要的土地变动，在原耕基础上，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合理分配土地的原则，适当照顾其中部分原耕农户的利益。对提出的分配方案，通过召开农会和村民大会，进行民主讨论和通过后执行。并规定干部与群众一样，一律不得多分。

最后一步就是在“双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巩固基层党、政、群组织，发展了一批土改中涌现出的政治可靠，并受群众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越共党组织，大力发展了农会会员、青年、妇女和民兵等群众组织与地方武装。进一步加强了村党支部、村行政委员会、村农会委员会的领导，并在进一步充实健全基层各领导班子中，还特别注意吸收了一定比例的中农代表参加，比较好地体现了团结中农的政策。这期土改工作结束后，工作团进行了短期集中学习，总结评比和表彰先进，制定了发展生产的计划，决定在已进行土改的行政村开展生产运动。

越共中央在取得第一期土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遂又抽调干部力量组成两个土改工作团。在第二期土改中，除继续在山西省进

行外,又在太原、宣光、富寿等省展开,计划每地每期仍为40多个行政村。这时各联区的“双减”工作第四期已结束,第五期刚开始。在第二期土改开始前夕,我被调任太原省上改工作团任顾问,越方黎新任团长。第二期土改结束后,由于王乐天回国,我于1954年12月被派往四联区清化省帮助进行第三期土改。工作团团长由四联区党委书记朱文边担任,我任顾问,赵希忠、陈大良、刘良荣任助理顾问。在第三期土改结束后,第四期土改工作展开前,我与刘良荣又到河静省土改工作团,帮助土改。越方为加大土改工作力度,四联区又在义安省成立了土改工作团,派陈大良前去任顾问。在琼流县沿海几个渔民乡,进行土改试点,派赵希忠去任工作团顾问,以便取得经验,指导沿海渔民乡、村的土改。

在第四期土改结束时,越南老区基本上都开展了“双减”,也在此基础上大部分村庄进行了土改。这不仅使老区基本上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特别是获得土地的老区人民,政治和经济上得到翻身,在欢庆抗法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同时,也欢欣鼓舞真正当家作了主人。至此,我援越政治顾问团于1955年9月,奉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回国。越南劳动党(后改为共产党)授予土改纪念章一枚,越南劳动党二级劳动勋章一枚,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自由徽章一枚,表盘刻有胡志明头像瑞士表一只。当我们回到北京后,正逢国庆六周年,中联部安排我们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观看了国庆游行。此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彭真与建国初京郊土地改革

赵友福

京郊农村土地改革,是在毛泽东、刘少奇亲自指导下,在彭真为书记的市委领导下,经过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至9月的认真调查研究准备,于10月1日建国后用半年的时间分三批完成的。

当时的北京郊区,包括现在的朝阳区、丰台区、海淀区、石景山区的大部分和门头沟区、大兴县的一小部分,分7个区、261个行政村、10个关厢、6个镇,有64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35.5万人,耕地110.58万亩。该地区虽小,但土改的难度和意义却非常重大。

当时正是面临全国胜利,农村土改由北方解放区转向解放的大面积新区。由于革命战争超出预料的迅速胜利,在农村土改工作上,出现很多极为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和诸多需要改变的方针政策,党中央还未来得及充分调查研究制定。而京郊周围,当时属于河北省的大兴、房山、良乡、昌平、顺义、通县、怀柔、密云、平谷、延庆等县的平原农村,正开展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京郊农村影响很大。同时,北京市城内各界人士,特别在农村有土地关系、亲属关系的市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京郊农村如何进行土改甚为关心。

1949年1月26日,中央给东北野战军并北平市委等的电报指出:“我军人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中央认为东北野战军提出的口号有的不太合

适,如“‘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消灭封建势力’一条宣传出去,必致惊动许多老官僚老军阀及大批藏在北平的土豪劣绅,以为就要动他们了,他们将大起恐慌”。要求:“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绝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重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示,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①

上述情况说明了京郊实行土地改革的复杂性、难度和重要性。中央的电报,为全市工作特别是为京郊土地改革指出了方向。彭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中央精神,制定了适应京郊土改的政策和策略,为全国新区土改特别是城郊土改,提供了重要经验。

(一)

从1946年开始的解放战争年代的农村土地改革,大部分是采用暴风骤雨的方式进行的。有的地方,甚至采用过一手拿枪、一手土改,打到哪里,马上土改。1947年的土地平分,也产生了一些左的毛病。毛泽东在1948年总结了以往土改特别是1947年土地平分的经验,在1948年2月,连续发出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指示。明确指出:“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的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① 《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提宣传口号给东野前委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536页。

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①5月24日又指示:“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②

北京郊区农村的土改怎么办?这是彭真在北京解放前夕就反复考虑的问题。1948年12月29日,彭真在良乡同刚组成的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邓拓等同志,谈进城后调查研究工作时说道:“要了解群众究竟需要什么,是土地,是减租,或是其他要求?北平解放后,人民总会有一些要求的,就是要得到些什么。我们的纲领、政策,就是从现实的具体要求中经过分析综合而系统化了的的东西。”^③彭真在这里特别指示研究室调查郊区农村,是分土地,还是减租的问题。1949年1月6日,彭真在良乡城关对准备进城接管工作的干部讲话时,关于近郊农村工作说:“北平近郊今年是否分地还没有决定,打算先调查一下,提出具体办法,以后解决。但必须宣传我们的土改政策,可以对贫雇农说,在你们组织好以后就可以分地。对中农,我们决定采取不侵犯态度,对其土地不动,应该团结他们。对地主不打不杀,对地主的工商业也不侵犯。”^④彭真的这个讲话,很有针对性,讲了对中农土地不动,就等于宣布不搞解放区

① 毛泽东:《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② 毛泽东:《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6页。

③ 彭真:《先了解情况,后决定政策》,《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④ 彭真:《掌握党的基本政策,做好入城后的工作》,《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第16页。

搞过的“土地平分”。但彭真没有讲土改具体的时间和对富农怎么办，实际上是等待中央指示和在实践中进一步调查研究确定。

1949年1月中旬，近郊各区工作组下乡发动群众摧毁伪保甲、建立人民村政权工作。普遍召开贫雇农、佃农、中农等各种座谈会，调查伪保甲人员情况，村里阶级情况。发现积极分子，培养人民村政权和村农会的骨干，同时结合宣传土改政策，进行土地占有及经营情况调查。接到中央电报指示后，更加强了调查。

2月中旬，各方面调查情况及土改意见陆续上报市委。2月13日，当时的军管会东南分会主任柴泽民向市委报告，着重提出：当前春耕在即，应首先确定稳定群众情绪、土地不荒芜、农民有地种的若干政策的建议。彭真批示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当时名字是赵振声）和市委研究室主任邓拓进行研究，提出意见。

2月14日，邓拓把市委研究室对郊区12个村的农村土地调查材料，改写为《关于北平郊区土地占有关系及今后土地改革问题》报送市委。这个报告首先初步分析了城郊土地占有和经营的特点，提出了土地改革政策的建议。同时提出了郊区土地改革的实施步骤。报告说：“根据郊区土地占有和经营特点，一方面我们必须用适当方法（照顾经营特点和城市发展）来满足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京郊四周（河北省）乡村都已经或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郊区农民们都希望赶快分地，不能再经过几年减租。……另一方面，因这一地区解放不久，我们只是进行了粗糙的初步的调查，不细致、不全面，因此也就不可能反映完全真实的情况，而不可能做决定政策的充分根据。同时，群众政治觉悟还不够高，群众组织还没有形成，我们的干部力量还相当薄弱，加以春耕在即，如果我们现在毫无准备地去急促进行土改，则势必会搞乱，影响生产。因此我们认为土地改革应该推迟到秋后去进行，以做到有计划、有组织、有充分准备。”报告提出了同柴泽民报告相同的意见，

即近郊土地改革工作分两步走：当前主要做好两项工作，第一，目前为了不影响春耕生产，当立即宣布谁种谁收，稳定生产情绪，叫大家把地都种上，不使荒芜。对地主富农进行教育，告诉他们荒芜土地将会增加自己罪恶，好好耕种，将对自己有好处。对劝告无效、荒芜土地的地主富农，可采用强制的办法，令其种上，不采用组织农民抢种的办法，以防搞乱，或有不好影响。同时应宣布地主富农不许夺佃及无理解雇工人。对已经被无理解雇的工人，要组织他们要求复工。对已经夺佃的，要令将夺佃土地退还佃户耕种。同时宣布取消二地主中间剥削，已交上打租的要退租给佃户。另外则应宣布：为登记、清查土地，暂时停止土地买卖。对中农要肯定地说明，不但现在、即在将来也坚决不动，以稳定其生产情绪。对于非农业工人、失业工人，要采取组织各种生产的办法，来解决其生活问题，而不应从土地问题上来解决。第二，目前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秋后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在组织上结合春耕生产和选举村政权，同时组织农会，以贫雇农为骨干，巩固地团结中农。更为重要的是继续进行能代表全面的典型村庄的土地调查研究，并着手研究制订秋后土改政策。

市委副书记李葆华依据市委研究室提出的意见，请示彭真同意后，于2月26日召开各区委和市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农业土地问题会议。在听取了各区委和各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后，李葆华总结指出：就北平城郊情况来讲，当前全面进行土改还是不可能的。因为情况还没有深入了解，对上改的政策办法的考虑还不成熟。但是今年根本不解决土地问题，这会脱离群众。因此，当前可以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一些问题，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要放在秋后。李葆华着重讲了当前重点宣传贯彻“谁种谁收”的有关政策，同时强调了各方面特别是各区委要切实抓紧秋后土改的准备工作。

会后，为了把市委确定的“谁种谁收”等稳定群众情绪和调动

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直接告诉群众,根据各区委的要求和市委研究室的提议,用市政府名义正式发布了布告。各区委通过各村工作组,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市委为了加强郊区工作的领导,于3月20日成立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这样使郊区的春耕生产、建立村人民政权和土地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更有领导地加快了步伐。

(二)

根据中央电报中指出的:“乡村的土改办法绝不能施行广大城市附近”的精神,彭真责成市委研究室研究在北平城郊的土改政策放宽什么、放宽到什么程度、理论根据是什么?按照中央精神并结合近郊农业土地情况,制订从京郊实际出发的土改政策。

市委研究室根据彭真指示,经过对在城郊12个村土地占有及经营情况进行的调查研究,认为城郊土地占有和经营的主要特点是:

一、土地高度集中,大部集中在封建地主手里。一般大地主,又是封建贵族、军阀、官僚。如南苑“海子里”,有60户这类地主,占有40多个庄子,占有土地52792亩。龙河村,就有徐永昌、李培基、石友三、李守信、刘汝明等17个军阀官僚占有13940亩土地,在经营上也表现了有浓厚的封建性,一般地主的土地多是出租,许多则是出租土地的全部,本人在城市赋闲,坐享其成,而且二地主较多,层层转租、加租、收上打租。同时富农数量较少,据粗略统计近郊区富农共1600多户,共占有土地88700亩,其中自耕和雇工耕种的占6万多亩,出租部分2万多亩。

二、土地经营上的主要特点是农业生产呈现商品化趋势。在富农、佃富农特别是农业蔬菜、果品、畜牧等资本家的经营中,适应城

市蔬菜、果品、牛奶等需要,开展风障、阳畦和温室等设施园艺蔬菜生产。在一些稻田还添置了电力水车等设施和采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增加了生产,对农民也有示范作用。

在彭真领导下,市委研究室依据上述情况和毛泽东思想结合,分析提出: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的策略中,把“半封建富农”同“资本主义富农”加以区别、把富农的自耕和雇工经营部分同出租部分加以区别对待的主张。即:在土改政策上规定:征收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对富农自耕和雇工耕种土地不动。认为:投资于农业生产以新方法经营的富农或农业资本家,他们是农村进步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因而应实行劳资两利的保护政策。

市委研究室这种分析认识的产生,就是根据彭真指示,认真研究京郊实际,同时,认真研究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村富农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的精辟分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说:“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①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决定各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明确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但是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红白对立。由于战争的政治原因,土改中在贫雇农和高农这两头,只能顾贫雇农的土地要求这一头。现在战争年代的土改已经过去。处于建国、执政、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大环境下,在大城郊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页。

土地改革政策上的放宽,关键的一条,应该是在对富农自耕和雇工经营的土地问题上放宽。

市委研究室的建议,得到彭真和大部分领导同志的赞同。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到对待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政策时,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①

经过反复讨论,土改中保留不动富农的自耕和雇工经营的土地认识就更明确了。作为市委于1949年4月底向中央上投的《关于北平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定》的十二条政策中的第一条就规定“所有自耕农民之土地,包括富农自耕部分之土地在内,其耕种权与所有权,一律照旧保持不变”。第四条“凡是使用机器耕种之土地,不论其所有权有无变动,一律原耕不动”。

刘少奇于1949年5月1日批示:同意这个决定,在发布前最好能召集几个党外人士商量一下,如果他们同意便立即发布实施。

彭真遵照刘少奇批示,多次召集余心清(民革中央负责人)等民主人士座谈土改政策问题,听取意见。通过座谈,增加了为生产供应城市人民蔬菜的阳畦、温室等园艺的土地不能动、有进步和改良设施的农田不能动等内容。

(三)

当时北平郊区土地问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紧靠大城市,是城市建设扩展基地;人多地少,聚居着大批非农人口。在264个行政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31页。

单位中包括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阜城门、复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等 10 个关厢和丰台、南苑、海淀、西苑、颐和园、北苑、长辛店等为北平城市服务的小城镇。郊区共有人口 64 万人,其中从事种地的农业人口 35.5 万人,有 40%多的人口为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三轮车夫或其他城市贫民。他们不以土地为生,也不会种地,但听说解放后要搞土地改革、分地,绝大部分又希望能参加土改分得一份土地。北平郊区土地问题的这些突出特点,便成为制定近郊土改政策的另一个新的特殊问题。特别是规定了中农土地不动,富农的自耕和雇工耕种的土地不动,有机器等先进设施的土地、园艺不动以后,只靠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可分配数量不多。市委在研究土改政策的过程中,同意了市委研究室提出的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只分配给依靠种地生活的贫苦农民,非农业人口和失业工人应采取组织各种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生活出路问题,不应从土地上来解决的意见。研究过程中又规定了对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为国有,只给缺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无偿使用权,不准出卖。这个办法,既解决了土改分地同以后国家建设用地的矛盾,也解决了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争着分地的矛盾。大家都赞成。彭真在农村干部大会解释“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时说:要向农民讲清楚,不管有没有所有权都没有差别,地归你种、不交租、不出钱买。要是分得土地有所有权,每个人一份,不种地的都来了,自己不种也可以卖嘛,哪怕一亩、八分都要,农民使用的土地就要减少。同时,郊区将来要盖工厂、要建设,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征用比较方便。种地农民土地被征用了,当了工人,比种地强多了。

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讨论,没收地主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为国家所有,分配(不是平分)给无地少地农民无偿使用(非私有)这项在土地改革历史上带有创举性的政策便形成了。

《关于北平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规定》，除了上述规定外，还规定：原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使用地主的农具、耕畜归佃户所有，经批准征收一部分地主的粮食，分给缺少资金的农民，但其他浮财与底财不动；佃户预交地主的租金或押金退还佃户，无劳力或从事其他职业的小土地出租者不动；可耕荒地由政府分给农民使用，免税一至三年。在土改的搞法上规定：没收与征收土地工作，在政府领导下由农会执行；对土豪恶霸罪行，人民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听候法院判处，但群众不能直接采取吊打等行动。

为了保证上述“决定”的实施，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简称郊委）要求每个区都搞两个试点，对政策进行实践检验补充。试点证明：没收地主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为国有，分给无地少地农民使用而不给所有权，对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动，保留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政策对多方面都有利，是农民可以接受的。但也有些耕地少的乡村贫雇农认为可分得的土地少而不够耕种。对此，市委郊委研究并请示彭真同意，在可分土地少的乡村，在整体政策不变前提下，执行政策掌握上有些松动。概括为“五动”、“四不动”。

“四不动”即：（1）中农土地不能动；（2）为供应城市蔬菜的园艺生产不能动；（3）有进步改良设施的农田不能动；（4）地主土地没收后分到土地的雇工愿意合伙集体耕种可以不动。

“五动”即：（1）地主富农或公有荒地可以动；（2）恶霸地主、富农强占的土地可以动；（3）地富租种的公地及租人其他地富的土地可以动；（4）地富经营不良的土地可以动；（5）和尚、道士经营的庙地可以动。再不够，可以酌情从经营地主、农业资本家或佃富农使用的土地中调剂，自然村间土地不平衡可以调剂，非农业人口特别困难的，在条件可能时，可适当照顾分地。

(四)

经过了一系列的充分准备工作,1949年10月17日,市委郊委召开郊区干部扩大会议,彭真亲自做开展土地改革的动员。彭真说:“我们这几天开会,主要就是为了消灭封建制度,解决土地问题,就是挖封建的根。”“我们下去给农民开会讲简单的两三条就够了,那就是把地主打倒,分土地,搞生产。谁来办呢?农民自己办。就是农民自己动手,打倒地主,调剂土地,组织生产。”¹ 彭真在强调农民自己动手上,要“四要四不要”。

第一,一定要群众自己起来动手解决自己的问题。群众自己调查,自己讨论,自己分配土地,干部不要包办代替。

第二,要斗特务,斗恶霸,一切阻碍土地改革的都要斗。要做到地主见了农民不敢抬头,害怕农民,见了农民赶快让路。要把力量组织起来,和阻碍土改的地主、特务、反动势力作斗争,使农民在敌人面前神气十足。发动群众起来与地主、恶霸斗争,要告诉农民不要乱打、乱杀。不是一个不杀,我们开会控诉,该判刑的送法院,法院判决有罪该杀的还要杀。不要自己动手打、吊、杀,免得把不该杀的杀了。

第三,要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粮食、农具,但是不要进城来抓。

第四,还要告诉农民,对没收的土地、房子、农具要公平分配,区、村干部不要有私心,不要只照顾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如果区、村干部稍有一点偏心,群众就不拥护我们了,大家就要讲话了。

¹ 彭真:《发动农民,自己动手消灭封建》,见《我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第33页

彭真特别强调农民自己动手,从调查研究入手,一是调查阶级,二是调查土地财产。土改搞得好坏,头一个就是看阶级是否划得准确。要把划阶级的标准告诉全村的人,告诉大家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不仅告诉中农、贫农,还要告诉地主、富农。先由农民开会讨论,最后定阶级的时候,本人可以到场。地主富农可以提意见,划了以后不服,可以告到法院。这样可以避免划错,免得把中农划成了富农。

为了有领导地贯彻执行彭真关于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开展斗争、消灭封建的指示,市委和市委郊委领导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如划分阶级成分要本人到会、自报公议,允许申辩、区委审批、三榜定案,定案后不服可以上诉。对有一般罪行的恶霸大会斗争,工作组要协助农会整专题材料,经区委审查批准。为了便于受理上诉和依法处理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地主恶霸,市委决定成立“郊区法院”,由市委郊委书记柴泽民任法院院长。这样从划分阶级成分、自报公议开始,就很自然形成了对地主分子不同层次的说理斗争。开始对自报土地、财产剥削量不实的一般地主分子,农民通过摆事实、算细账,进行说理驳斥;农民通过内查外调,查出一些有意隐瞒少报、抵赖并有一些欺压农民问题的地主分子,也就自然转向农会开小型会议批判揭发促其认错;随着批判揭发的深入,查出一些有罪行、有民愤的地主恶霸分子,经过农会调查核实写出专题材料,报区委批准大会斗争,苦主大会控诉。随着斗争深入,大会斗争的地主恶霸应判刑者农会就向郊区法院起诉,由法院判处。在土改过程中,全郊区共斗争了130名恶霸,其中30名罪大恶极由法院判处,小红门村地主恶霸双德利罪行极其严重被判处死刑。这些被按刑事处理的在判处时,都在当地开几千、上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对于三榜定案划定阶级成分不服上诉的,同样进行认真复查,如海淀区有46户地主富农提出上诉,经严格审查,其中有5户改了成

分,有1户评为地主,上诉到中央政务院,经派人调查反复核实,最后改划为富农。在彭真领导的近郊土地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既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又严格执行政策,就是既发扬了老区土改开展农民控诉斗争的优点,又没有发生乱斗、乱打现象,更没有出现全国新区土改中有些地方搞和平土改的现象。

(五)

近郊土地改革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试验。从郊区本身来说,第一,实现了农民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解放。通过农民的忆苦教育、划阶级成分和对地主恶霸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真正提高了阶级觉悟,学会了当家作主的本领,成长了一批优秀党员和农村工作骨干,特别是通过斗争地主恶霸分子,撕破了他们剥削人压迫人的丑恶嘴脸,使他们威信扫地,遇事怕农民三分,土改后他们的言行处于农民严格监督之下。这是土地改革的巨大成果,对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具有重大意义。农民通过教育、斗争,在懂得受穷、受剥削的阶级根源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分得了应得的土地,有了土地这个命根子和种地的自主权、生命权。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共没收和征收土地40.29万亩及一批牲畜、农具、粮食,使22万贫雇农人均分得土地近2亩,加上各种荒地、公地,大部分村子人均耕地3亩左右。

第二,达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仅贫雇农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中农、富农生产情绪也高涨,土改后兴起打井、修水利、深翻、购置牲口、农具,发家致富的热潮。在近郊土改后的1950年,就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竞赛经营的形势。一,出现了十几个国营农场,其中有4个接收敌伪的资产组成的农场;有6个是没收地主庄园组成的国营农场;有1个是接管的大学试验场。还有农业

部直属农场。这些农场共有 10 台拖拉机用先进科技耕种。二,有 280 户土改中保护下来的从事果园、牛奶粮菜生产的农业资本家,土改后适应城市的需要,更扩大了生产。三,有 16 个由地主长工分地后仍坚持集体经营按劳分配的合作性质的“锅伙”。四,有一大批农民自身生产需要自愿临时组织的生产互助组;还有更多的包括中农、富农的个体经营。1950 年粮食增产近三成。

第三,经过土改斗争建立了比较坚强的村级党组织、政权组织以及农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威信高、讲民主、说话灵,工作一片新气象。村里工作,形成党支部一呼百应局面。特别是青年男女投入了学文化、学政治、求上进和开展生产竞争的热潮。

从全国来说,京郊土地改革的成功探索,也为制订全国郊区土改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北京市委在土改政策策略上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引起了城内外社会各界的好评。特别是一大批大专院校师生参加了土改工作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及各界人民参观了土改,对京郊在富农政策和依法没收征收的土地为国有,分给无地少地农民使用的政策,以及对不同地主分子、不同斗争方式、对罪恶极大的依法判处等做法反映很好。这些好的经验,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周恩来 1950 年 1 月 13 日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规定了 13 项办法,有 1 条吸收了京郊土改的经验。之后,政务院发布《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也吸收了类似的规定。

1950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给各大区的中央局负责同志写信,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指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看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

这样做是否有利些。”信中要求各中央局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将赞成意见、反对意见迅速收集起来，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①

各大区按照中央通知，进行了认真讨论和广泛调查。绝大多数地方同意中央不动富农的土地包括出租土地在内。中南局同意中立富农方针，同意不动富农的自耕土地和雇工经营的土地及其全部财产，而富农出租的土地应该动。

在此期间，彭真也参与了讨论。针对讨论中的不同意见，他指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提法好。遵义会议以后，五四指示都如此说，毛著中也如此说。将来时间维持的久，可以代表一个阶段。”

“富农出租土地，总是保存不住的，说不动，不久又动，反复多变。现在动，贫雇农多得点，有限。将来动，抽补仍给贫雇。经济转移的中农会得一些。”

“现在有许多敌人需要对付的紧张情况下，不动好。孤立地主，安定中农，鼓励生产，安定民资，有很大好处。”

“如有些地方因此而贫雇农所得者太少，富农出租土地超过一定额者，超过部分拿出。因为这已非富农经济范畴内。”

1950年6月6日，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内容之一是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毛泽东、刘少奇都讲了话。会议还印发了《京郊土改总结》供到会者参考。毛泽东讲话中把完成新区土改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好转的首要条件，并特别讲到对富农政策的转变。他说：“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

^① 毛泽东：《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8页。

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①在会议审议《土地改革法》草案时,讨论比较多的是富农政策问题,中南局的同志还是坚持应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意见,建议不要把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说得太死,应该机动一些,如果有的地区土地特别少,那么就可以经过省政府的批准,允许实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政策。经过讨论,会议接受了中南局的意见,《土地改革法》草案增加了此项内容。

《土地改革法》中也吸收了彭真的意见,规定:“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一届二次会议,讨论由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讨论中很多党内外人士联系京郊土地改革中对保护富农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倍加称赞,同时也对草案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执行。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委员会,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建议,通过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并于6月30日正式颁布。

1950年7月1日,彭真写信询问市委秘书长顾大川和郊委主任柴泽民、副主任周凤鸣,“在《土改法》公布以后郊区封建势力有无向农民反攻倒算情况,请作一核查,并预先给各区委以原则指示。”

市委郊委检查后及时报告彭真,报告说:“郊区的土改政策,与新的土改法的基本精神相符合,各阶层生产情绪安定,农民生产热

^①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0页。

情提高。”

在全国宣传贯彻土地改革法开始，新华社于 1950 年 7 月 5 日，约北京市农会筹委会主任柴泽民发表谈话，用北京郊区土改实践说明：“根据北京郊区实行土地改革的经验，保存富农经济在今天是不必要的。北京郊区在土改中没有动富农的自耕和雇工经营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这对于郊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已经证明极为有利。”

（本文作者系原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认识和思考

张 士 义

怎样认识和对待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将根据毛泽东在思想认识上的发展变化,分三个阶段对此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特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构想,并结合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实践,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具体构成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指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在经济上的主要特征是:1、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遭到了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并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3、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

经济命脉。^① 中国社会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②。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来说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虽然在一方面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一方面会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又会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③

根据上述分析，毛泽东提出了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构想，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扫除农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6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

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他认为,这种废除了封建剥削和实行“节制资本”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包括农村中的富农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形态,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上述构想,既是凭借自己的理论思维分析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后而得出的一种逻辑结论,同时也是受当时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具体经济形式的启发而形成的一种初步认识。从当时已实行了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来看,虽然农民的个体经济还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以政府、军队和机关学校举办的生产企业为主体的公营经济和以劳动互助为主要内容的变工队、扎工队等合作经济形式也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当然,根据地存在的这些经济形式与毛泽东所设想的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是有很大区别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提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构想后,为陕甘宁边区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随着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逐步推进和各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变化,从1943年起,毛泽东先后在《组织起来》、《致秦邦宪》以及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和讲话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具体构成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首先,分析了农民个体经济的特点和性质,并把这种经济成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

排除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之外^①，认为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农村的主要经济成分应当是合作社经济。

毛泽东分析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②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应当“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③

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后仍然存在的农民个体经济，毛泽东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方面，这种经济已经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因素，具有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因此，“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④；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农民的个体经济不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范畴，它应当而且必须向着合作社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现在的新民主主义”才能在将来“发展得更加完整”^⑤。

其次，分析了组织合作社的历史意义，提出了发展合作经济的具体形式。

① 由于在实行了土地改革后的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和劳动互助运动，所以，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估计到农民个体经济在从封建剥削压迫下获得解放后还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5页。

⑤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边区组织劳动互助的成功实践,使毛泽东对组织合作社的意义和发展合作经济的具体形式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认为:合作社是党“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它可以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大大提高”。组织合作社“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是继土地改革之后的“第二个革命”。^①

根据边区劳动互助运动的实际,他提出,除了发展农民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之外,还可以而且应当发展农民的消费合作、信用合作、运输合作以及手工业合作等经济形式,组织多种类型的合作社。^②

第三,强调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的不同类型及其性质。

毛泽东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③他解释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

^①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权下是无害有益的”^①。

为了进一步说明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克服党内存在的害怕资本主义的倾向,毛泽东还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的不同类型及其性质。他指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后者比前者进步些,它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就国内而言,“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还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②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具体构成作出了明确的表述。他说:我们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③

二、解放战争时期

随着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时局转换,国内阶级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范围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具体构成有了更加全面、具体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就新民主主义经济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0—101页。

②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9—19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8—1060页。

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和方式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并明确规定了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应采取的方针和政策。

随着国共关系的再度破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对象。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和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毛泽东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及其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20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100万万至200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他指出: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①

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的主张。他解释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②他在总结没收官僚资本的意义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①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一般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也更加丰富和具体。他认为：被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他强调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② 他还说：除了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即上层小资产阶级）之外，“还有不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对于这些小工商业者，也是应当坚决地予以保护的。”^③

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和新区土地改革政策的逐步实施，毛泽东对农民个体经济从封建剥削下获得解放后继续存在的长期性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并逐步把这种经济成分纳入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范畴。1947年12月，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谈到农业经济问题时，虽然强调了农业经济“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但是，他已经认识到，农业经济“在一个颇长的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所以，在描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时，他不再把农村中的经济成分限定为合作社经济，而是使用了“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4—12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5页。

济”这样一种很有弹性的表述方式。^①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各种经济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时,承认农村个体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并表示“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②。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党中央收到了张闻天代表东北局就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问题写给中央的报告。张闻天在报告中提出:小商品经济(主要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在数量上占完全的优势;“由于我们这里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所以小商品经济的最后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还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斗争过程。”^③张闻天的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对他确认农民个体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及其存在的长期性作出了明确的估计,并把它确定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这种个体经济,是人民共和国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之一,它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④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也有了新的认识,并对发展合作社的艰巨性做出了较为客观的估计。他分析说:“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146页。

③ 《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1433页。

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① 在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合作社的速度和时间问题。他说:“合作社必须发展,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但合作社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②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分析指出:在组织合作社问题上,“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他认为,合作社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并加以推广和发展的,因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③

由于张闻天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作了全面的分析,并且毛泽东认为张闻天的分析是对的,“与九月会议讨论的精神相符”^④,所以,他本人并没有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再进行专门的考虑,而是直接吸收了张闻天的思想,并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全国范围内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毛泽东对各种经济成分认识的不断丰富,他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1949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经济成分包括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0—14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注〔8〕。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注〔8〕。

本、个体”^①。同年3月，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②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日期的临近，毛泽东还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和方式问题进行了思考，并由此提出了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应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将持续较长时间，大约十几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刘少奇谈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③他还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们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④

根据这种估计，毛泽东明确规定了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应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他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注〔8〕。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

③ 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6页。

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是完全错误的。”^①

三、建国后初期(1949年—1953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的估计,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具体设想,主张在将来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再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在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过程中,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结束后,即应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为此,他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三年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1432页。

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① 1950年6月，他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要用三年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准备条件。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具体构想。他在会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写道：“‘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② 3月30日，他在《对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中又作了如下批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③ 5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详细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央的计划，毛主席讲过，大体上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三年准备从前年十月一日算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头三年做准备工作，以后十年就是建设”，“准备什么呢？军事的准备，政治的准备，文化的准备，经济的准备，各方面的准备要在这三年之内准备好，以便于今后好建设”，“在三年准备以后，我们就来一个十年经济建设计划。十年以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一下。我们不但有庞大的农业，而且还有不少工业。那时我们就做到了自给自足，使中国变成一个比现在富足的国家。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十年以后可能采取某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那时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再等几年。”^④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13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页。

④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78-182页。

然而，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完成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即将实施，从1952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经过反复酝酿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2年9月2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定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① 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个新的设想，并交代说这还不是决议，不要向下传达^②。

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仍在思考怎样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月31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2月1日，他在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一个文

①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214页。

②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09页。

件上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认为: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他像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2月27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说: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来看,促使他改变“先建设,后转变”的设想,主张“一化三改”同时并举,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工商业中的公私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财经的统一、市场的稳定,国家已掌握了重要的工矿企业、铁路、银行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国营经济已占主导地位。1952年下半年,在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中,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56.2%降为32.7%,而国营企业则由43.8%升为67.3%;在商业中,虽然在零售方面私营还占67%,但在全国商品总值的经营比重只占37.1%,而国营加合作社经营已占62.9%。^②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逐步缩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增加的变化情况,是毛泽东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和考虑提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依据。

第二,苏联经验和斯大林的影响。毛泽东在重新考虑向社会主

①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14—215页。

② 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39页。

义过渡的时间和方式问题时,不仅测算过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而且在提出新的设想后,还曾于1952年10月20日专门写信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办法,所以,毛泽东坚定了“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思想认识,并且提出了“学习苏联”的口号,强调:“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①。

第三,为了减少社会震动,保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毛泽东在说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和解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一再强调要“逐步过渡”、“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要“稳步前进”、“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这表明他在重新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时,是非常慎重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毛泽东改变原来设想并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观原因所在。

经过慎重思考和反复酝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出了明确的表述。他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②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毛泽东明确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3—261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90.1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04页。

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① 他解释说:“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②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的设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它也表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内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张。历史地看,他的这种思想转变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今天,我们回顾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认识和思考过程,对于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的起源,深入领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高执行党在新时期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不无裨益。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页。

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

庞 松

关于新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以适应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提出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和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路。这是整个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带有刘少奇个人的理论特色。

一、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构想

从1948年下半年起,作为筹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准备,刘少奇受党中央、毛泽东的委托,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建立新中国经济的问题,并在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讲话。随后,他在视察天津等多种场合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其中,包含了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特征、运行方式及有关原则的理论思考,为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勾画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一) 严格把握国民经济计划性的限度

刘少奇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不同于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在于它“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的经济”,必须首先在国营经济中适当地实行计划性,并经过组织合作社,采用

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使“整个国民经济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以内有步骤地加以组织,一步一步地使之成为具有计划性的经济”^①。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从当时的认识来看,党的社会主义观又是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要逐步地走向计划经济,在党内是毫无疑问的。

在这个基本认识下,刘少奇着重从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小生产仍占极大优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占相当比重的现实出发,强调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内的计划经济”。事实上,“农民小商品生产者是靠市场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但在国家没有经营,或者虽然经营了,却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领域,要帮助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为此,必须严格地防止“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②这种严格把握国民经济计划性的范围和程度的思想,表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计划与市场并行,具有计划性和市场调节两种机制共同发生作用的特征。

(二) 必须采用经济方法管理国民经济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分工合作,也有矛盾和斗争。刘少奇指出两者的关系是处在一种竞争的地位,这种竞争首先是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他认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投机资本是不合法的,因而要采取行政的手段加以禁

^① 刘少奇:《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若干修改》(1948年10月—12月),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2页。

^② 刘少奇:《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若干修改》(1948年10月—12月),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0、32、42页。

止。但就基本方面而言，“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对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①。刘少奇解释说，在经济竞争中，决不能采取不择手段挤垮对方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而要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采取等价交换、同资本家直接订立交易合同等合法的方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②，重要的是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提倡“彼此有益”的竞赛，共同促进生产发展。刘少奇强调为了正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掌握经济竞争的方法和手段，必须迅速学会管理经济的一切知识，特别是学会文明地经商。刘少奇的这些论述体现了新中国经济体制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必须主要采用经济方法和经济手段，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有效地实施管理。

（三）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

在对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的分析中，刘少奇十分重视处理小商品经济所关联的市场关系问题。他阐述了小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商品，要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些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时才能实现。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正是经过这种商业关系，把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的小生产者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构成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因此，“商业就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③。从这一观点出发，刘少奇鲜明地提出必须克服旧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强调既要重视生产，也要重视商业。这里所说的商业，实际是一种“大商业”概念，它既包括了进行商品

①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9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1、55页。

② 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2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97页。

③ 刘少奇：《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2页。

交换的市场,又包含了市场对商品生产的引导,以及生产、销售和消费三者的相互关系,刘少奇认为,商业,即对市场关系的处理,与农业和工业处于同等重要地位,“这三者是有机体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的”^①。

在商品经济的各种关系中,刘少奇特别注重供销合作社与农民、小生产者的关系。他指出,供销合作社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社员提供所需的生产资料,推销所生产的商品,因而它是可以在广大的范围内,代替私人商业分配商品的社会作用,并和国营经济共同与旧资本主义成分进行竞争的“伟大经济系统”。针对有人认为供销合作社“不创造价值”的观念,他强调“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反过来它又可以支配生产”;“要看到商品是经过市场来分配的”,“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关系,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②

把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摆在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这的确是相当深刻的见解。对此,刘少奇提出,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不要单纯恢复旧的,而要多想办法打通渠道;要与商业资本家合作,要组织推销工农业产品的交易市场,“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③。刘少奇的这些论述,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又一条重要原则,即必须围绕建立市场关系这一中心,一方面把城乡关系活跃起来,以刺激商品生产,使市场上的商品多起来;一方面通过供销合作社来组织和开展带有一定计划性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①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5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5页。

② 《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17页。

③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1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83-84页。

(四) 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

在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思考中,刘少奇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重要的体制因素。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①。所谓“适当条件”,就是国家在彼此两利的政策下与资本家订立合同,使资本家愿意接受国家监督。他主张,在工业方面,可按行业组织不同的企业公司,让私人工厂也参加进去,公司中有国家的,也有私人的,可以减少相互间的竞争,避免竞争带来的损失。除私营工厂以外,还要考虑对私人银行、私营商业也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解决:一是替投机资本找一个正当的出路,并使大量的商业资本流向合法的生产事业;二是在国家的监督下,让私营替我们收购物资,利用私人商业资本替我们周转。包括国家尚未开发的矿山,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矿山、工厂等,也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可以颁布法律使其接受我们的监督。^②只要我们的条件适当,又保证资本家开工厂、做生意有一定的利润,资本家一般是可以接受国家监督的。刘少奇认为,在建立全国政权后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可以比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这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的来说,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思考,把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相应的市场关系,同“逐步地实行计划性”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一种既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适合于逐渐向社

①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5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2页。

② 刘少奇:《中国就要进入建设时期》(1949年5月5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4页。

③ 刘少奇:《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1948年12月25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2—53页。

会主义过渡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些意见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有许多观点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吸收,并体现在《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中。建国初期,一方面市场调节在国民经济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统一全国财经和国营经济的增长,又在经济生活中注入了必要的计划管理因素和国家经济政策的调节作用。这种经济调节手段上的双重性,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运行的特点。

二、改进计划体制、增强经济活力的思考

随着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发生变化。在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国民经济中的计划性不断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缩小,直至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形成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1956年党中央开始初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重大挫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就改进计划体制和增强经济活力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一)经济体制要适应经济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组织形式过于单一的缺点,党的八大采纳了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意见,允许一些个体手工业户、小商贩仍保持单独经营,一部分农产品进入自由市场,使国内经济一度活跃,许多地方出现自发经营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成为社会上关注的问题。1956年12月,刘少奇在传达毛泽东关于“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意见时说:“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①。

正是从比较的角度出发,刘少奇深入考察了计划经济的缺陷。他指出,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个、几十万个,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多种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由此,他阐发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②。

刘少奇提出,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计划性、多样性、灵活性几个特点,最重要的是“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③。他认为“这也是个体制问题”。为此,要利用自由市场,地下工厂,还有农业上的家庭副业、自留地等个体的、私营的经济活动,来增强经济的活力。他指出,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会钻空子,当它一钻出空子,社会主义经济就立即跟上;它钻出几十万样,社会主义经济也跟上去搞出几十万样。^④这样经过比较和竞争,整个经济就活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就会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

(二)注重解决分配制度中的深层次问题

建立适合调动全体劳动者积极性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职能和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刘少奇着重强调:“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

① 刘少奇:《准许私人开工厂》(1956年12月29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27页。

② 刘少奇:《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1957年5月7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50页。

③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400页。

④ 刘少奇:《在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的谈话》(1957年3月21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33-334页。

牛出来了”¹，分配制度搞好了，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常注意合理调整分配制度。为此，他在1957年春到河南进行调查研究时，支持农业社实行“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认为这是对农村分配制度的一种调整，对推动生产力发展有很大作用。

从农村分配关系的调整，刘少奇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他指出，解决分配问题，除了对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内部的劳动者，必须根据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外，还有一个“大分配”的问题。这就是关涉到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的机关管理人员的比例等一系列带有全国性、普遍性的分配问题。在积累与消费上，既要保证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又要保证吃穿用，还要考虑到留给后代人的社会遗产。刘少奇强调说，分配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上产生的新问题，也是长期性的大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确立以后，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

结合1957年春天全党整风的形势，刘少奇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宏观角度，阐释了分配制度所涉及的深层次问题。他指出，分配问题，不仅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反映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如国家领导人员、企业领导人员及管理人员生活待遇过高，就会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协调；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干部，从社会的“公仆”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甚至一部分人把公有制财产“似乎不自觉地”据为已有，无限制地享受，就会引起蜕化，形成官僚阶层、官僚集团，就

¹ 刘少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1957年3月21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37页。

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反対。同样，领导机关、领导人员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造成的错误，也是“损害经济基础”的。

他特别指出，全民所有制的分配比较复杂，对劳动者的好处不是完全能直接看到的，所以人民对全民所有制的分配问题更加关心。而人民群众对集体、对国家的关心，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这个经济基础反映到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民主，让大家讲话，要大家满意，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①

（三）把“有计划”作为主观范畴来把握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庐山会议纠左发生的逆转，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偏差。经历了高指标、高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狂热之后，刘少奇冷静下来进行思索，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和观念上又有所前进。

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岛主持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作了新的阐释。他指出：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通过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创造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条件，可以通过人们的计划，去实现按比例发展。然而，“‘有计划’，不是客观的，是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来实现的”^②。

刘少奇的这个判断实际上道破了计划经济的弊端之一，在于计划本身属于人们的主观范畴。计划不周，会有破坏比例的事情，需要随时调整；如果计划搞得不好，国民经济就会出现大的失调。

^① 刘少奇：《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1957年5月7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9页。

^② 刘少奇：《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11月），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85—386页。

“大跃进”期间主观意志盛行，计划工作上的随意性造成对国民经济比例的大破坏，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新的阐释，纠正了通常以为“有计划”、“按比例”都是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觉，打破了迷信计划经济总是可以实现按比例发展的传统观念，使人们有可能从更宽阔的视野，去探求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

对计划的主观性的把握，引申下去，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计划性之外，不仅需要而且必然有相当大的经济活动领域，是计划所达不到也不必受计划来支配的。如同刘少奇所讲：“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①。尽管当时还是有限度地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但他确信计划不能包罗万象，不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妨碍生产的。他提出：资本主义把商品化搞得那样广，而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就把它限制得那么小，这是一个问题。^②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的范围事实上比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包括生产资料也具有商品的性质。商品的范围及其活动领域扩大了，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范围和领域必然也要扩大——这是一个逻辑的结论。

诚然，刘少奇上述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看法，远不等于对问题的本质有了完全自觉的认识。况且作为一种观念，距离达到更多人的共识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但是，这毕竟为攀上新的认识台阶提供了契机：既然计划性在许多情况下不免被主观意志所主宰，那么，把“有计划”当作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属性，就不能不被提出质疑。刘少奇把“有计划”作为一种主观范畴来把握，并不排除人们通过主观努力不断地去认识、掌握和利用客观规律。然而，计划的

^① 刘少奇，《在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的谈话》（1957年3月21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3页。

^② 刘少奇，《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11月），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403页。

主观属性一旦被揭示,势将在理论上动摇把计划当作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唯一手段的观念。从这样的认识层面上去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一定会有新的思路出现。

(四)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在实现企业的自主权

党的八大以后,中央为解决上级国家机关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制定和实施了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方案。然而,这只是中央对地方实行纵向的行政性分权,并未解决政府部门向企业横向分权,增加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问题。在学习、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刘少奇十分重视正确处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矛盾、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等问题,并结合当时体制改革中的实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石景山钢铁厂,国家投资2.4亿元,准备五年扩建为年产60万吨钢、120万吨铁的企业。实行了投资包干后,钢铁的生产规模增加了一倍,扩建时间缩短了一半。对此,刘少奇尖锐地提出“生产力从哪里来”的问题。冶金部、石景山钢铁厂,都是全民所有制,投资由谁体现,用什么方法执行,结果就大不相同。他认为:“无非是投资归谁掌握的问题”;“生产力不是天上掉下来,本来就有,只是过去没有得以发挥而已”^①。这里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冶金部对石景山钢铁厂,有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两者之间又有一层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行“投资包干”的办法,使扩建投资由政府主管部门所掌握,变成归企业所掌握、所使用,企业积极性提高,生产力猛增,原因就在于企业得到了资金使用的自主权。

刘少奇不仅把实现企业自主权当作提高生产力的关键,而且分析了全民所有制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认为由厂长、党委书记

^① 刘少奇,《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11月),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84页。

代表国家来掌握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使用权”，企业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生产力也随之增长。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使用权”就是企业的“经营权”，也没有认识到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地分离，才能使企业真正拥有经营自主权，但是，只要循着这个方向探索下去，正如刘少奇当时所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可作”！

（五）创办经济组织来行使企业管理职能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严峻的形势要求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大跃进”期间仓促下放到地方的部分管理权，又重新收归中央管理。由此，形成中央各部、省市各厅局和其他经济管理部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局面。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权日益强化，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妨碍了经济体制整体效能的提高。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复苏，刘少奇愈来愈强烈地感到旧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1963年10月，他在听取国家经委汇报工业情况时指出：“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①。这种振聋发聩的评判，假如不是对现行管理体制的弊病有切肤的感受，显然是作不出来的。为此，刘少奇明确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按照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并把试办国际通行的托拉斯经济组织，作为根本改变超经济管理的关键一环。

当时试办托拉斯，主要是组织全国性的专业公司，对企业实行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管理，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刘少奇在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办托拉斯的办法，使各部的局改成公司，由行政组织转变为企业组

① 刘少奇：《组织专业公司，减少行政干预》（1963年10月21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28页。

织,这样,可以进一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变成业务机构。他强调说:过去都是行政机关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证明不行,“统统改成公司,无非是几十个,百把个公司,有的部可以组成几个公司。这样,部就轻松了,搞平衡、检查、监督,帮助公司搞好工作”^①。“托拉斯和部的职能要分开,托拉斯管工厂,管实际工作,部只管计划工作,搞综合平衡,做政治工作,监督托拉斯”^②。

刘少奇的这些述论,重要的认识价值在于:中央各部及地方厅、局都不要直接插手管工厂。这实质上是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即各级政府由过去包揽企业的生产、供销、核算、分配等几乎所有经济活动,改变为把该管的事管好,生产上的事交由公司、工厂自己去经营。这样,就为改变原来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的地位,使企业逐渐成为具有独立性质的经济核算单位,提供了可能性。在当时强调经济工作要集中统一的条件下,要想实行这样重大的改变,势必会引起同各地方、各行业主管部门的矛盾、冲突。对此,刘少奇强调说,各地方、各部门要从我们是个大国,怎样管理企业对国家有利的角度来考虑,撇开地方主义、行业主义、利润分成、产品分成、谁大谁小,谁说了算等观念,特别是党委和政府要超脱一点,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情。

诚然,刘少奇当年试办托拉斯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强化国民经济的计划性的前提下,试图通过经济方法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配置的合理化。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在目标和手段上存在着诸多矛盾。托拉斯作为经济组织,又要履行行业管理职能,带有很大的行政性;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统与不统、统到什么程度,经济核算单位应该如何划分等,许多问题难于解决;特别是在

^① 刘少奇:《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不行》(1963年12月26日),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30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04页。

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引进市场机制、使企业面对市场等关键性问题。尽管如此,刘少奇关于组织专业公司、减少行政干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确立企业的独立核算地位等主张,应该说已经比较切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种对传统工业管理模式的初步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经济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之,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从构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到改进计划经济体制,在基本思路上贯穿着增强经济体制活力这样一条主线。虽然当时囿于计划经济的观念,没有直接点明要利用市场调节的因素,但在总的方面强调了要重视我国商品经济存在的客观性,重视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包括在一定范围内市场对商品生产的导向性。这样的思路,的确体现了刘少奇一向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市场因素及价值法则作用的理论风格和个人特色。另外,在实现企业自主权、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的某些观点,实际上契合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长期探索中的许多重要认识环节。尽管当时的探索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干扰,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历史局限和不足,但正如刘少奇1959年所预见的:“国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其力量之大,使生产力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内冲不破上层建筑的束缚。但是,十年,二十年,还得冲破,还是要改革那些不符合实际的制度、政策”¹⁾。历史的发展证明:刘少奇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为冲破传统计划体制的硬壳所作的努力,最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结出了硕果。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1) 刘少奇:《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11月),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0—402页。

1949—1952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分析

向 新

1949—1952年,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这三年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利用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下,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并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三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证明:在我国当时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只要能加以有效的引导与管理,既发挥其积极作用,又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其存在和发展,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本文旨在通过对1949—1952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①发展过程的描述,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and 不可替代的作用,阐明在我国当时历史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既积极扶持和鼓励,又加强引导、管理和限制政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为今天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① 由于资料来源所限,本文所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沿用建国初期的统计标准和统计资料。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指私人经营的、雇用工人和学徒超过3人的工业企业;私人资本主义商业,指雇佣职工2人或2人以上的私营商业企业。本文所用数据资料,除注明者外,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统计提要(1949—1957)》(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编,1958年10月)或据之计算得出。

结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私营经济的补充作用,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

(一)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始于19世纪后期。到解放前夕的六七十年间,私人资本主义经历了艰涩曲折的道路。它有了某些发展,但力量很弱,始终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形式。十多年的战争,又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受破坏,大量企业停工、减产或歇业,资金外逃。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已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

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政策。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私人资本主义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作用。在革命胜利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长期存在,国家通过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一个基本的经济成分。国家利用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

1949—1952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利用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1、解放初期私人资本主义恢复生产经营

根据中国共产党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各大中城市相继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积极

进行扶持,使之得以迅速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在很短的时间内停止或减少了停工现象。据上海市1949年12月对全市68个工业行业的调查,开工的已达69.7%^①。到1949年底,全国私营工业大部分恢复了生产。解放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1)大批失业员工就业。1948年2月,哈尔滨市平均各业成员比伪满时增加了30--40%左右,有些行业还缺人。(2)市场日益活跃,工商业成品销路扩大,特别是农具能销售到满洲里、黑河一带。南马路玻璃厂经理由衷地说:“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像今天工商业发展得这样快,伪满时把工商业弄得死气沉沉,现在正在逐步走向繁荣”^②。

2、建国头两年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建国初期,物价稳定、财经统一后,由于市场虚假购买力的消失,私营工商业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不灵,企业生产减少,歇业增加。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等10个大中城市为例,1950年第二季度私营工商业开业5903家,歇业12750家,歇业多于开业6847家^③。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状况,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影响,甚至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1)市场萧条,商品滞销,价格倒挂。北京市1950年3月份面粉市场成交量只及上市量的15.1%,其他粮食成交量也仅为上市量的21.2%^④。(2)失业工人急剧增加。1950年7月,全国已登记失业工人数达166万人^⑤。失业人口剧增造成人心浮动,社会动荡。

① 《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② 《东北解放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工商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③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9页。

④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0页。

⑤ 李光田:《试论建国初期失业工人的救济与安置》,《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第48页。

为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合理调整工商业,并把它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基本措施之一。通过调整工商业,从1950年下半年起,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恢复。到1950年下半年,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由上半年歇业多、开业少变为开业多歇业少。仍以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10个城市为例,1950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开业的共有32671家,歇业的共有7451家,开业超过歇业25233家^①。195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更从恢复走向发展。到1951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比1950年增加11%,职工人数增加16.3%,总产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数较1950年增加11.9%,从业人员增加11.8%,销售额增加36%。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促进了全国工业的迅速恢复发展。1951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39%,在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中,占46.1%。(2)就业增加。到1950年12月底,失业工人重新就业者已达120余万人^②。(3)在为国家积累资金方面,私营企业1951年缴纳税收34.97亿元,占国家各项税收总额的41.5%。(4)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出口方面看,1950年是我国73年来第一次出现贸易出超。其中,私营工业出口总值1950年、1951年分别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1.5%和68.4%。(5)加速商品流转,扩大物资交流。1951年私营商业销售额总计达237.6亿元,比1950年增加30.5%。

3、1952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中的曲折

在1951年底的“三反”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资产阶级不法分子

^①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3页。

^② 李光田,《试论建国初期失业工人的救济与安置》,《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第52页。

勾结党政机关于部进行贪污盗窃、偷税漏税等严重情况。中共中央于1952年初发出指示,在全国展开“五反”运动,从1952年2月起,全国各地出现了市场停滞,私营生产经营下降,公私、劳资关系紧张的情况,私营企业再次陷入困难境地。大批私营工商户停业、半停业。北京、天津等20个大中城市(上海不在内),1951年下半年歇业数只占开业数的63%,1952年7月份申请歇业数为开业数的220%^①。

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表现为:(1)失业工人增多。1952年10月,全国失业人数共计108万人^②。(2)商品流转和农村收购方面发生脱节,贸易额减少。(3)金融呆滞。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计,1952年春季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3%,银行汇兑及票据交换仅及去冬旺季的30%^③。(4)税收减少。一季度国家税收减少5亿元,占同期工商税收的1/3^④。(5)国营经济受到影响。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

为了解决市场停滞、私营工商业再陷困境的问题,从“五反”运动中期起,中央政府便采取了相应措施。在运动后期和结束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经过调整工商业,到1952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私营工业产量与1951年同期相比大都增加。私营商业的贸易额一般已超过去年同期。1952年底,全国共有私营工业149571户,职工205.7万人;全年总产值105.3亿元,比上年增加4.07亿元。

① 中央私营企业局党组:《1952年上半年的综合报告》,1952年9月18日。

② 李光田:《试论建国初期失业工人的救济与安置》,《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第47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68页。

(二)

1949—1952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历程,显示出鲜明的特点:

1、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整体上看呈现上升趋势

1949—1952年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数、职工人数、产值(销售额)逐年增加,如下表所示^①:

1949—1952年私营工商业变化情况

年份	1949		1950		1951		1952	
	工业	商业	工业	商业	工业	商业	工业	商业
企业数 (万户)	123165		133018	402	147650	450	149571	430
定比	100.0		107.9	100.0	119.9	119.4	121.4	106.97
职工/从业 人员(万人)	164.4		181.6	662	202.3	740	205.6	676.8
定比	100.0		110.5	100.0	123.1	111.2	125.1	102.2
总产值/销 售额(亿元)	68.3		72.8	182.1	101.2	237.6	105.3	189.6
定比	100.0		106.6	100.0	148.2	113.0	154.2	104.1

私营运输业发展。全国私营轮船货运量1952年比1950年增加55.1%,比1951年增加7.5%。货物周转量,木帆船与汽车1952年比1950年分别增加了77%和22.3%。

2、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

三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绝对额增加,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是下降的。

^①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统计提要(1949—1957)》,第31、36页。其中定比系由该页数据计算得出。

私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63.3%降至1952年的39%;私营工业职工人数,1949年占全国工业职工人数的53.7%,至1952年下降为39%。私营经济在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1950年为38.3%,1952年降为65.2%;私营商业及饮食业从业人员,1950年占全社会商业及饮食业从业人员的94.7%,到1952年下降为85.5%。

1952年与1950年相比,私营航运业在全国轮驳船货运量中所占比重由52%降至37.1%,客运量的比重由85.3%下降为63.4%;在全国汽车货运量中的比重由83.7%下降为66.7%;客运量的比重由61.8%下降为35%。

国家财政收入中私营经济提供的收入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32.9%下降为1952年的21.2%。在国家税收中所占比重,由39%下降为35.5%。此外,私营行庄经营的存款在公私存款总额中所占比重,1950年6月为41.4%,至1952年底则降为7.2%^①。

3、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行业结构与地区结构发生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引导、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作用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其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也得到一定改善。其变化的基本特点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满足市场需要,不涉及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行业,在国家鼓励下得到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或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产业受到限制,趋于萎缩,或被取代、淘汰。地区结构不平衡状况也有所调整。

获得恢复和发展的行业有:(1)重工业和生产民用必需品的工业。包括机器制造、钢铁冶炼、电机、小五金、医疗器械、缝纫、橡胶、造纸、热水瓶、文教用品和印刷业等。一些主要行业生产量增长的

①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151页

情况,如下表¹:

1949—1952年私营工业主要行业总产值变化情况(%)

业 别	总 产 值 定 比			
	1949	1950	1951	1952
钢铁冶炼	100	262	438	504
机器制造	100	187	436	498
金属品制造	100	130	289	336
化学加工	100	188	243	281
橡 胶	100	195	289	283
造 纸	100	121	238	298

(2)有利于城乡物资交流及服务于经济文化事业的商业,特别是零售商业。如经营次要农产品、副产品、畜产品及土、特产品等行业。

(3)供应人民生活需要及服务于生产建设的行业,如燃料、五金、日用百货、文教用品、医药用品及工业交通器材等。

(4)国营及合作社商业不经营,或经营比重不大的有关行业。如上海市在国营及合作社不经营的76个行业中,私商1952年的营业额比1950年增加43.7%²。(5)私营运输业。

受到削弱和淘汰的行业主要包括:(1)本身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或过去生产过剩,盲目发展的工业行业,如火柴、碾米、烟草制造、手工棉织等。(2)奢侈消费性行业,如时装、洋酒、舞场、咖啡馆、进口百货、高级旅馆等。如广州市酒楼、茶室业、洋酒业由352户减为200户,天津市的金银首饰店到1952年则全部歇业³。(3)

¹ 资料来源:《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0页。

²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83页。

³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81页。

居间性和某些服务性行业，如牙行、栏商、报关、转运中间商和广告商等。(4)与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建设有重大关系的行业，如花纱布、木材、水泥、粮食批发商及进出口贸易等。(5)从事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和金融投机的行业，如银号、钱庄、银楼、股票及其他投机商号等。到1952年，全国的私营行庄已分别通过联营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地区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解放前，私营工商业主要集中在少数沿海大城市，内地城市工商业则极不发达。解放后为响应党和政府工厂内迁的号召，1949年到1950年5月，上海市有60多户私营工厂内迁，迁往天津12户，郑州10户，开封7户，其余迁往徐州、泰州、哈尔滨、北京、沈阳、西安、宝鸡、邯郸、新乡、蚌埠、汲县、张家口等18户。天津、无锡、汉口等市亦有部分厂迁往郑州、开封等地经营。内地城市新建工业基地发展也较迅速。私营工业地区分布有所改进，私营商业在内地也有了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更为迅速。郑州市1951年较1950年私商销售额增加了55.4%；兰州市1951年商业户数比解放前增加了200户，乌鲁木齐增加了400多户^①。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支援了内地经济建设。

4、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向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工业国家资本主义各种形式都不断增长，其中加工订货、包销等形式进展较快，1952年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6倍多，在私营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1.5%增加到49.6%。公私合营工业产值逐年增加，以1949年为100，1952年为621.6。在私营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49年为3.1%，1952年上升到11.5%。1951年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商业的零售额比1950年增

^① 倩华等著：《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2年）》，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页。

加2倍,1952年比1950年增加4倍。

5、国家政策成为影响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因素

三年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措施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掌握和经营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成分。这样,国家不仅凭借上层建筑的力量,而且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物质基础,通过政策、法令和各种经济手段,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1949—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对私人资本处理利用与限制关系侧重点不同,具体政策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趋势与政策的演变是完全同步的。

建国初期,面对物价飞涨、财政拮据的窘境,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私人资本在1950年上半年陷入极大困难。1950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实行合理调整工商业,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措施带来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1951年是私营工商业发展最快的一年,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新情况。

1952年上半年“五反”运动期间,私营经济生产经营大幅度下降,整个社会经济受到影响。为扭转这种情况,中央政府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工商业。国营贸易大力扶助私商,进一步调整了经营范围和价格政策。入秋以后,国内工商业又日见活跃。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改组过程,也主要地受到国家政策措施的影响。国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通过发放贷款、供给原料、以原料换成品、收购和代销成品、委托加工、减免税收,国家让出一部分销售市场,扩大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等措施,从资金、原料、生

产、销售、经营范围、税收等等各个方面,加以扶持和引导,使其获得迅速发展。对不利于国计民生或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则加以限制和排挤,以至取而代之,这些行业相继迅速被削弱和淘汰。地区结构变化上亦是如此。解放后,响应党和政府工厂内迁的号召,一部分工厂由沿海城市迁往内地城市,支援内地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党和政府还注重促进内地新建工业基地的发展,促进了内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国家政策直接影响的结果。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乃至公私合营,将私营经济的生产与销售直接或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从而加强了国家对私人资本的限制和管理。

(三)

1949—1952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利用、限制政策作用下,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发展,发挥了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

1、增加了社会物质财富。1950—1952年间,私营工业总产值三年累计达279.2亿元,占三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总额的15.6%;三年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了54.2%,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中占22.8%。私营工业还承接了大量加工订货任务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私营工业三年加工订货总产值累计为131.3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为18.2%。其中1952年比1949年加工订货产值增加50.9亿元,三年增长了527.3%。

2、方便了人民生活,勾通了城乡物资交流。1950—1952年,私营商业销售额累计达609.3亿元,占全国销售总额的63.3%。私营饮食业,三年销售额总计达36.9亿元。三年私营水运货物周转

量总计为 15878948 千吨公里,为全国水运货物周转量的 52.8%。私营汽车货运周转量三年累计为 976559 千吨公里,占全国公路汽车货运周转量的 56.9%。

3、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作用。1949 年 11 月,美国等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尤其将中国作为封锁的重点。在反封锁、禁运中,私商起到了重要作用。1950 年上半年私商出口的比重,几乎占全部出口额的半数,而在国营进出口额中委托私商代办的又占一半左右^①。

4、维持和增加了就业。三年中,发生了两次严重失业现象:一次是 1950 年春天,另一次是在 1952 年春天。两次失业工人数都逾百万。两次严重失业现象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便是因为建国初及“五反”后私营工商业萧条、停工减产,造成大面积失业。1950—1952 年,私营工业共提供就业 589.5 万人次;私营商业、饮食业从业人员三年总计 2493.8 万人,占到三年全国商业饮食业人数的 90%以上。

5、为国家积累了资金,提供了税收。1950—1952 年,私营经济共为国家财政收入提供资金 88.82 亿元,占三年全国税收总额的 67%。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在新民主主义商品经济中具有独特作用。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机制同时发生作用。国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国家基本建设实施指令性计划管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重点恢复和建设;而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为代表,包括众多的小商品经

^① 董志凯:《建国初期反“封锁”的效应和启示》,《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2 年增刊,第 76 页。

济直接受市场调节,又使得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灵活性。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运行机制中所具有的特点,能对市场作出灵敏的反应,因此,在满足市场复杂多变的需要、服务人民生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私营经济能对市场作出灵敏的反应,及时调整结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这几年中,私营企业结构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一方面大量企业停业、歇业、破产倒闭,另一方面更有更多的新企业户产生,适应国计民生需要的行业不断发展,而不适合国计民生需要的行业则相继被淘汰、停业、转业。此外,私人资本主义具有直接、明确和较强的动力机制和市场导向机制,完全自负盈亏的硬约束机制,迫使它必须重视改善经营管理,从而生产出大量名牌产品。如哈尔滨市双合盛制粉厂生产的红雄鸡牌面粉,吃水量大,筋力强,色泽洁白,营养丰富,久放不霉变,几十年来一直是同行业产品中的佼佼者。又如刘鸿生企业生产的章华呢绒,很早质量就能与外国货相比。

但是,由于工作缺乏经验,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身机制的一些原因,私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经营作风问题、劳资问题等,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所有制和机制的特点,即使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这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加强管理,是可以加以抑制和得到一定程度解决的。

如针对私营经济发展中盲目性、投机性,国家加强了对私营经济的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一部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同时,国家加强了立法,对私营企业的登记、生产、经营、收入分配等各个方面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对私营经济的盲目性和投机性予以抑制。

为尽可能防止私营工商业偷税漏税,人民政府实行滞纳金制

度,即不按期缴纳税款者,按日计算,一天罚应纳税款的3%^①。针对私营企业中的劳资问题,中国共产党遵循了“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原则,将发展生产摆在第一位,规定劳资双方应订立集体合同,一旦发生劳资争议,应采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对国计民生的某些消极作用,是由其自身性质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是共生并存的。建国初期,国家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有效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调节和控制,将其消极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其能更好的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这种做法是科学的,符合辩证法的。

(四)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应是社会经济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国家通过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达到繁荣经济之目的。由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将受到限制;在私人资本主义得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其他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①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法令选编(1949—1952)》,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成分将得更快的发展,后者在社会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将进一步加强,比重逐步上升,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在1949—1952年间,中央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的政策。三年实践的结果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发挥了其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同时发挥作用的经济体制中,主要是活动在非垄断行业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由于自身机制的特点,直接受市场调节,通过企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满足市场复杂多变的需求,方便人民生活。这对于弥补计划不足,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活跃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也受到了必要的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或国家不鼓励发展的行业、企业受到限制,趋于萎缩或被取代、淘汰;利于国计民生的在国家鼓励下得到发展,其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变化向着更适应新的社会经济需要的方向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违法经营行为也进一步受到限制和打击。

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政策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快慢,结构调整的方向,国家的政策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也得到迅速发展。国家已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置于其监督管理之下,有能力决定它的前途命运。

总之,三年的实践证明,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国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并不改变社会经济的性质,有利于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本文作者系中南财经大学89级博士生)

雷任民与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

何仲山 李军晓

西安事变爆发后,雷任民中断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学业,回到国内。从1937年2月开始,他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到家乡山西从事对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始是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的身分参加并领导该会的工作,为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培训军政干部、建立武装做了切实准备;太原失陷前后,他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在敌人侧翼及后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指示,率领山西新军决死第四纵队开赴晋西北。

(一)

1937年12月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保临汾。为了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他对牺盟会和新军采取了扶植态度。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集中全力,把新军的组建和牺盟会的工作推向高潮。

1938年1月,山西新军决死第四纵队开始在晋西北临县组建,雷任民担任第四纵队政治委员(此前他担任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九团政治委员)。

关于四纵政委的人选,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本来,阎锡山委托薄一波全权负责组建新军,可是当薄一波提出由李力果任四纵政委时,阎锡山却通过梁化之提出,新军政委都应山西籍人(李力果是陕西人)。薄即顺势提出由雷任民任四纵政委。中共北方局

的杨尚昆和山西省委也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做工作,使阎锡山和梁化之认可了这项任命。

决死第四纵队组建时下辖3个总队(相当于团的编制):少年先锋团第一团编为十总队,教导二团编为第十一总队,教导九团编为第十二总队。

1938年3月底,决死第四纵队完成组建,同其他新军部队一样,四纵的鲜明特点在于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依据《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制度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为组织军队、政府派到部队中之全权代表,有直接处理部队中一切事宜之权”,“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团长及政治主任均受其领导”,“政治委员于必要时,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单独发布命令之权”。这就为确立党对部队的领导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为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但是心怀叵测的阎锡山又深恐新军发展成“尾大不掉”之势,在1938年2月的临汾会议上宣布“以后不许再用决死队名义发展部队”。针对这一情况,雷任民领导的四纵和牺盟晋西北中心区遂改以自卫队、游击团的形式发展武装。这样,1938年至1939年,决死四纵队又增加了3个团的编制,番号为游击第六团、第七团和第十八团。这3个团都是由牺盟会在各县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改编而成,军政干部均系共产党员。除了以上6个团外,四纵还有随营学校、前线剧社等直属单位,总人数约8000人。

在1937年春季以前,四纵主要是阻止日军对晋西北的进攻;1938年春至1939年,主要是反击日军对根据地的围攻,粉碎其“治安肃正”计划,积极参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设。雷任民亲兼团长的游击六团长期战斗在晋中平原。一年多时间里,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敌人600余名。

决死四纵和新军各兄弟部队一样,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的产物,是在党的“扩红十万”的号召下通过牺盟会组建和发展壮大的,始终是党领导和指挥的革命武装。早在雷任民调任教九团政委时,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就对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做了指示。在四纵组建过程中,邓小平、程子华都曾给以具体关怀和帮助。1938年,贺龙、关向应曾多次邀请晋西北驻军各部队将领到一二〇师师部联欢,通过这种方式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利用夜晚听取雷任民汇报,给他讲形势、讲政策并给以具体指示。那时,根据中央决定:负责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只能同党的高级领导秘密联系,不参加基层党委。当时,雷任民在党内受贺、关、甘(泗淇)的领导,在1938年底,贺、关、甘率一二〇师主力东进河北后,则接受晋西北区党委副书记罗贵波的领导。北方局、晋西北区党委、一二〇师领导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对决死四纵队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1938年5月,秘密的中共决死第四纵队党委成立,领导所属各团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受中共晋西北区委员会领导。李宝森、金敏先后担任纵队党委书记,党委委员有王子俊、罗平、王黎生、郭实夫、姚仲康、杨业澎,担负主要行政领导工作的雷任民、李力果、冯基平等不参加党委。为适应统一战线需要,党组织在四纵内以地下党的方式进行活动,所以虽然全纵队自上而上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有一整套以政治委员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工作制度,但各团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不尽相同。十一、十二总队成立党的工委,十总队和3个游击团则设党总支,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传达党的决议指示、安排工作、交流情况和意见,一般是单独进行。雷任民经过纵队书记加强政治工作壮大党的组织,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四纵党的组织有较大发展。到十二月事变前夕,十、十一、十二总队中党员数量占全体人员的10%左右,3个游击团的比例更大,连排以上军政干部多是共产党员,基层党组织真正起到了战斗堡

垒作用。

1938年2月左右,阎锡山为加强对牺盟会和新军的控制,提出要成立一个名叫“公资党”或“公资社”的政党性组织(他说,共产党实际上不是要共产,而是要共资),最后定名为“民族革命青年团”。阎锡山的本意,是企图通过它来制造舆论,欺骗群众,控制、掌握牺盟会和新军。对此,山西省委认为:阎一定要成立一个政党也不要紧,我们的人可以参加,但要掌握领导权,牺盟会和新军各级领导干部要担任“民青”的领导职务。于是,牛荫冠等拟出一份几乎全部由决死队、牺盟会干部担任“民青”领导人的名册。雷任民作为牺盟会常委和四纵政委是“民青”的当然发起人、领导人之一。从临汾开会回来后,他在晋西北大大发展“民青”,包括地方和部队中的党员都无条件参加进去。由于阎锡山不允许在其部队中发展中共组织,雷任民就充分利用阎发动成立的合法组织“民青”作掩护,积极开展活动。各团队普遍建立“民青”组织和“民青革命室”,由政治指导员担任领导。凡是党的会议,都以召开“民青”会议名义进行,以掩耳目。进步青年有的先吸收参加“民青”,经过斗争考验后,再吸收入党。这样一来,阎锡山倡导组织并自任团长的“民青”,不但没有实现其初衷,反而为牺盟会和新军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战斗阵地,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起到党的外围组织的作用。

针对四纵所辖6个团组建过程及军政干部配备情况的不同,雷任民在政治工作中采取了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的方针。游击第六团、第七团、第十八团虽组建较晚,但军政干部都由共产党配备,阎锡山的旧军官没能插手,政治上较纯洁,是党领导下绝对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雷任民要求这3个团在部队的管理、教育、训练方面都要向八路军学习,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以及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同时在这3个团积极发展壮大党组织,加强军政训练,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大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

军政素质。

第十、十一、十二总队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3个团从上到下有大批旧军官,尽管一部分人也有爱国、抗日的要求,但他们的旧习气很深,同四纵的新制度、新作风格格不入。更有少数中上层分子军阀作风严重,反共思想浓厚,反对政治工作,排挤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屡屡挑起军政摩擦,同中共争夺对部队的领导权。雷任民把这3个团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加强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启发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运用与发展合法组织牺盟会、“民青团”,以合法形式逐步调整干部,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扩大进步面,孤立缩小反动面,力争实现对部队的领导权。

在四纵发展壮大过程中,阎锡山企图通过部队中的旧军官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为了巩固党对新军的领导权,四纵党政领导动用各种机会和理由把顽固旧军官撤掉,换成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四纵少数上层顽固军官,对抗日消极,想拖走队伍离开第二战区,或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纵队政治机关或政委以个人名义用合法方式报告阎锡山,由阎把他们撤换或调走。对部队中一部分顽固的中下级军官,雷任民则直接行使政委权力,将其免职或调离。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个时期,3个总队军事干部的情况终于有了较大的变化,最顽固的上层旧军官被清除出一部分,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一部分,从而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临汾失守后,新军内部新与旧的斗争加剧了。阎锡山喘息甫定,便厉行“扶旧抑新”政策,反共本性逐渐暴露。他对新军部队不发饷并指使反共顽固军官加紧控制部队。这一时期,四纵内部的斗争,突出表现为同反动军官、纵队长梁浩的斗争。

梁浩原是晋绥军六十一军的军官,他到四纵担任纵队长后,拼命抓权,任人唯亲。他再三提出部队军事长官有决定军事行动和部队一切事务的权力,并乘雷任民外出开会之机,于1938年6月20

日擅自下令停发学生游击队和政治部所有人员的薪饷。7月15日又擅自决定从军官团中调来陈长捷部旧军官50多人,要往所有团营中安插,企图将新军化为旧军。政治部主任刘玉衡代行职权,坚决抵制梁的做法,这一阴谋遂告破产。10月,政治机关掌握了梁浩贪污军费的材料,遂报告阎锡山。同时,雷任民向山西新军总部的陈光斗做工作,争取陈的支持。阎锡山万般无奈,只好将梁调离四纵。这是四纵反顽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除了顽固旧军官寻衅掣肘外,少数有反共思想的政工人员也时常制造事端,斗争相当复杂、尖锐。1938年8月19日,十一总队政治处干部郭润芝和其他两名政工人员,偷窃了一份总队党工委的文件,找政治主任刘玉衡报告,说在十一总队政治处的王子俊、李长路、王组青3人是共产党,这份文件就是证据,要刘处理,否则立即向阎锡山告发。刘玉衡自己是中共特别党员,也知道这3人是十一总队党的负责人,感到问题很棘手。刘被迫令3人离开部队,送到牺盟会临县中心区安排工作,并写了一本《为巩固民青而奋斗》的小册子印发至各总队。

当时,雷任民外出开会,被阎羁绊于吉县筹办青年军官训练队,不得脱身。王子俊等3人找到纵队党委书记李宝森,李宝森认为处理不妥。当雷任民脱身返回晋西北后,从党委了解到这一情况,也认为刘玉衡处理失周。因为这样处理不仅暴露了部队中有共产党组织,还会助长反动分子的气焰,更严重的是,将影响新建党组织的士气。经过商议,决定把王子俊等3人从牺盟会临县中心区召回部队,由雷任民电告阎锡山与梁化之说:“郭润芝等报告王子俊等3人是共产党员,我很惊讶,此事必须彻底查清。我已将王子俊等3人留在我的身边,亲自进行考察。”过了一段时间,雷任民又电告阎、梁说:“经过我这一段时间的考察,王子俊等3人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我们民青的忠实同志。部队中也没有发现共产党的

组织。”其实，这件事情的真相梁化之心里完全明白，不过在当时情况下，还不到翻脸深究的地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事后，雷任民将王子俊、李长路分配到纵队政治部，王组青分配到游击第六团工作，把告密的3个政工人员分别调离原单位，并把部队中另外几个思想反动的政工人员调离部队，从而纯洁了政工队伍。

总之，从1938年到1939年一年多时间里，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整个四纵内军政干部的状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中共和进步力量处于绝对优势，反动的顽固力量被限制在有限范围内。这一切，为以后在“十二月事变”中彻底清除顽固旧军官，完全掌握部队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牺盟会的发展和部队的壮大，令阎锡山深感不安。对他来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他意识到自己设计的借共产党之力，“复兴”山西的办法根本行不通。于是，他开始转变政策，采取抑制牺盟会，限制决死队，反共反八路军的方针，妄图收回新军，重整旧军，恢复他对山西的统治。

1938年7月、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连续两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开始政治上的大滑坡。他在会上大放厥词，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再同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立足之地吗？！要“奋斗求生”，“不能背着棺材抗战”。公然煽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提出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张文昂、雷任民、张隽轩等新派参加了9月的吉县会议，即所谓的“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在会上对阎锡山的反动措施提出了不同意见。会后，阎决定

留雷任民在吉县筹办一个青年军官训练队，其本意是不让他回晋西北和决死四纵队，以削弱晋西北新派的力量。雷任民虽明了阎的险恶用心，但在当时的形势之下还不能公开拒绝，只好暂时接受任务，与阎周旋，见机行事。不久，决死三纵队政治主任董天知到吉县办事。雷任民向他谈了决死四纵队的复杂形势，请他接办青年军官训练队，以便自己脱身返回晋西北，董天知同意雷的意见，两人一起去见梁化之，雷提出推荐董办这个训练班，并说董乐于此事。梁表示同意后，雷任民得以返回晋西北。

吉县会议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改变过去的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转而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随即叛逃河内，公开投敌。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并在会后连续颁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一时间，反共气焰甚嚣尘上，摩擦事件不断发生。在山西，日本加紧对阎锡山进行诱降，公开扬言，如阎停止抗战，积极反共，可发还阎集团资产的49%。阎锡山加快了他反共、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步伐。

1939年3月25日到4月22日（实际上拖延近3个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和日”作准备。狡猾的阎锡山还不敢公开向共产党、八路军摊牌，而是把矛头首先指向阻止其对日妥协的巨大障碍——牺盟会、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新军，企图夺取新军，削弱牺盟会，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去掉“和日”障碍。

会议一开始，阎锡山便制造“和谈”气氛，散布妥协舆论，透露其准备对日妥协投降的意图，说：“仗总要有个了结，汪先生（指汪精卫）走的路未尝不可取”。

参加会议的牺盟总会及各中心区、战动总会、新军各部主要负责人薄一波、续范亭、韩钧、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牛荫冠、张韶芳、纪雨秀、王竟成、李林、刘岱峰、吕调元、梁膺庸、张国声、张千丞、苏谦益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面对顽固派的严重挑战，针锋相对地进行回击。他们用大量事实和有力的论据，驳斥各种反动谬论，揭露顽固派破坏团结、分裂倒退和反共投降的反动实质。薄一波严正指出：不能说汪精卫不是汉奸。敌人打进我们国内来了，要想民族独立，只能抗战到底。和平妥协就是投降，就是汉奸！戎子和驳斥了阎所谓二战区兵源缺乏，财政困难，抗战抗不下去的陈词滥调，指出兵源不足，发动群众就可以解决。只要坚持抗战就有出路。雷任民对阎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提出质疑，提出要联系起来看，战地动员委员会还是好的，张文昂愤慨揭露顽固派在各地制造摩擦，破坏团结抗日的活动，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牺盟会和新军的诬蔑，就是对那些躲在后面不抗战的人撑腰打气。大家一致严正表示：“和平妥协”是一条死路，汪精卫走的就正是这条死路，我们坚决反对。山西人民觉醒起来了，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抗战才是唯一生路。他们的批判，义正词严、合情合理，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阎锡山看到无法说服新派，便抛出了“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统一待遇”的所谓“五统一方案”，美其名曰提高新军待遇和地位，实则企图将新军合并到旧军中去，从根本上改变新军的性质，以达到消灭新军的目的。阎锡山还以国民政府规定文官一律不能兼任军职为借口，要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剥夺薄一波、雷任民等新派的军权。至此，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的真实面目昭然若揭。

政治委员制度是新军之所以为新军的标志，事关新军前途命运。以薄一波为中心的进步力量坚决抵制取消政委制度，在这一问题上决不动摇和退让；而阎锡山则视政委制为夺取新军领导权的

最大障碍，亦毫不让步，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秋林会议的动向。会议期间，北方局统战部长张友清即住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王世英处，随时了解情况，进行指导。到后一段时间，虽然会议已在名义上宣布结束，牺盟会和新军的各级领导人以各种理由陆续回部，但薄一波、雷任民、张文昂、戎子和、董天知等人却在阎锡山的羁绊下被迫滞留秋林。

经过近3个月斗争，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当时整个形势，了解到阎锡山的根本态度，决定了新对策。在秋林沟后的土崖上，薄一波召集雷任民、张文昂等人利用散步时间，传达党的指示，分析形势，商讨对策。经过认真研究取得一致意见：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再顶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因为阎已下定坚决反共、准备投降的决心。如我们继续顶下去，将被牵制在秋林，对我们不利。当前最重要的是立即返回部队，掌握部队。回去后要加紧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们可以表面上同意取消政委制和决死队的番号，待回到部队后，再用软拖硬抗的办法加以抵制。同时，还可策略地提出如下附带条件：一、对决死队的装备与军饷等与旧军同等待遇，不可歧视；二、取消政治委员但不能取消政治工作制度。

薄一波和雷任民立即把新派商讨的结果告知梁化之和赵戴文。梁化之听后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满口答应了附加条件，并亲自召见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等几个新军政委，一番鼓励安慰之后，阎锡山宣布：薄一波调离太岳区，赴秋林任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主持省政府政务；调雷任民任第二战区高级少将参事。梁化之向雷任民再三解释，“参事”和参议不同。参议不过是议一议，参事就是要参加理事，有实权抓，有工作干。雷任民向梁化之表示干不了高级参事，要求还回晋西北搞牺盟会，做群众工作；薄一波推荐雷任民任第二专署保安司令（郭挺一第二专署保安司令兼专员），被梁化之和郭挺一拒绝。

在阎锡山转变政策、山西抗战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今后决死四纵队如何办,个人如何行动,雷任民感到很有必要向党中央请示,以便得到中央的正确指导。在此之前,薄一波已脱身返回晋东南,牛荫冠则被阎锡山派往洛阳见卫立煌去了,无法商量。于是,雷任民便秘密去找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商量,王世英也拿不了主意,建议雷任民直接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秋林会议的详细情况,同时请示决死四纵和个人下一步行动方针。

为稳住阎锡山,雷任民在离开秋林之前,向阎锡山、梁化之提出决死第四纵队改编后的组成和人员配备意见,要求“归队办理解交手续”,把部队军事干部、政工人员上上下下都安排好,善始善终,使人家满意,对总司令负责。阎锡山同意了。雷任民立即离开秋林,动身绕道去延安。

雷任民到延安后,按阎锡山的统战关系(雷名义上是阎的将领),住在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警卫、马夫另行安排。当天晚上,中共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王若飞前来看望雷任民。两年前,王若飞在太原经薄一波等营救出狱时,雷任民就与他相识了。雷希望立刻就汇报工作,王却笑着说:“这里说话不方便,你今天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到我家里谈。”

王若飞对雷任民带来的秋林会议的第一手材料非常重视。在以后的两天里,他放下手头工作,聚精会神地听取雷任民汇报,还不时提出一些尖锐、要害的问题。由于谈的是向阎锡山斗争的情况,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柯庆施也参加了。王若飞精辟地向他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既统一又独立,不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不是一切服从阎锡山,而是要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最后王若飞对雷任民说:“你带来的情况非常重要。秋林会议是一个严重信号,说明阎已经向右转,开始破坏山西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秋林会议只是一个前奏曲,其后面一定会

有大的动作。我立刻把你所谈的情况报告中央，会尽快安排你和中央领导同志见面。”

第四天一早，在杨家岭一个窑洞里，王若飞带雷任民见到了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刘少奇在详细听取雷任民关于秋林会议经过、斗争情况、阎锡山的言行态度、雷个人的看法、四纵队的现状等情况的汇报后，说：国民党要投降，这是当前国内的主要危险。国民党要投降就要反共，就要搞分裂。因此，反对投降、反对分裂，是我党也是全国人民的紧迫任务。你们这次在秋林的斗争很成功，中央是满意的，但后面的任务更艰巨，要继续努力。当务之急是返回部队，掌握军队。你是晋西北牺盟会的负责人，回去后要把晋西北的牺盟会组织整顿好，壮大群众力量，应付突然事变。

中午时分，毛泽东从枣园来到杨家岭。刘少奇向毛泽东介绍雷任民。毛泽东高兴地同他握手，看到雷任民很拘谨，笑着招呼他坐下，说：“你们在前线的同志辛苦了。今天我是请你吃延安饭，慰问你的。情况和少奇同志谈了，很好，我们边吃边谈吧。”

于是，大家围坐一桌，毛泽东举着筷子，不停地向雷任民劝菜。雷则借此机会抓紧时间向毛泽东汇报秋林会议上阎锡山的反动思想和表现。当雷任民转述阎锡山说过的一句话“蒋介石准备向日本人妥协，这种形势要看清楚，天快要下雨了，要赶快准备雨伞”的时候，毛泽东大声插话说：“哎，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赶快准备雨伞嘛！”。当雷任民谈到阎锡山决定取消决死队各部队的政治委员，解除新军中国共产党人的兵权，调薄一波回秋林任山西省政府建设厅长，调自己到秋林第二战区任高级参事时，毛泽东把桌子一拍，冷笑一声，很严肃地提高声音说：“笑话！山西都丢光了，阎老西过河逃到了陕西，还空谈建设，建设厅长是空的！现在是天下大乱，到处为王！罗！你们应该清楚，也许他用你们的时候已经完了。”

这次同毛泽东见面，不到一个钟头，却给雷任民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印象。毛泽东的谈话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特别是“准备雨伞”和“天下大乱，到处为王”的战略指示使雷任民觉得心里一亮，眼界大开，思想认识提高了一大截，明确了回去工作的方向。雷任民当即表示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不理阎锡山的调动命令，留在晋西北的战斗岗位上，和决死四纵队及牺盟会的同志们并肩战斗。刘少奇嘱托雷任民尽快返回部队，整顿队伍，组织进步力量，切实保住枪械，掌握实权，打退一切敌人的进攻。雷任民未敢在延安久留，绕道葭县北上，返回晋西北。

（三）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加紧同日军勾结，反共、限共、反对进步势力，不断制造摩擦事件。他将山西划分为4个行政区，晋西北为第二行署，由赵承绶兼行署主任，下辖10个师管区，由旧军各师、旅长兼师管区司令，团长兼县长，总揽军政大权。对晋西北八路军、新军及“战动总会”所领导的各游击支队，则不划定防区，企图困死、饿死、赶走八路军、新军和游击队。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分析了山西的形势，及时布置了应对措施。1939年8月6日，北方局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央又用山西省委名义发出《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干部会议，分析形势，统一认识，部署行动。

雷任民回到四纵队后，立即向纵队党委并各团干部介绍秋林会议情况，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我们也要准备雨伞”，“天下大乱，到处为王”的指示，提出要根据四纵队实际情况，从政治、军事、组织上积极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工作，大家一致决定坚决执行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赞同雷任民不去秋林任高级参事，仍留在部队领导四纵斗争。纵队政治部特意召开“欢迎雷政委胜利归来大会”，以坚定全纵队进步力量的斗志，对顽固派给予反击，公开同阎锡山对着干。

1939年7月，根据阎锡山的指令，决死第四纵队分编为独立七旅和二〇三旅两个旅。为保证党对部队领导，雷任民以革命的两手对抗阎锡山，在答应将部队分编为两个旅并同意阎的旧军官任旅长的同时，在两个旅的团队构成和干部配备方面颇费了一番功夫。按照他的意见，改编时把共产党可以完全掌握的十九团（原游击第七团）、十八团和有旧军官的二十团（原决死第十一总队）编为二〇三旅，把三十五团（原游击第六团，也是共产党可以绝对指挥的力量）和有旧军官的三十四团（原决死第十二总队）、三十三团（原决死第十总队，一直在晋西南活动）编为独立第七旅。这样编法，能保证进步力量占优势，顽固派一旦策动事变，我们就有力量把他们镇压下去。

部队改编以后，四纵名义上取消了政委制，但在实际上仍然保持了一整套政治机构。四纵虽然分为两个独立建制的旅，但在雷任民的坚持下，四纵党委没有分开，仍然是一个党委，统一领导两个旅各团党的工作。阎锡山虽然免去雷任民政治委员职务，解除他领导晋西北牺盟会的权力，但他仍留在部队领导两个旅和晋西北牺盟会3个中心区的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及时了解部队情况，雷任民作为非党委委员（这是上级党委决定的，部队行政领导人不参加党委会，不与下级党组织发生关系）参加重要的党委会议。而且四纵为抵制阎锡山分而治之的阴谋，决定部队干部的升迁调动和作战命令，不经政委批准，一律无效，从而坚持了政委制。虽然阎锡山曾几次来电催促雷任民离队到秋林赴任，但雷以“内部团结未能巩固，分裂摩擦事件不断发生”、“深感钧座及组织付予之重任未能完

成”等种种理由一拖再拖，坚辞不就，绝不中阎锡山的调虎离山之计。

为了加强和确保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雷任民同四纵队党委研究决定，调整部队基层的军事、政工干部，加强各团的政治工作和基层党支部的工作。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派到团营连排工作。雷任民和纵队党委书记金敏住到独七旅旅部，坐镇指挥全盘工作。李力果任独七旅政治部主任，罗平与卢梦分任组织科长和宣传科长；刘玉衡任二〇三旅政治部主任，刘仰峤、李长路、王黎生分任组织科长、宣传科长和民运科长。十八团团长董一飞，政治主任武养民；十九团团长冯基平，政治主任杨叶澎；二〇团政治主任郭实夫；三十三团政治主任王玉波；三十四团政治主任姚仲康；三十五团团长李宝森，政治主任张效忠。还有肖新槐、张桂亭、李克林、沈国栋、吴绍奎等一批由八路军派来的营以上军事干部，这些同志都是久经锻炼、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虽然各团、营、连尚有一部分反动军官任职，但广大基层干部和士兵却全被共产党所掌握。

与此同时，为了缩短战线，巩固阵地，防止突然事变发生，经四纵党委研究决定，首先将分散在汾阳、交城、文水等地的各团都向一二〇师由彭绍辉、罗贵波领导的三五八旅驻地靠近，并将在交城城内由四纵主办的军政干部第12分校党的力量全部撤出，把一、二百名思想进步的学员，年纪大一点的分配到独七旅和二〇三旅各团担任连排干部，年纪小一点的组成民运工作队，到清（源）太（原）边山区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又从一二〇师要了一部分军事干部，充实作战部队。

赵承绶任第二行政公署主任后，统管晋西北军、政、民工作；在晋西北各县普遍建立“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反动组织，专门进行破坏活动；还不断派遣“联络官”、“视察员”到独七旅和二〇三旅进行特务活动，散布谣言，制造摩擦，鼓

动顽固派军官争夺军权。四纵队一部分受训归来的旧军官在阎锡山的拉拢支持下愈加反动,同进步力量的争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部队中秘密发展反革命政党性质的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聚集顽固军官并拉拢一部分战士参加,妄图取代牺盟会和“民青”。鉴于这个组织威胁到四纵队的革命性质,纵队党委为了掌握情况,曾派一些党员打进“同志会”,摸清他们的底细,得知他们已在进行紧张的策划,企图对共产党员下毒手。

为彻底击破他们的阴谋,四纵党委决定把这个反动的“同志会”拿过来为我所用。遂由纵队与各团政治机关宣布:决死四纵队根据阎司令长官命令,旅、团两级“同志会”的领导机构早已建立,旅、团政治主任都担任主任委员。接着又宣布:凡“同志会”会员都必须前来登记报到,接受领导,否则不合法,不予承认。各营、连也随之宣布成立“同志会”,都由教导员、指导员负责。这样一来,反动组织的领导权就转移到进步力量手中,利用这个组织既可以限制反动势力,又可以发展进步力量。雷任民还以晋西北牺盟会和“民青”负责人身份大力巩固牺盟会组织,加强“民青”工作,利用牺盟会和“民青”公开合法地位掩护党的活动,争取旧军官加入“民青”和牺盟会,从组织上束缚、控制他们。

但是,顽固分子并不甘心认输。1939年下半年,他们连续策划制造三十四团六连、五连两起严重事件,使四纵内部的反动军官同进步的政工人员的斗争尖锐化。

7月,三十四团二营在汾阳三道川整训,二营长支长禄与六连长来高为密谋策划,造谣说,六连指导员刘培礼与六班副班长王洪谈要吸收他参加共产党,然后以此为借口将刘关押在营部。二营教导员王邦荣强烈抗议支长禄等人的陷害阴谋,要他释放刘培礼。支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放人。团政治主任姚仲康和团长诸适褐据理力争,刘才被释放。最后,以来高被调离六连,刘培礼调回团政治处工

作,此事方告了结。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五连指导员孙海山上政治课时,连长万春祥蓄意制造事端,要集合部队出操。孙指出这是政治课时间,待上完课再出操。万凶相毕露,举拳就打,致使孙面部青肿,数处受伤,晕倒在地。事件发生后,四纵党委书记金敏连夜赶到史家庄向晋西北区党委报告。根据区党委指示,金敏又星夜赶回部队,向四纵队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雷任民、李力果、刘玉衡等传达了区党委的指示。雷任民等决定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对顽固派的进攻展开坚决反击。三十四团工委让王邦荣向支长禄严正声明:这不仅是打人问题,而且是明目张胆地破坏政治工作的严重行为,要求支严惩万春祥,并保证政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工作的正常进行。三十四团工委随即在全团范围内组织声援五连斗争的活动,各团派人慰问孙海山,要求严惩打人凶手万春祥,双方的较量趋于白热化。

雷任民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面对顽固分子的猖狂进攻,他和纵队党委领导四纵中的党组织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雷任民和李力果向独七旅旅长卢宪高指出,殴打五连指导员孙海山事件,不仅仅是违反纪律问题,而且是破坏工作的严重事件,必须严肃处理。但卢一直拖延应付,不予处理。由于卢一再纵容、包庇反动分子,五连事件的主谋和凶手没有得到及时应有的惩罚,所以部队内顽固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同时,五、六连事件激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极大愤慨,一致要求严惩肇事的顽固分子。党委不失时机发动各团的声援活动;纵队部办的《前进报》、《前线生活》,独七旅办的《挺进》、《挺进报》、《挺进生活》,二〇三旅办的《西北战线》、《西北战线报》、《西北战线生活》,把事件的详细经过及其严重性质,在部队内公开进行说明。并连续发表《论三民主义》、《再论三民主义》、《三反与反三反》、《三反主义的新花样》、《升官发财新论》、

《血腥的阴谋——无耻的罪行》、《坚持我们的阵地》、《明抢与暗夺》等文章，对顽固分子破坏抗日部队的罪恶活动进行揭露和声讨。雷任民在1939年10月25日出版的《牺牲救国》新29期上发表《对牺盟应有的基本认识》一文，指出：“人力可以影响环境，而有群众之组织的力量，更可以改造环境。今日顽固分子之破坏活动，使牺盟已处在一个险恶的环境中，但应认识：这是牺盟发展的一个过程，一个重要的关键；今天牺盟的力量是能够打破任何顽固分子的破坏活动。”牺盟是在抗战中产生，由一个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发展起来的。今日其任务是要突破与击退落后的藩篱，在进步中统一认识与行动。而“这正是抗战需要的巩固工作，不是基础工作。牺盟同志应本此认识，努力加强群众基础，以克服当时时局之危机。”

在雷任民的推动与号召下，晋西北各县牺盟会也在各地发动农民群众、各政权组织、群众团体纷纷召开座谈会、群众大会，作出有力声援。牺盟会晋西北办事处在兴县召开有新军各部代表参加的中心区联席会议，着重讨论反顽斗争及其相互配合的问题，并确定在12月12日（西安事变3周年）前后，普遍举行大规模反对妥协投降群众大会。会后，牺盟会和各群众团体向“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反动组织展开反击，公开向他们提出必须执行抗日政策，规定三条“不许”：一、不许再向老百姓派粮、取款；二、不许再克扣八路军、游击队的军粮；三、不许再造谣生事、制造摩擦，分裂抗日队伍。同时逮捕了其中的核心分子。这就巩固了进步力量，揭露了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团结教育了晋西北广大群众，为四纵队全面开展反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前后，原决死四纵队纵队长梁浩奉阎锡山的旨意，假高级委员之权威，来到晋西北，在交城县华里村召开秘密会议收买旧部，布置消灭新军中的共产党员。

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三十四团政治主任姚

仲康在秋林受训之后，秘密绕道延安，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汇报晋西北形势和决死四纵队的斗争情况。回来后，他向纵队党委传达陈云指示：在晋西北，要放手发展抗日组织，要以“非法”斗争的手段，求得合法解决。造成既成事实，让阎锡山被迫承认。11月20日左右，在有雷任民、李力果参加的纵队党委会议上，遵照陈云的指示，决定坚决处理三十四团五、六连事件的肇事者支、万二人，以打击部队中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迎击顽固派新的挑衅。

纵队党委派姚仲康去稳住卢宪高，姚到独七旅旅部驻地，以党员身分和卢谈话。姚谈了中共中央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并讲了一些秋林见闻，使卢对阎的态度摸不着头脑。卢说阎的“二的哲学”害苦了他。随后，李力果以政治主任名义召集支、万两人到政治部谈话。他俩一到，谈了不几句，就按照预先布置把二人扣押起来。随即，雷任民给卢宪高打电话说：万春祥殴打了指导员，还不认错，我们将他和支长禄逮捕起来了，请你过来商量一下，看应该怎样处置他们。卢宪高胆怯，不敢去政治部，马上将此事报告阎锡山。

阎来电令雷、李释放支、万二人，雷拖延不执行。后阎又命令雷将支、万二人送二战区司令部处理，雷也不行动。最后，阎又来命令将支、万二人交工卫旅旅长郭挺一处，再送秋林处理。郭派人来四纵解人。雷任民则电告阎锡山、梁化之及郭挺一说，已派人将支、万二人送秋林去了。过了些日子，复电告阎说，支、万二人在押送秋林途中逃跑，正在寻找。实际上，支、万二人仍被扣押在四纵。这时，雷任民已开始对阎锡山采取公开抵制、对抗的斗争方针。阎锡山鞭长莫及，也无可奈何。

支、万被扣事件，坚定了广大指战员和进步分子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为彻底清除独七旅部队中的顽固旧军官，打响了第一枪。

四纵对顽固分子的高度警惕和坚决斗争使阎锡山恼羞成怒。

显然，雷任民一天不离开四纵队，阎锡山的阴谋就一天不能得逞。于是，阎和梁化之前后数十次来电催促雷任民赴秋林就职。雷均以部队中问题很多，需要妥善处理，暂不能离开为由推托不去。

10月初，赵承绶在兴县召开“军政民”团结大会，再三邀请雷任民参加，郭挺一也派专人送来亲笔信，请雷一同出席。雷任民判断，这是“鸿门宴”，因此坚决不去，从而使赵、郭两人挟持雷去秋林的阴谋未能得逞。

阎锡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10月底在秋林召开“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要求新军各部领导人都去参加，企图重演秋林会议的故伎，切断新军领导人与部队的联系，甚至扣留他们。牺盟会和决死队看透了阎锡山的险恶用心，为防止在会议中发生突然事件，在外地的薄一波、雷任民、宋劭文、董天知都拒绝出席，使阎锡山的如意算盘落空。

阎锡山不断以各种名目派出五花八门的反动分子到晋西北活动，如什么山西新军总部的“联络官”、“点验团”，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化之）的“考察团”，赵承绶行营的视察员，等等。雷任民不厌其烦地接待他们，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给予回答。他们提出要深入连队视察，被雷以“局势复杂，安全不能保障”为由予以拒绝。实在推托不掉时，则由雷任民陪同他们下到事先布置好的团队，听取战士对顽固分子摩擦言行的控诉。这样一来，这些“蛇蝎虫豸”失去同顽固分子接触的机会，也就无法兴风作浪，大都灰溜溜地走了。

12月初，雷任民接到牺盟总会和二战区政治部发出的关于晋西南新军同旧军武装冲突的通报，得悉阎的军队已在晋西南向决死第二纵队发起进攻，二纵开始自卫反击。10日左右，雷任民在独七旅政治部驻地交城东坡底村，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四纵队党委与部队行政领导人的紧急扩大会议，向大家通报了晋西南的情况，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要不怕翻脸，不怕破裂，先发制人，“准备雨

伞”的主张。与会同志统一了认识，认为阎已先行破坏了统一战线，决死二纵队已打响反顽枪声，这不再是个简单问题；在晋西北，赵承绶也已磨刀霍霍，准备向决死第四纵队进攻。与其坐以待毙，莫如先下手为强。摆在四纵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必须当机立断，争取主动，抢先下手肃清内部的顽固军官，完全掌握部队，集中力量对付外部敌人的进攻。会议讨论了一旦旧军向四纵进攻，可能出现的几种局面和几种前途，以及相应的对策。会议特别对每一个团、营、连的情况做了具体分析，着重研究了军事干部的情况：谁是可靠的，谁是可以争取的，谁是必须清除的。最后确定：12月12日夜全军同时行动，三十六团、十九团分别逮捕独七旅和二〇三旅两个旅部的顽固分子；二十团、三十四团由该团党组织在十九与三十五团的协助下逮捕本团内部的顽固分子；调三十五团一个营负责保卫纵队党委和独七旅政治部。会议对要逮捕的旧军官名单，由谁负责执行，如何掌握部队，信号与口令等均作了周密细致的具体安排，确保万无一失。会后，党委立即派党委委员、独七旅政治部组织科长罗平星夜赶赴岚县，向晋西北区党委罗贵波报告行动计划，同时雷任民向晋西北牺盟会办事处主任张国声打招呼，要晋西北各县牺盟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好应变准备。

到了预定行动的12日，部队一切准备就绪。可是，向区党委请示汇报的罗平尚未归来。有同志提议推迟行动，等上级指示再作定夺，雷任民坚决反对。他说根据中外暴动起义的规律，时间只能提前，不宜推后，否则很可能出问题，导致功亏一篑。现在部队已做好准备，犹如箭在弦上，其势不能不发，也不容不发。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千万不能等待，千万不能改变时间。若一旦风声泄露，没有搞倒敌人，反而被敌人所搞。大家权衡利弊，接受了他的意见，决定不管罗平回来与否，都按原定计划行动。

是夜至13日凌晨，决死四纵队各团在党委和雷任民的统一领

导下,按预定计划分头开始行动。二〇三旅政治部主任刘玉衡、组织科长刘仰桥、十九团团长沙基平带一个营先解决旅部,不费吹灰之力就活捉旅长刘武铭和参谋长刘锦奎。十九团一部还协助二十团解决了一营(李士达任营长)和二营的反动军官。三营由于接到命令较晚,几天后方由教导员孟一川把部队带过来,在纵队转移到岚县后赶上部队。唯有二十团团长沙基平带上数人逃掉了。

独七旅方面。三十四团是顽固势力在决死四纵队最强的一个团。为了不至于出大问题,党委派三十五团团长沙宝森,带一个营去协助三十四团政治主任姚仲康捉拿反动军官,并预先布置三十四团的一营解决二营(二营反动势力较强),三营士兵自行解决本营反动军官。二营教导员集合全营训练,三营进去一下子把放在宿舍的枪都收缴了,团长诸适褐也被姚仲康缴械逮捕。

在解决独七旅旅部时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卢宪高是个伪装进步分子,十分狡诈。他乘三十五团政治主任张效忠带的一个营未到交城时,先带一个营反扑过来,企图夺取雷任民、李力果坐镇指挥的政治部。经过激战,卢宪高带一个排逃跑了。后来这个排的大部分人又都返回了四纵。最后,卢只带着他的一个卫兵逃跑到秋林,被阎锡山交给王靖国活埋,落得个可耻下场。

与此同时,三十五团一个连逮捕了军政干校 12 分校的顽固军官,接管了该校。战斗在太清边山区一带的二〇三旅民运工作队,配合八路军肖扬领导的独立三团开展活动,对付阎锡山的“突击团”、“精建会”、“敌工团”等特务组织,消灭了很多反动骨干分子。在此期间,驻在独七旅附近的工卫旅二十二团政治主任王庆生应雷任民之请,一再拒绝执行工卫旅旅长郭挺一调该团去岢岚的命令,密切配合四纵队,监视骑一军军部的行动,保障了决死四纵队背后的安全。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四纵的反顽斗争取得完全胜利。除少数

几个反动分子漏网外,其余全部被逮捕。同时还从两个旅部搜查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第二军”长方形关防和“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第五师司令部”铭记各一方,以及委任状等反动文件,还有十几万晋钞的活动经费。

在胜利完成清除内部顽固分子,消除隐患之后,雷任民、李力果、刘玉衡于次日晚率部迅速出发,突破日、伪、顽军的包围,从交城山中转移到岚县普明镇一带,同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和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新)的指挥机关靠近,不仅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而且得到区党委的指导和三五八旅的帮助,胜利结束了反顽斗争。

(四)

由于晋西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布置了粉碎“十二月事变”的斗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此时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北的反顽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特殊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策略。他认为,晋西事变反映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阎。”^①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仍要“在拥阎之下反阎”^②,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

①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左权的电报,1939年12月6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12月23日。

可”^①。

在岚县，中央决定撤销独七旅、二〇三旅番号，恢复决死四纵队番号，任命雷任民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力果、刘玉衡为政治主任。随即对部队进行整编，部分调整了军政干部：姚仲庚代理二十四团长，王兰麟调任二十团团团长，晋西北区党委派三五八旅参谋长李夫克担任决死第四纵队参谋长，还派李硕等几位军事干部来帮助进行整训。纵队党委集中对干部战士进行反顽斗争教育。通过军事、政治整训，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了，部队的士气空前高涨。

四纵在岚县休整时，旧军骑兵第一军不断地对其进行侦察、骚扰，双方间或发生零星武装冲突。12月15日，晋西北阎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二行署主任顽固派头目赵承绶在兴县蔡家崖召开师旅以上高级干部秘密会议，传达阎锡山的命令，部署军事行动。为麻痹新派，欺人耳目，赵承绶特邀请晋西北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工卫旅旅长郭挺一出席，意在拉拢他们，分化新军。

与会的爱国将领、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不满阎、赵之流挑动内战、自残手足的倒行逆施，深感晋西北武装冲突已迫在眉睫，遂不顾个人安危，借故离席，赴岚县普明镇以南之史家庄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和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驻地，向赵林、罗贵波报告新军、八路军即将遭受围攻的紧急军情。随后又向四纵通报了顽固派的恶毒计划。

晋西北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并报党中央、一二〇师。晋西北区党委作出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部署。在军事上，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以运动战消灭敢于发动事变的顽军的方针，并加强了地方武装和情报工作。但认为晋西南的反顽战争不会很快结

^①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1939年12月28日。

束，顽军一时不能向晋西北增援，晋西北立即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对应付突然事变的部署只作了些原则性的规定，没有立即进行具体的战争动员和作战准备。

为驳斥顽固派强加于四纵的诬蔑之词，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雷任民、李力果、刘玉衡于12月21日联名致电梁化之、阎锡山指出：“一、自职部集结于岚静边境后，骑一军即星夜调动布置于职部周围，积极准备向职部进攻。职等认为，职部问题系组织内部之问题。外力干涉实足以使事态不堪收拾。日来，职部群情激昂，不可抑止。骑一军应迅速调开以免生意外。职等恳请钧座下令纠正骑一军此等谬误行为，迅速取消对职部之包围态势；二、职部现已集结于岚、静一带，恳请钧座指定岚、静、方、交四县为职部之驻防区。是否有当，敬请准予施行。”这一电报，既表示了直到现在，决死四纵队仍然承认和阎锡山还是一种隶属关系，同时也明白告诉他，赵承绶向新军进攻的企图，新军是早有预料和准备的。

12月23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对时局指示的同时，毛泽东、王稼祥亲自给晋西北区党委和一二〇师等来电指示说：对巩固新军及进步政权还须大胆地、坚决地继续进行，并注意很有理由地对付阎锡山。“阎已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对此冲突，应当采取下述方针：（一）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二）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但旧军一开战，新军应集中全力，采取主动的运动战，首先消灭其一路，然后各个击破之。”新军反攻的口号“应是拥阎讨逆，打倒汉奸，不要忘记拥阎的口号。”八路军必须坚决支持帮助新军，但注意不给阎、赵以口实。¹¹

此后，晋西北区党委抓紧赵承绶未公开发动军事进攻的间隙，

¹¹ 《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迅速调整军事部署,集中兵力,抢占有利阵地。12月23日,暂一师三十六团开至岚县,掩护决死四纵队整顿内部,并协助保障晋西北区党委机关安全。驻晋西北的八路军和新军各抗日力量,也投入紧张的战备之中。

12月27日,苦战兼旬的决死二纵队、一一五师晋西支队以及游击三团突破离(石)军(渡)公路日军封锁线,到达临县以南的招贤镇地区,与决死四纵队取得联系。这一行动震动了晋西北顽固派。赵承绶立即以临县为中心集结兵力,企图阻止决死二纵队等部与晋西北的决死四纵队等部会合。

12月底,中央军委下达最后命令,要求三五八旅主力与决死第四纵队等从岚县出发,接应二纵队和晋西北支队等继续北上,并令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日夜兼程返回晋西北,以便集中力量反击阎军进攻。

12月28日,罗贵波在岚县史家庄主持召开新军各部队和八路军三五八旅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会议提出“拥阎讨逆”口号,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一致推选续范亭为总指挥,雷任民为副总指挥兼决死第四纵队司令员、政委。会议决定,我军于1940年1月1日开始行动,从岚县出发,经赤尖岭,分左右两纵队向临、方地区赵、郭(载阳三十三军)两部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接受任务后,雷任民立即在四纵召开动员会议。部队马上集合,连各团为迎接新年而包的饺子都没有来得及吃,就于元旦凌晨急匆匆出发了。由雷任民、李力果、李夫克率领的右纵队(包括四纵三十五团,二十团,暂一师三十六团的两个营)在行进途中,遇上胡仁奎、刘奠基。胡是秘密党员,当时两人在晋察冀边区政府任职,刘任国民党代表,胡为阎锡山代表,负责联系阎、蒋。这次他们是由重庆返晋察冀途中经过晋西北时,得知新旧军将要开火,特地从罗贵

波处一路赶来寻找雷任民的。

在路边的一座小庙里，胡、刘两人从爱护新军力量的目的出发，劝雷任民以团结为重，勿轻易开战。胡仁奎还以党内同志身分与雷任民在单间密谈，认为阎锡山倒无所谓，关键是日前蒋阎同流合污，蒋在幕后为阎撑腰，而蒋的力量又很大，战端一开，恐不好收场。雷任民说，你们的好心我领了，但是我要对你们说实话。于是，雷任民向他们揭露顽固派率先挑衅的罪行，说明新军行动的被迫自卫性质。他坚定地表示，我们不打敌人，敌人就要消灭我们，无丝毫回旋余地。况军令如山倒，队伍已整装出发，前方可能已经接火，收是收不回来了。三人谈而未拢，胡、刘见劝说无效，作别离去。

这样，1940年1月1日，左右两个纵队按计划分头出击，由刘玉衡和赖星银（八路军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率领的左纵队（含四纵十九团、三十团及八路军三五八旅七一四团一部）很快攻下方山县马坊镇，右纵队在临县白文镇以东的阳坡、寨上村与骑一军主力步兵第三团遭遇，激战半日，全歼该团，俘正、副团长以下1500余人，缴各种枪械1000余支。首战胜利，新军士气旺盛，斗志倍增。

接着，左右两个纵队乘胜前进，先后攻占临县城北的城庄和阎军以重兵坚守的窑头，赵承绶被迫退却，龟缩回临县城附近。

在晋西北反顽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央军委派滕代远参谋长到达晋西北，统一指挥晋西北地区的反顽作战。滕在1月8日到达前线，见到续范亭、雷任民、罗贵波，认真听取晋西北战斗近况汇报后，于1月10日主持召开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主要负责人、各新军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接应决死二纵队等部北上；将顽军赵承绶等部逐出晋西北，以汾离公路为界，完全控制晋西北；晋西南则留给阎锡山，给他一条活路。会议成立了统一指挥八路军和新军作战、处理军政事宜的晋西北行动委员会，由滕代远、续范亭、雷任民、彭绍辉、陈士榘、罗贵波、林枫、韩钧、张文昂、侯俊岩等

人组成，滕代远任书记。会上，还部署了会攻临县的作战方案，进一步调整了军事力量。

1月11日，在滕代远统一指挥下，决死四纵队各部组成的右集团军由北向南，决死二纵队等部组成的左集团军由东向西，对据守临县之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驻在黄河西岸的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一部，亦渡河进驻碛口镇截击阎军。经过数次激战，阎部骑一军与三十三军丧失斗志，且孤立无援，为免遭灭顶，遂于13日弃城仓惶南逃。四纵三十五团（一部）一直南下追敌至汾离公路，缴获甚多。新军于14日进占临县城。

阎锡山的原计划是由陈长捷率阎军与日军配合夹击决死二纵队。二纵识破阎的阴谋，起而自卫反击，与八路军晋西支队一起边打边向晋西北转移。阎锡山即命令原本是依城筑阵监视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动向的赵承绶骑一军从北向南，与陈长捷第六十一军由南向北两面夹击二纵队，妄图一举消灭二纵队。但四纵抢先肃清了内部的反动军官，不仅使自身化险为夷，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从根本上打破了阎锡山的军事部署，迫使其改变决定，命令赵承绶部由南移变为北拉，进攻四纵。这时，中共中央命令晋西北新军与八路军向南出击赵、郭（宗汾）部，迎接二纵等部北上。这就形成决死二纵队由东南、四纵队等部由西北夹击赵、郭部的态势。这一战略形势的巨大变化，使阎的战略夹攻计划破产，新军化被动为主动。赵、郭部为保存实力，不得不狼狈南窜。党中央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命令四纵等部将阎军追至汾离公路以南即停止前进。晋西北反顽战役遂告结束。

1940年1月底2月初，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从冀中地区陆续返回晋西北。随即，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续范亭，政治委员罗贵波，副总指挥雷任民、张文昂）。不久，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军政委员会

由贺龙任书记，行政公署由毛泽东推荐续范亭为主任，从而结束了晋西北两种政权和两种军队同时并存的局面，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阶段。从此，晋西北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完全连为一片，成为西北与华北、华北与华中的战略枢纽和陕甘宁边区的前方门户和后方基地，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十二月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为了争取阎锡山共同抗日，维系山西统一战线局面，不给蒋介石插手山西的机会，决定调停新旧军冲突。2月25日，党中央派王若飞和萧劲光携毛泽东亲笔信到达秋林向阎锡山阐述中共中央关于新、旧军停止冲突、团结抗日的主张，并且提出具体调停建议。而薄一波、续范亭、牛荫冠、雷任民、宋劭文、张文昂、戎子和、刘岱峰、韩钧等牺盟和新军负责人，则遵照中央指示，发起和平攻势。他们或联合或单独，连续不断地打电报给阎锡山、梁化之、杨爱源，痛陈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4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惨杀抗日人员的罪行。并表示愿意忍痛不咎既往，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愿在阎锡山的领导下，坚持进步，团结抗战到底，决无他求。

为配合谈判，中共中央曾准备让雷任民带着晋西北牺盟会和新军领导人续范亭、雷任民等人的信件去见阎锡山，痛陈晋西事变中旧军进攻新军的事实，郑重表达愿意停止冲突，在阎司令长官领导下共同抗日的愿望，但由于阎表示新军仍属晋绥军虽是阎某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且王若飞、萧劲光同阎锡山的谈判迅速达成协议，雷任民带信去见阎锡山之事也就作罢了。这样，在“十二月事变”中经受了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决死第四纵队虽保留了建制与番号，但实际上已从此摆脱阎锡山的束缚，编入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暨八路军一二〇师的战斗序列，正式加入了建设和保卫晋西北抗日民主根

据地斗争的行列。

（五）

粉碎“十二月事变”，成功摆脱阎锡山的束缚后，山西新军何去何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新军的前途和命运，明确指出：新军不编入八路军，保留原有的建制和番号，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同时，开展向八路军学习的整军运动，加强部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

新军各部响应党中央号召，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整军运动。整军中最大也是最振奋人心的事，是逐步公开了部队中的中共党组织，加强了党的建设。整军开始后，雷任民任四纵队党委书记。他和工作队密切配合，统一了党的机构，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体系，健全“党日”、“党课”、会议、汇报等党的生活制度，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纵队党委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轮训，清洗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开除贪污分子，吸收一批经过反顽斗争考验的同志入党。在对干部作了严格审查和鉴定后，提拔一批政治上坚定的优秀干部，加强各级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如侦察、通信、机要）的工作。在自力更生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的前提下，雷任民还从滕代远身边要来十几名红军时代的老战士，改善部队结构，充实四纵骨干力量。

这一时期，四纵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40年底，全纵队党员人数由原来的430人增至876人，由原来占部队总人数的13%上升到25.4%。全纵队排以上干部481人中，党员391人，占81.28%。这就为党的方针政策在部队贯彻执行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使四纵真正成为党指挥的武装力量。

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军队是中共领导武装力量的特征和根

本,也是新军整军的主要内容。纵队党委结合实际,领导党员深入学习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和《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澄清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反顽斗争是变相土地革命”等等错误认识,从而使晋西事变以来,部队以至党内产生的“左”的认识,以及发生的乱抄、乱打、乱抓、乱杀等左倾错误做法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在全体干部战士的民族觉悟、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四纵提出“向八路军看齐”、“学习八路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的口号,以克服自身的游击习气、自由主义及旧的管理教育方法残余,使部队更加革命化,更加适应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要求。

在整军中,四纵按照新的编制,完成了整编。四纵建制内辖两个小团,一个大团,即:四十九(小)团、二十(小)团、三十五(大)团和一个直属教导营,约4000人。雷任民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从八路军调来的孙超群任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先是刘玉衡、后是李力果,参谋长为王兰麟。整个纵队行动上受晋西北新军总部指挥领导,训练与作战完全受八路军一二〇师指挥。

这次整军,历时4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法步骤切实可行,成效显著。正如贺龙所说,四纵真正实现了“由粉红色向红色的转变”。

此后,四纵实际上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1940年3月四纵配合八路军一二〇师和其他新军部队粉碎了日伪军发动的春季大“扫荡”。又参加了晋西北夏季反“扫荡”战役和著名的“百团大战”,成为能独立执行任务的主力纵队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四纵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转战大西北、大西南,在解放战争中为人民再立新功,成为我军的一支劲旅。

陶铸与汤池训练班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1937年冬,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以国共合作形式,在湖北省应城县城西五十华里的乡村小镇汤池创办了一所抗大式的革命学校——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合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训练班从1937年12月20日正式开学,到1938年10月停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培训了四期学员,为中国共产党在鄂中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培养抗日武装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陶铸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去的负责人,领导了训练班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汤池点燃鄂中的抗日烽火做出了重要贡献。

汤池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它是在取得国民党进步人士的支持下,经中共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亲自布置,由陶铸具体负责办起来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抗战,挽救民族危亡。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到武汉,12月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成立中共长江局。12月南京沦陷后,各种救亡团体及华北、华东各大城市的流亡学生,纷纷云集于武汉,一些爱国的国民党重要官员和进步人士,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投降政策极为不满,其中不少人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周恩来、董必武谋求救国之路。

时任湖北省建设厅技正兼湖北省棉业改良场场长的杨显东,

就是一名进步人士。他主张国共合作，认为仅靠国民党的力量武汉也保不住。南京沦陷后，他提出利用省建设厅这一机构与共产党合作，训练农村合作事业人才，为抗日救亡做些有益的工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省建设厅厅长石瑛的赞同和支持。

石瑛也是一名进步人士，与董必武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朋友。1937年11月，他秘密拜访了董必武，转述了杨显东的想法，并告之：建设厅有一个农村合作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委员，任务是训练农村合作干部，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发展农业经济。他认为现在国民党政府训练出来的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只知做官，不会做事，希望国共合作创办一个训练班，用共产党的办法训练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通过组织农村合作社，发动群众抗战。董必武表示同意。

石瑛回去后，即找杨显东商谈训练班的具体事宜。杨显东建议：训练班可以由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兼汤池农村改进试验区负责人李范一负责，但须由共产党派人领导；汤池可以作为训练班的基地。石瑛赞同。

12月初，杨显东同当时的中国农民银行农村贷款部主任辅导员孙耀华一起到了汤池，去找李范一。李范一愿意接受负责办训练班，只是对共产党来具体领导表示犹豫，后经杨显东、孙耀华解释说服，终于同意。杨显东、孙耀华连夜向董必武作了汇报，得到董必武的支持。不久，石瑛即正式提出训练班设在汤池，定名为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合作人员训练班，由李范一主持，学员的招收、训练等工作由共产党派人负责，所需经费和学员结业后的分配问题由建设厅解决。

时为中共湖北省工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陶铸，当得知要创办汤池训练班的事情后，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可用来培养共产党军政干部的好机会，自告奋勇地向湖北省工委提出了去汤池创办

训练班的请求。他的请求经董必武指示、湖北省工委研究，很快得到了批准。

1937年12月初，训练班在武汉开始招生，陶铸亲自在八路军办事处主持口试，共招收学员60余人。12月中旬，第一批学员在陶铸带领下到达汤池，其余的学员也陆续到来。

陶铸到达汤池，在李范一毗邻的房间住下后，即与李范一商量，成立了训练委员会，由李范一任主任，陶铸任教务主任，许子威管总务，杨显东负责联络工作、筹措经费。训练班对外由李范一向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则由陶铸领导。

1937年12月20日，汤池训练班正式开学。陶铸亲自抓训练班的教学方针、教学任务，指出：“办这个训练班固然是培养合作指导员，但更重要的要通过一个月的短期训练，培养一批热爱祖国坚持抗战的青年，要在他们中间发现和培养共产主义的革命者，把他们吸收入党，以他们为骨干，团结和领导这批从事农村合作事业的力量，通过农村合作去接近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最后把日寇赶出中原，赶出中国！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工作，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同时规定了训练班的学习内容，即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理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抗日战争的游击战术，如何从事党的建设和发动、组织群众以及学习合作社的章程业务等等。训练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农民运动、统战工作、游击战术和合作社业务等。内容包括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中国农村的性质和现状，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方法，军事方面注重游击战争的研究。

训练班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主要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央湖北省工委派去的曾霞（即曾志）、雍文涛、刘顺元、李华、陈辛仁等一批干部及许子威、沈少华、童世光、蔡承祖、吴声凯等负责。陶铸也亲自给学员上课，组织学员进行专题讨论，要求学员理论联系

实际,注意用所学到的知识分析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使他们逐渐对革命产生正确的认识。不仅如此,陶铸还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学员,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气节教育,使他们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李范一看到这种情况,非常高兴,十分感慨地对陶铸说:“这个办法好!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抗战一定会胜利!共产党有这样一批中坚,不愁办不成大事!”并写了一幅条幅赠陶铸:“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也!”表达了对陶铸感激钦佩的心情。

陶铸在训练班,准备敌后游击战争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他坚持以武装抗日的思想教育全体学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战略战术训练,把游击战争的理论作为主要课程。

陶铸在训练班,十分重视发挥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训练班开学的第二天,陶铸就建立了党小组,在学员中培养进步分子,发展党员。陶铸指示党员“应当把办合作社当敲门砖,敲开共产党组织的大门”,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合法身分,一边办农村合作社发放贷款,宣传抗日救亡;一边联系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老党员、老红军、各种进步人士在农村秘密开展建党工作,并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各种群众团体,团结各阶层和开明士绅,举办演讲会、座谈会、识字班、训练班,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和统战工作,扩大党的工作基础。在陶铸的领导下,以训练班的党员为骨干,很快在鄂中的11个县恢复,建立了党组织,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坚强的基层组织。

1938年1月20日,汤池训练班第一期学员60余人结业。他们结业后并没有马上分配,而是到应城的膏盐矿区、陈家河、出店、杨王岭等地去实习,体验工人生活,进行社会调查,宣传抗日救亡。陶铸亲自冒着风雪,到各实习点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鼓励他们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陶铸在训练班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

为组织和发动鄂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思想、干部、组织、物质等方面的准备。

汤池训练班第一期毕业的那天，也是第二期开学的时间。第二期学员也是60多人。学员的来源，仍是各地流亡到武汉的大学生。第二期训练班于1938年2月20日毕业，连同第一期毕业的同学，由省建设厅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到鄂中应城、京山、天门、汉川、荆门、钟祥、安陆、云梦等县工作。

汤池训练班第三期开学时间，也与第二期毕业同一天。学员除吸收流亡到武汉的大学生外，还着重吸收了一批当地的知识青年。第三期学员共110多人。第三期在学习期满后，在应城各合作社实习数日，全部委派为农村合作指导员。第三期学员实习结束后，都分配到鄂西荆门、远安、宜昌、恩施、建始等县去开展工作。另外抽调第一期和第三期同学20余人，由李华和沈少华率领到武昌，准备分别到鄂东、鄂北两地开展工作，到武昌后，石瑛发现他们只20个人，力量不足，就要他们在武昌再办一期，人数定为100人。陶铸接他们的报告不久，亲自到武昌来领导。

1938年4月中旬，汤池训练班第四期开学。这期训练班人数约100人，其中除吸收一批流亡武汉的大学生外，还吸收了一批延安抗大、陕北公学毕业和鄂东七里坪党校的同学，他们参加训练班受训，主要是为了取得湖北建设厅的名义，以便于取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合法身分。这一期训练班于5月中旬毕业，分赴鄂东、鄂北两地开展工作。

随着汤池训练班的革命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专署专员石毓灵、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王挺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杨子福、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等要员，先后以巡视、访问为由，到汤池进行调查，寻找扼杀借口。蒋介石为此质问王明，“你们在延安办了抗大，在这里还办什么训练班？”王明顺从蒋介石旨意，

竟指责陶铸太“左”了，要汤池训练班立即停办。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不断威胁石瑛，迫使湖北省建设厅停发经费。在这样双重压力下，汤池训练班于1938年3月被迫停办。陶铸愤慨不已，坚持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坚定表示：“汤池训练班不能在汤池办，就换个地方办；训练班遭到反对，就改用别的名称；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唯独内容不能变——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培养我党抗日游击战争骨干力量，武装群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他同李范一协商，决定用余下的经费，继续在汤池开办一个以补习文化为名的“临时学校”。周恩来、董必武对这一行动给予大力支持。

1938年4月中旬，汤池临时学校在汤池夏家庙正式开办。陶铸任校长（后为童世光），蔡承祖任副校长，教务主任为须浩风，总务主任为李守慈（后为李逊夫），其他负责人及教员有沈少华、吴声凯、李苍江、潘乃斌（潘琪）、林镇南、余一梦、胡笃仲、吕谨、张烈、李平等。这所学校的开办，既及时满足鄂中各地失学青年学习的要求，又满足他们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的愿望。在夏家庙、九龙庙、龙溪彭家祠堂三个大队，每队经常保持80余人，全部是鄂中各地的进步青年。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敌后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学期不限，只要工作需要，随时可以分配。到1938年10月，应城县沦陷前夕为止，临时学校向鄂中各县、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鄂东七里坪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输送干部、学员，前后共计300余人。

这样，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共培养了600多名抗日干部，先后分别派到鄂中、鄂北、鄂东、鄂西各县，在农村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群众的活动，播下了革命种子，特别在鄂中地区，为武汉沦陷前后及时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

日游击战争,进行了干部准备,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许多同志后来成为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领导骨干。还有一些同志在斗争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由于陶铸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坚决反对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到王明的打击迫害,1938年5月,陶铸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在此情况下,陶铸向湖北省委表示,在组织上服从决定,但在思想上,仍保留原来意见。在开展统一战线活动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9月,王明又要把陶铸调离鄂中。周恩来鉴于武汉沦陷在即,进行了干预,要陶铸留在宜昌待命,不久即返回鄂中领导游击战争。陶铸服从组织安排,忍痛离开汤池,告别战友,前赴宜昌。他的革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不计较个人得失,忍辱负重,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为鄂中人民所崇敬,他是汤池战略支撑点上实际上的主心骨。

(须浩风执笔)

红军师长侯中英赣州战役后的情况

文 生

1932年2月4日,中央红军在“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方针指导下,攻打国民党军固守的赣南重镇赣州,经过33天奋战,未能攻克,红军伤亡严重,红五军一师师长侯中英下落不明。现在,有的书中说“在攻城中……阵亡”^①,有的说“被俘”^②,有的说“在战斗中被俘遇害”^③、“被俘后遭杀害”^④。赣州战役后侯中英的情况究竟怎样,本文试根据有关材料作一考证。

侯中英,原名侯国栋,1900年9月16日出生于湖北阳新侯良才村(现属大冶)。青年时代曾在大冶做地下工作,后投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教导团,旋加入共产党并改名侯中英。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2月,和黄茂辉黄腊子一起领导了小箕铺起义。不久,接受党的指示,任红五军五纵队大队长,并率部参加“大冶兵暴”阻击战。1930年6月红三军团成立,任红八军三纵队代理纵队长。一打长沙后任红五军三师八团长,率部参加了二打长沙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8月任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1932年2月率红一师攻打赣州城西门。3月初,敌援军偷渡赣江,突入赣州城,红三军团腹背受敌。3月8日,不得不撤出战斗。侯中

① 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237页。

② 《袁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

③ 《中华英烈辞典》,军事译文出版社1991版,第655页。

④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纪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英在指挥部队撤退中下落不明。

战后，红三军团领导及侯中英的战友们派人到处打听侯中英的下落，但没有消息。他们都以为侯中英战死了，十分悲伤。1932年3月11日，黄克诚写了《纪念侯中英同志》专文，发表在3月23日的《红星》上。该文写道：

侯中英同志在发展革命战争夺取赣州的斗争中牺牲了！在革命斗争紧急的关头，失掉了我们坚决勇敢的干部，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中英同志平日工作积极，战时很勇敢。围赣之役，敌人以全力出击西门，他指挥全师奋勇抵抗，卒将敌人击退，而他自己却在敌人重叠火力之下牺牲了！

中英同志牺牲了，我们起无限的悲痛！我们于悲痛之后，要继续中英同志的精神，发展革命战争，以完成中英同志的遗志，以慰中英同志于地下！^①

其实，侯中英并没有在激战中阵亡，他被敌人抓去了。侯中英没有死的消息，最先由《申报》披露出来。1932年3月8日，即赣州战役结束的当日，《申报》刊登了赣州国民党军陈诚部的捷电，内有“……俘匪师长^②”。虽然没有指明这名师长就是侯中英，但由于侯是赣州战役中下落不明的唯一一名师职干部，如果红军方面当时能看到《申报》，就能推断出侯中英没有阵亡。

不久，一些从国民党监狱中逃出来的红一师战士也捎回了侯中英没有死的消息，红一师的部分战友开始知道侯师长被俘的情况。时为特务连连长的刘少卿就是其中的一人，1989年底他在给笔者的回信中叙述了侯中英被俘的经过。

① 1932年3月23日《红星》。

② 1932年3月8日《申报》。

原来，侯中英带领一支红军小分队掩护红一师大部分撤走后，战到飞机场，一位部下在远处大声高喊叫侯师长也撤退，而侯师长回喊：“我暂时还不能向你们靠拢，我要指挥部队和敌人拼刺刀！”“我还要到前边去，看看有没有一师的部队还没撤出来！”话音一落，侯中英指挥机场上的红军战士迎敌冲杀了过去。

天渐亮，侯中英指挥小分队边战边撤，撤到了南小街。但是，敌人堵住了他们的突围，由于敌人太多，硬拼不是上策，侯中英指挥小分队退到临街的几条小巷子里，与敌人展开了巷战。红军战士有的与敌同归于尽，有的被捉，最后只剩下侯中英一人。

寡不敌众，他闪打闪躲，迅速拐进另一小巷，甩掉了追敌。等危险过后，他折进一座两层楼的商店。找到便服兜裙换了装，往脸上擦了些锅底黑烟灰，和商店厨师一起干炊事活了。稍后，来了一批敌人盘查，没有看出破绽就到别处去查了。敌人估计居民们家中藏有一些被打散的红军，就把居民们统统都往城内赶，侯中英和一些青壮年居民跟被俘战士被关在一间大屋里。看门守兵见他脸色蜡黄，好像身体有病（实际也正患着伤寒），有意问他：“你怎么和这些共军混在一起？”侯中英答：“我是××商店的大师傅，你们的人硬要把我从店里抓来关在这里！”“请你们把我放出去吧，店里还等我弄饭”。敌人在释放一批红军战士和老百姓时，侯中英被人证明是老百姓也在释放之列，走出了看守处。

但他没有走多远，突然，十几个武装敌兵拥着一个敌军官向他跑来，不问三七二十一，一把抓住伙夫穿着的侯中英的衣领问：“你是干什么的？”侯中英仍说：“我是××商店做饭的大师傅。”敌军官走上前，大声斥责侯中英，说“你不是什么大师傅，你认识我吗？你不就是侯中英么，你我不是在黄埔军校同学嘛！”侯中英一面摆手，一面否定了敌军官所指，说：“长官，别拿我开玩笑，我还要赶回去干活，耽搁半天了！”当他的话说完，一股敌兵带来一个告密的。敌

军官拉着这个告密人问侯中英，“你认识他吗？”侯中英连连摇头，说：“他是当兵的，我是个百姓，怎么能认得他呢？”敌军官见侯中英不吐露真实身分而扳起面孔：“侯中英，老实告诉你，我就是在黄埔军校与你同校的肖乾，你是共匪五军一师的师长，哪个不知道！这是你的部下，你师三团的司务长，也许你确实不认识他，可他认识你”。

敌军官下令把侯中英绑走了。

刘少卿回忆道：当时我们从这些回来的战士口头说的经过，判明了侯师长不是被无的放矢才为敌人猜识的，而是由这个司务长当了叛徒所出卖的^①。

侯中英被叛徒出卖被捕后，先是被送到国民党军十八军部，后转到南昌行营^②，以后又交南京处理。在南京，国民党当局先是以许诺高官和美女计等手段企图感化侯中英，并派阳新籍的官员石璜（时任南京市长）和曹建秋（时任南京警察局官员）做说服工作。但侯中英宁死不屈，“愿死不降”^③。

侯中英死不归顺，敌人就拷打他，强制他在监狱中服劳役。在国民党一座监狱里，有一个专门制造木屐鞋的劳役场，侯中英在此服劳役制鞋。服劳役期间侯中英给家乡的塾师侯俊成与欧发昌寄了一封信。后来，欧发昌回忆说：“侯中英来信告之他在赣州作战被捉，现在南京××监狱坐牢。拜托大家关照家眷。并请欧发昌寄20元大洋以用”。“接到信后乡亲们议论说，寄钱去是肯定收不到的，不如派个人去探监。后来秀才侯俊成去了。”侯俊成老秀才赶到了南京，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去迟了一步没见到侯中英，国民党已把他杀掉了！侯俊成万分困惑：“寄回家的信毫无诀别之意，讲是坐牢

① 1989年11月刘少卿给笔者的回信。

② 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70页。

③ 侯国模、欧发昌等老人的回忆。

服徒刑，怎么变成了死刑呢？”为了返乡有个交待，他从狱方和石瑛、曹建秋渠道弄清了侯中英被处死了的原因是侯中英在狱中谋反了。

原来，侯中英在监狱中发动牢友们搞暴动夺武器，他把暴动的计划藏在木屐鞋的木与托布之夹层中，传给大家，暗中串联。敌人发现后，恼羞成怒，认为留下侯中英早晚是个祸患，于是决定将他处决。

敌人处死了侯中英，立即在南京贴了布告，在战区也发了传单。侯中英家乡的个别乡亲曾见到过这布告。据一位大冶曹氏老人回忆：他在南京读中专时，曾在南京新街口看到贴有处决红军师长侯中英的布告。另一位尚在南京做翻砂铸工的侯国模也听闻“侯中英被当局杀了”的消息，他在江苏干活想去收尸又怕国民党连他也抓，故而立即返乡，告之噩耗¹³。

侯中英的某些战友也获悉了侯中英遇害的消息。1977年，原红三军团一师政委黄克诚回忆：战争年代，国民党电台广播了杀掉侯中英的新闻¹⁴。1987年，张震在回忆信中说：国民党曾用飞机散发了杀掉侯中英的传单¹⁵。

侯中英家乡的《村谱》记载：“侯国栋生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葬于南京”。

经查湖北省民政厅1982年出版的《湖北省革命烈士英名录》，笔者始知：敌人先割掉侯中英的耳朵、鼻子，后挖掉他的眼睛，又刺破肚子。当肠子流了出来的时候，他仍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终于壮烈牺牲。

侯中英遇害的消息，在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抗日战争

13. 侯国模、欧发昌等老人的回忆。

14. 1977年笔者拜访黄克诚时的谈话。

15. 1987年张震的回忆信。

时,刘少卿率部战到大冶,曾打听侯中英的下落,但由于侯中英的名字在家乡并不为老乡们熟知,老乡“没听说过侯中英”,因此没有打听到^①。

一些人因为不知道侯中英被俘及英勇牺牲的情况,始有人乘机造谣、中伤侯中英,败坏其名声。但赣州战役的一些亲历者对侯中英赣州战役后的具体情况十分关心。全国一解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派黄赤波查阅了侯中英被杀的敌伪材料。黄赤波查阅后告之“侯中英死得很壮烈”^②，“侯中英同志没有暴露党内任何秘密,牺牲了。”^③

黄克诚还派人打听侯中英遗属的下落,要求有关部门速办“革命烈士证”,在生活上接济其家属,并亲笔致信侯中英的儿子“不忘过去,继承父志”。

1950年侯中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6年鄂东南烈士陵园在侯中英灵位上镌记着惨烈之死。

① 1987年11月刘少卿的回信。

② 朱涤新几次回忆口述。

③ 1950年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朱涤新的亲笔字。

“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

穆 欣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示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个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关于这张大字报，过去有些著作和文章中讲是在康生和曹轶欧指使下炮制出来的，笔者也曾根据当时的传闻，在所写的文章中说过类似的话。然而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1966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紧张的进行中，康生背着党中央，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名义派出一个调查组，以“调查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名义，由他的妻子、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曹轶欧带领前往北京大学。这个调查组住在西颐宾馆，不单了解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也到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等学校了解情况。其间曹轶欧虽曾找过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教授等人谈话，询问北大学术批判情况，说过北大学术批判有问题，煽动他揭发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和北京市委领导，但被拒绝。曹轶欧当时没有提出用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批判。这张七人签名的的大字报则是他们自发的举动。

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7个人，都是北大哲学系的党员教师

(只杨克明刚调离北大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以后又调回北大哲学系),聂元梓是这个系的党总支部书记,赵正义是副书记。1964年夏至1966年初,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过反复:中央派来的第一个工作队,认定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为首的校领导在教育路线上犯了错误,发动群众揭开了北大“阶级斗争的盖子”。当时宋一秀、高云鹏、杨克明、赵正义、夏剑勇都是社教积极分子。聂元梓调到哲学系担任总支书记不久,她对陆平为首的校党委很有意见,同哲学系的社教积极分子站在一起,起过重要作用。1964年底撤走了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第一个工作队,张磐石受到批评。1965年1月,派来北京市委领导的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为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为副队长的第二个工作队,其间北京市委帮助陆平推翻了第一个工作队的结论,扭转了北大社教运动的方向。北京市委又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对追随原工作队的积极分子进行了批评。这个会议进行了大约半年,要求前期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会上作了检讨。聂元梓也在会上作了“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感动”的检讨,但她对此怀恨在心,以后曾把别人对她的批评说成:“国际饭店会议要把我搞成一个臭女人,我当时多伤心啊!”后来,1966年6月5日,陈伯达主持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抨击国际饭店的这次会议说:“陆平保皇党”“在前北京市委的直接指挥下,还疯狂地反扑,进行反攻倒算。他们给革命派捏造种种罪名,戴了许多帽子,组织围攻,轮番作战。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七个月之久。这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1966年5月21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五一六通知》,文件点了彭真的名。那些在国际饭店会议上被批评过的人,就开始活动起来。曹轶欧这个调查组的成员张恩慈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教师,他

和杨克明是很要好的朋友，也曾在国际饭店那次会议上挨整。杨克明见到张恩慈的时候，曾经谈论北京大学的运动，对学校运动的情况表示不满，杨克明还谈到他们要写材料揭发国际饭店的问题。张恩慈说，现在向中央写材料申诉的人很多，中央看不过来，他认为向中央写材料作用不大。张恩慈还说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报》、教育部都已经有大字报了。杨克明后来回忆这次交谈的情形说：“我事先见到张恩慈，那是战友交换情况和意见，他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康生、曹轶欧的意图，也没有主张我来组织写大字报。只是对我想给中央写材料反映情况的考虑，他认为用处不大。这时他顺便谈到北京日报社里有出大字报的消息，而这，我也是回来后同赵正义商量时，才成为促使我们考虑可写大字报的主意的一个因素。”

杨克明回来和赵正义商谈时，认为向中央送材料不如写大字报好。当时赵正义刚刚参加过北大校领导召开的会，听到宋硕等人的指示，还作了记录。其中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强调各级领导要坚守岗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积极投入斗争。北大校长陆平也在会上说：“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杨克明看了记录，觉得这正好是压制运动一个证据，可以作为公开批判的靶子。这时他们两人又找到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一起商定写大字报。

大字报如何写？开始他们商定以赵正义的一篇现成批判稿为基础，由宋一秀改写。结果改写得不理想，又让宋一秀重新起草，再经大家反复修改，感到仍不满意，公推杨克明再作修改。5月24日夜里，杨克明在宿舍里通宵赶写，直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写完。他对原稿作了很大修改，几乎等于重写。杨克明在天亮了前往电工研究所上班时，将新稿交给高云鹏。5月25日上午，高云鹏、赵正义、夏剑豸来到宋一秀宿舍集体研讨杨克明的修改稿，此时聂元梓前

来碰上了。经过大家逐段逐句认真地推敲后定稿。随后，分由高云鹏、夏剑勇各抄成一份大字报。聂元梓是北大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大字报上第一个签名。杨克明不在场，由高云鹏代签；赵正义临时有事离开，委托宋一秀代签；宋一秀这时又找来哲学系青年教师李醒尘，向他说明情况后，李醒尘也高兴地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聂元梓虽然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了第一名，实际上在这张大字报酝酿起草的整个过程中，都与她的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多数人对聂元梓的人品、做派以及在国际饭店会议上的表现有看法，不愿意同她打交道。这张大字报的主要执笔者杨克明说：

（大字报署名的）七人中除李醒尘外，六个都是“社教积极分子”，也都参加了国际饭店会。由于聂元梓在国际饭店会的表现，我们几个多次议论：以后再也不要同这号品质极差的人一起干，从此少啰嗦。

因此，大字报的事，从我找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夏剑勇商量、讨论起，让宋一秀起草再讨论，由我在5月24日夜改写，直到次日清晨我把稿子交给高云鹏为止，从来没有打算找聂元梓参加，在那中间她好像也曾到我在校内筒子楼宿舍串过门，我们也没告知她要写大字报的事。也许她在上面（聂真那里？曹轶欧那里？总之我们知道她的路子不少）听到过什么风声，但她并未告诉我们，我们也没向她打听。所以，原本聂元梓与写大字报的事情没有关系。

但是她在最后一次碰上了、参加了而且签了第一名。而正因为让她签了第一名，有的同志一直有些怪我；我也觉得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但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我得去上班，而其他五个人对聂了解不够深，还照一般人的想法抹不开面子，她又是总支书，来了还能不参加，参加了还能不放在前面？

这张大字报在5月25日上午定稿后，他们闻知第二天北京大

学党委会要召开全校批判“三家村”大会，遂即抢先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这张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

大字报一贴到墙上，立即围上来许多师生观看。三个小时以后，就有大量反击的大字报糊满了周围的所有墙壁，仅仅半天，全校师生就贴出了1500多张大字报。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以致互相推推搡搡。因为北大有许多外国留学生，马上把消息传到国外。

在当时急速发展的尖锐复杂情势下，杨克明打电话告知张恩慈并商量怎么办。而杨认为关键在对大字报内容、写法本身应如何判断。杨要张看了这张大字报之后判断它写得对不对、有没有毛病。张恩慈事先不知道他们写、贴大字报的举动，是在大字报贴到学生食堂内之后才见到的。在看到大字报所引起的反响后，对杨克明提出的问题，也不敢轻易回答，就带他到西颐宾馆问曹轶欧。曹轶欧看了大字报底稿后明确地说，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不许揭发他们？杨克明听了她肯定地回答后，也就放心了。这张大字报底稿被曹轶欧留下。

这张大字报当时曾在5月27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全文发表。6月1日中午，毛泽东在杭州看到了，就在这份《简报》上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

当天下午4时，毛泽东就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把这个批语全文告诉康生。康生接到毛泽东从杭州打来的电话，连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都没有告知，就先急急忙忙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他在钓鱼台眉飞色舞地说：“聂元梓的大字报今天晚上广播，明天见报！”

6月1日晚上7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大师生感到非常意外。广大师生不知内情，愤愤不平。有些师生高声喊道：“不要盲从！”“在三小时之内把中央广播电台的气焰压下去！”校园里立刻又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其他一些院校有不少人到北大来看大字报。

广播这张大字报的举动不仅使北大师生感到意外，也使许多中央负责同志感到异常意外。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听到电台广播，就急匆匆地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回答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刘少奇事先同样不知道，听到广播，王光美去问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听到否定的回答后，王光美对秘书说：“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

6月2日，陈伯达刚刚夺权的《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大阴谋》为题（副题是《〈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 妄想坚守反动堡垒》），在第一版发表

了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王力、关锋起草，陈伯达审定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煽风点火，为把这场动乱推向全国人造舆论。

康生虽然事先没有插手这张大字报，但他出于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对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情有独钟，极力支持的。这张大字报一广播，群众纷纷给中央广播电台打电话，提出质问。电台连夜把听众质问的情况加以整理，写成《简报》报给康生。康生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真云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康生从不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他在6月2日来到北大30楼前的空场上，洋洋自得地向围拢来的师生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众所周知，这是毛泽东的话）他还故意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又因康生曾在1967年1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派曹轶欧带领调查组到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因此，其后在有些文件和文章中，都说这张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操纵下炮制出来的。这些署名者曾多次肯定地对人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至于聂元梓在此期间是否找过曹轶欧，动手起草这张大字报的5个人都不知道。她也根本没有参与大字报的酝酿和起草，只是在最后定稿时碰上了。根据她的提议修改了最后一段，并且加了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杨克明说：“她这个投机家能积极签下第一名，照我猜想可能是有点风。但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而即使如此，因我们写大字报原来根本就没有找她，就不能说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的指使。”

可是，聂元梓却以此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使她在这场动乱中

一跃而为首都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颇出了一阵子风头。这时“调查组”的张恩慈曾向曹轶欧反映：大字报贴出后，因聂元梓在政治上，生活上问题很多，名声很臭，大字报公布后她也表现不好，北大师生强烈反对她。康生不以为然，恶狠狠地嚎叫：“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

作为一个不算很大却也不小的历史事件，采取实事求是的原则，弄清这张大字报产生的因果，弄清康生和曹轶欧这个调查组同它有何关联，以及在大字报上签了第一名的聂元梓同其他签名者的关系怎样、她在大字报起草过程中究竟有过多少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

华北财经办事处

许 卿 卿

一、统一管理华北财政经济，调剂各区财政关系，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简称华北财办）

解放战争以来，华北各解放区遵照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和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财政原则，大力发展解放区经济，给解放战争以巨大的支持。但是，解放区的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各解放区之间没有一盘棋的思想，各自为政较严重，表现在：一是，互相抵制。如各区各自提高本币价格，压低友邻区的币值；各自建立税条约，税率不统一。二是，互相封锁。如冀中、冀南、渤海三区，均采取垄断专卖，没收对方货物等办法。冀南专卖棉花、渤海专卖食盐，冀中则禁止棉、盐入口等等。这些现象严重地束缚着解放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时华北各解放区已联成一片。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是党中央为统一管理华北各解放区财经，调剂各区财政关系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1947年4月16日，中央向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董必武、朱德、刘少奇致电：《中央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指出为着争取长期战争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董必武任办事处主任，华东、五台、太行、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人选由各区提出，正副主任均由华北财经会议选举。

5月9日,薄一波在财经简报第二十号中,将会议选举参加办事处人选报告中央,他们是薛暮桥、方毅(华东)、南汉辰、姚依林(北岳)、杨立三(邯郸)、白如冰、陈希云(西北)。

1947年5月1日,中央致电薄一波并财经会议,对办事处工作范围作了初步规定:今后各区银行发行权,各区脱离生产人数比例,人民负担标准,各区贫富间的调剂等,可由解放区财经办事处在中央领导之下去统一计划和规定。并要求会议对于财经办事处应直接受理几种统税和专卖收益来调剂贫富区域问题,还是只由财办处统一筹划指定富足区域来协助贫弱区域为便利提出具体意见。

华北财经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于1947年5月11日通过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对成立华北财办目的做了总的概括:“调整各地贸易关系,统一各区经济政策和对敌经济斗争,调剂贫富,平衡各地人民负担,统一规定各地供给标准,统一计划掌握各地货币发行,稳定各种货币兑换比率,并在这些基础上,逐渐达到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进一步的统一。其他具体工作则完全由各地机动处理。”《决定》由会议主席团及董必武作最后修改后报中央。1947年10月24日,中央向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察冀中央局、华东局、晋绥分局、西北局、中原局,并告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东北局发出了《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及对各地财经工作的指示》。

1947年8月1日,华北财办制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规定了华北财办的工作任务:

1. 制定华北解放区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
2. 审查各个解放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计划,并及时作必要的管理与调剂。
3. 掌握各个解放区的货币发行。
4. 指导各个解放区的对敌经济斗争。

5. 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
6. 审定各个解放区的人民负担。
7. 审查各个解放区脱离生产的人数及其编制与供给情形。
8. 审核各个解放区的财政预算,并作出必要的调剂办法。

另外,《组织规程》也规定了华北财办的组织设置,规定华北财办内部设秘书处、财政组、经济组、军事供给组、调查研究室。

1947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组织规程。华北财办正式开始运作。

二、华北财办大展宏图,成绩显著

华北财办在1947年4月—1948年4月底间做了大量工作:

(一)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是财政工作的有效方针,逐步统一了各解放区财政。华北财办根据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的具体实际,继续贯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方针,在调整和领导中,使各区的财政逐步走向统一。过去,有些地区由于过度分散经营,从原来想自给自足发展下去,走到了自私自利的道路上,结果是小公有,大公无,小公富,大公穷,脱离了群众,妨害了公家。华北财办针对这种情况,注重做了以下几点:在财政工作上,(1)研究各地财政收支,进行适当调剂,并计划促成各解放区财政收支的统一;(2)审查各地部队及地方人员之编制及供给标准,进行适当调整,逐渐做到统一;(3)研究各地人民负担,及税制税率,尽可能的做到相当统一;(4)协助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野战军自己建立家务,并保证其必要的供给,协助西北局保证西北野战军的供给。

在经济工作上:(1)指导各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农业委员会及合作委员会,推进各地生产建设;(2)指导各地工矿生产,准备创设工矿局,采管某些大规模的工矿企业;(3)组织各地的对敌经济斗争,并在某些地区建立共同的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及进出口

贸易公司；(4)组织各地物资交换，便利土产运销等；(5)推进各地水陆交通建设，发展运输事业，便利军事运输及群众运输。

在军事供给工作上：(1)统一计划各地军工生产，制定共同生产计划，互相调剂，保证反攻中的武器弹药供给；(2)指导各地兵站，统一管理供应南征部队的兵站组织，便利前线供应；(3)从协助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及西北野战军统一供给标准，逐渐做到野战军的统一供给；(4)指导各地组织民夫担架，调整战勤负担。

华北财办正是在有效的统一领导，各区分散经营的财政工作方针指导下，积极进行财政统一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调查研究，积极筹备统一货币的工作。统一货币，是统一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因华北各解放区各自发行货币的币值比价不同，而产生了互相打击、互相抵制的问题。华北财办对此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认真分析。董必武认为，具体把财经事项统一起来有许多基本问题，主客观条件都未成熟。统一发行票币与各区收入支出、银行贸易市场有密切关系，要慎重处理、逐步进行。第一步，华北财办必须确实掌握各区的发行额和预算，了解各区票币的互换率，以及粮食、棉花、纱、布、油、盐、煤、金银等物的价格，基本上完成银行的准备工作。第二步，发行少量的统一票币。这主要作各区汇划用。当前，市面上也可以流通。第三步，在各区票币发行的定额中，统币发行占一定的比例，可以是2：8或3：7，逐渐推行统币。第四步，停止各区票币的发行，完全发行统币，这时是各区区币和统币的市场。第五步，用统币收回各区票币。华北财办在谨慎的统一货币的步骤与办法的原则下，积极筹备，为发行统一货币，设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并派南汉辰任筹备处主任，筹集基金，创设中国人民银行，逐渐建立中央财政。

(三)加强财政管理，建立财政规章，为统一华北财政打基础

华北财办成立以后,加强了对财政的领导和管理。1947年华北财办制定了《一九四八年供给标准》。同时,作出了《关于华北各解放区1948年几个财经问题的决定》,要求华北人民及财政机关,除保证华北自身供给外,把支援华中战争需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48年2月23日,华北财办向邯郸局、华东局发出了《中央对各地印流通券的规定》,对流通券纸张尺寸、券面额、正背面字体、编号、券版花纹及印刷机关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1948年4月5日,华北财办向晋冀鲁豫、晋察冀中央局颁发了《关于两区货币实行固定比价及互相流通的规定》,规定从4月15日起,鲁南银行货币(鲁钞)与晋察冀边区银行货币(边币)按比价为1元:10元。为了调整各区财经关系,华北财办还制定了《华北各解放区目前财经关系调整办法》,本着富区照顾贫区、特产区照顾需要区、出超区照顾入超区(内地贸易)、战争较少区照顾战争频繁区,提倡服用土货、抵制外货的原则,对各解放区有关财经问题,提出了调整和解决办法。此外,华北财办还作出了《华北财经办事处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整编队伍、审查干部思想时,尤其在检讨财经工作时,必须对各种贪污浪费现象进行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各部门的贪污浪费现象,引起全党警惕,而对于各种贪污案件,必须按其性质及情节轻重,认真处理。

华北财办通过完善财经规章制度和在财经管理工作中采取的重大措施,使华北各解放区的经济得以健康发展,为全面统一华北财政奠定了基础。

(四)建立、扩大组织机构,是统一华北财政的重要步骤。在调整华北经济过程中,华北财办认识到原有的组织机构不能适应新的管理要求,特别对于跨地区的经济如何管理问题。于是,华北财办建立、扩大了一些专业性公司和交通等管理机构:

1. 1947年底,华北财办创办了渤海盐业公司。它由渤海、冀

中、冀南三个地区工商局或贸易局合组，受华北财办领导，管理渤海区黄河以北地区食盐的生产及运销、推广工作，公司资金暂定北海币 15 万万元，三地区各出 5 万万元。渤海盐业公司成立后，对食盐的发展、平穩物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扩大原冀中的采购委员会及永茂公司。为统一天津方面的采购工作，解决进出口各种纠纷，保证兵工、通讯、医药及印刷四大器材供给，增强对敌经济斗争，华北财办决定扩大原设冀中的采购委员会及采购商店（永茂商店（公司））。采购委员会的任务为：审查各区采购计划，分配物品，解决各区进出口纠纷。采购委员会按各区采购计划，决定采购数量及分配办法，采购计划由永茂公司具体实施。

3. 成立卫运河临时委员会。卫河、运河流经冀中、冀南、渤海三区，为便利航运，华北财办接受财经会议期间各区代表所提意见，于 1948 年 1 月 8 日成立卫河、运河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主要任务是：（1）统一计划治河工程，检查各区河务局工作；（2）统一规定船舶管理办法，指挥调动及调剂沿河船舶，保证军运货运；（3）调整各地贸易关系，排除物资交流中的各种障碍；（4）研究工资运费政策及船工、码头工人管理办法；（5）研究水上治安；（6）其他各区交议事项。

1. 成立石德铁路管理委员会。石德铁路经过冀中、冀南解放区（从石家庄到德州）。委员会的任务为：决定石德铁路的建筑计划及管理办法，监督石德铁路管理局的工作，保证两地区的密切配合。

通过建立、扩大组织机构，使华北地区的盐业、采购、河运、铁路等行业得到了统一管理，积累了经验，是统一华北财政的重要步骤。

（五）召开会议，研讨问题，统一思想。1947 年 12 月至 1948 年 3 月，华北财办先后召开了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交通会议和金融

贸易会议。会上,各地代表对兵工、交通、金融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使各解放区的同志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到统一财政的重要性,而目前应在华北财办的统一领导下,做好本区的财政工作。

三、华北财办完成历史使命、功不可没

随着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日益临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东渡黄河,到平山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领导的工委会会合。为统一全国作准备,1948年5月周恩来指出:“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指华北财办),要搞统一经济。”此后不久,中央决定取消华北财办,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董必武任部长,薛暮桥为秘书长。华北财办遂于5月底结束,历时一年零一个月。华北财办成立一年多来,在中央领导下,按照华北财经会议决议精神积极进行工作,使华北各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董必武在华北财办结束工作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对华北财办工作作了如下估计:

(1)华北财办调整了各解放区间的相互关系,减轻了各区财经工作的矛盾,如撤销了各区间的关税壁垒,规定了两区货币兑换比较合理的办法,增进了各区间贸易工作往来。

(2)华北财办协同各战略区负责人,调剂了贫富区的财政,较富区帮助较贫区,使较贫区在财政上得以减少其困难。

(3)华北财办在财经工作人员中开始传播了毛泽东思想,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财经工作的总方针,确定了战时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基本路线,使战时脱离生产人数、供给标准和人民负担三个基本矛盾的要求,得有调剂。

(4)华北财办反对了在财经工作人员中相当严重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

(5)华北财办为统一财经工作做了铺平道路的工作,思想上、物质上都为统一作了些准备工作。

(6)华北财办还搜集了解放区一部分财经问题的资料,可供今后研究。

(7)由于华北财办成立时间不长,经验不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解放区间货币比价不很合理,如何平稳物价和解决财经问题的办法不够多,等等。

总之,华北财经办事处在成立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大量的工作,稳定、发展了华北经济,支援了前方作战,为建立统一的中央财政打下了基础。

司徒雷登与美国百年侵华政策的破产

王 森

编者按：本文是国务院参事王森为揭露美国百年侵华政策和司徒雷登罪行而写的专文。王森原名郭生秀，1906年12月出生于山西省临县，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历任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驻丹麦王国全权大使等职，工作之便查阅了大量美国侵华的档案资料。曾写过《取枪记》、《407号图纸》、《神·鬼·人》等革命文学作品。

美国自南北战争结束、国家由分裂而统一后，便步英、法、德列强后尘，向外侵略扩张。1814年，美国迫使中国与之签订了《望厦条约》，规定美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等特权。美国对中国的侵略，除了依靠船坚炮利外，还派传教士到国外传教，进行文化渗透。

1904年底，司徒雷登以传教士身分来华。1908年调南京金陵神学院讲授希腊文课。1919年奉调北京，负责筹办教会的燕京大学并担任校长。1946年，升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任回国。

司徒雷登以传教士身分来华，实际上充当了美国侵华的先锋作用。而他自担任驻华大使起，则积极贯彻美国的侵华政策，明目张胆地干预中国内政。他一系列的反动丑行，把自己铸成一个十足的“内战大使”。

司徒雷登来华的前前后后

司徒雷登 1876 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父亲司徒约翰是美国早年派遣来中国的传教士。他和妻子玛丽在杭州活动了 40 年之久。

司徒雷登 12 岁时被送回美国接受国民教育。他在美国接受了一系列教育。他最后进协和神学院研究神学，取得博士学位。他在协和神学院一年级的時候，就开始考虑将来的工作问题。这在 1946 年前燕京大学教职员为庆祝司徒雷登 70 岁寿辰而编写的《司徒雷登年谱》中有所记载：“先是，先生心中旦夕盘旋：是否当为宗教牧师，或毕生为教育事业。先生笃信宗教，委身为牧师，本无疑问；然数载中竟狐疑莫决者，盖虑为牧师，则或须应召赴华，供职差会，幼年在华所受苦况，及返国后所受讥评，心中受伤颇深，未易半复。”^① 鉴于父亲一生碌碌无为，在杭州死守着一个不起眼的街角里的小教堂，几十年只吸收几个地位低微的教徒，待遇又微薄，生活拮据，司徒雷登真觉得没意思，再加中国贫穷落后，一想到这些就充满厌恶之感，所以他把去中国布道视为畏途。

司徒雷登在协和神学院三年级的时候，迫于环境，不得不加入该学院的“学生义勇外邦布道团”。该团为美国青年所组织，加入者都随时应召，远适异国，宣传宗教。他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里写道：“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听到钟楼上一次又一次地响起钟声……简直无法形容我多么厌恶去中国当传教士的心情。在我心目中，那里并非是我所设想的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国家：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

^①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8 页。

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我天生来就不喜欢做传教士。然而人们在当时都普遍地认为一个人如想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耶稣信徒,在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他就应到国外做一个传教士。或者,他至少得做到欣然‘应召’。我肯定做不到这一点。”^①

然而后来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司徒雷登和他的父亲一样,也以传教士身分来华传教。是什么使司徒雷登改变原来的主意呢?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中写道:“在我个人生涯中,许许多多具有重要意义的选择都是在受到外部束缚并与个人心愿相违背的情况下作出的,有一股并非属于我自身的力量,一再驱使我去经受磨练和从事一些我不曾企求或预见到的冒险事业。”^②

那么,这个“冒险事业”究竟是什么事业?“一股并非属于我自身的力量”是什么力量呢?这些疑问,司徒雷登是不肯写明的,但有人却道出了迷津。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柯说:“司徒博士是来中国搞政治的”。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陆志韦在《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一文虽然对司徒雷登的书斋——燕京大学校园内临湖轩东厢房正是司徒雷登一切政治阴谋活动的指挥部缺乏认识,但从他所说的“我始终弄不清司徒的‘马戏班’一共有几个‘圈子’(像美国人所说的)。一般说来,司徒的赤裸裸的政治阴谋活动大多不是在校园内进行的”^③,也可看出司徒雷登在中国搞了政治阴谋活动。

① [美]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4页。

②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页。

③ 《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第7页。

司徒雷登的足迹、手段和网

1904年司徒雷登来华是要超越他的前辈,为美国“融合中国”干一番事业的。可是当他和妻子艾琳与专程来上海接他们的老父亲回到杭州时,一看老父亲的生活环境仍是20年前那个老样子,一股厌恶的反感不禁油然而生。他十分厌恶像他父亲那样,死死守着街角那个简陋的小教堂。他想,必须另辟途径,开创局面,走出教堂,到广阔的社会中去结交朋友,接触中国的三教九流,特别是中国的上层人物,不管是什么派什么系,他都希望交往接近,连侍从仆役都需深入了解。

司徒雷登交际的重点是攀高结贵,尽力寻访当地有地位的人物。据说:有一天,他在大街上行走,忽然看到一辆相当漂亮的骡轿车飞驰而过,仔细一看,乘车的是位白发老太太。他立即意识到能够乘坐这样豪华轿车的人,必定是高贵人家,便向人打问,当他得知坐车的是曾国藩的女儿时,立即跑步追上去与这位老太太攀谈,甚至称赞她的先尊剿灭太平天国的功劳,还提到当年驻上海的美军协助剿灭长毛的事。从此,与曾老太太结为友好。

杭州风景不错,可缺乏上层政要人物,所以司徒雷登在杭州几年,杭州话、苏州话虽学得相当流畅,但所结交的人,合乎他理想的不多,心情很郁闷,因而更不屑与他父亲一起赶庙会或串乡村讲道去了。后来在他多次向“差会”请求下,于1908年被调到南京任金陵神学院讲师,教希腊文课。但是,南京当年也不是政治中心,地方人物作用仍然有限,他便以撰写《希腊文初阶》来排遣时光。然而机会偶然也能碰到一些,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经活动,弄到一张美国合众社的临时记者证,不仅见到了孙中山,还结识了蔡元培、王亮畴、颜惠庆以及陕督

军阀陈树藩等要人。然而不多日，孙中山被迫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离开南京去了日本。司徒雷登的高层交际机会也随之消失了。

1919年司徒雷登的好运终于来了。他奉调北平，负责筹办教会的燕京大学并担任校长。北平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能够在那里建立一所美式大学和以大学校长的身分进入广阔的上流社会，远比一个传教士身分优越、方便得多。所以他在《在华五十年》中把这一盛事写为“燕京大学——实现了的梦想”，他写道：

“1918年下半年，来了命令，要我离开金陵神学院去北京，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的大学，我实在不愿意去……第四天早上醒来时我得到了希伯莱预言家所说的耶和华的启示。我当时就意识到，我有责任接受这一召唤……北京也应该有一所与传教事业相称的大学。”^①

1919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序幕。司徒雷登逆历史发展的潮流，想方设法使燕京大学成为“世外桃源”。他以优越、舒适、稳定的生活条件作保证，罗致（实质上是收买）了某些忠实于他，忠实于美国的教职员工。校园生活是美国模式，师生间和生活中，以说英语为荣，教材多用英文版本。有的学生从教会幼儿园、小学、中学再升入燕大，英语说得呱呱叫，却写不出一封中文信。

司徒雷登借口为男生建宿舍楼，向颜惠庆募来一笔款子，他却挪用为校园修筑了大围墙，一心想把燕大与现实社会隔离开，然而燕大师生中仍不乏爱国志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一直在活动，热血青年们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前仆后继。

司徒雷登表面看来似乎很闲适，偶尔讲讲道，骑骑马，主持个别不痛不痒的会议，如此而已。但是这所美式大学的上上下下，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44—47页。

切运作都得按他的脾胃行事，帮他完成美国文化侵略（精神输出）的任务。他对所有教职员工，特别对于出身于官僚、政客、军阀、华侨巨富的学生的思想观点，逐个进行秘密了解，加以分析，哪些可供利用，哪些可以培养，分门别类记在胸中，时而还单独召见谈话。有一个山西省的老官僚的儿子在燕大上学，一入校就被列入单独召见的册子，但长期未召见。司徒雷登对下属说：“这学生豪门家庭，但赤化思想”，随即在这学生名字上作了个记号。

司徒雷登在培植亲信和培养忠诚于他、忠诚于美国的“臣仆”上是肯下功夫的，也是成功的。其中有的长期甚至永远要做隐蔽活动，便从不公开其姓名，有的不得已时使用一段时间，只提所干的事，决不把其姓名写进他的回忆录里。只有傅泾波一个人，是他朝夕离不开的贴身秘书。

傅泾波是清朝望族后裔，在燕京大学上过学。由于他聪明伶俐，领悟力强且又温顺，被司徒雷登看中，聘为秘书。由于他对恩师无限忠诚，又非常主动，对有些事还能出谋划策，所以后来司徒雷登把他当义子看待。不管是公开的或秘密的外出行动，总把傅泾波带在身边。正如日本特务头子今井武夫所说：“傅泾波像司徒雷登的影子，紧紧跟着他。”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在好多地方都提到傅泾波，而且往后还会更多地提到他。要是不用一节来写写他，也就无法完整地叙述我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我与中国官方人士的来往。”“让燕京在中国站住脚，最牢靠的办法是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泾波迅速体会到了我的意图，主动帮我的忙……这样，我们就开始了一场大交朋友的运动。我们从满洲到香港走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还到了中国的大后方重庆和其他地方。”^①司徒雷登与傅泾波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13—115页。

的亲密关系,更为显明的表现在司徒雷登当驻华大使后,把傅泾波带进美大使馆作秘书,这在世界上史无前例,难怪连美国五星将军马歇尔见了都张口结舌。司徒雷登则诡谲地眨眨灰色的眼睛低声说:“他(傅)的忠诚不比我们的人差,而我们的人干不来的事,他却能让我们满意。”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北平几个大学撤往大后方,燕京大学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留了下来,继续开课。司徒雷登为便于应付日本人,处理发生的事尤其语言不通弄出的乱子,启用了另一个傅泾波式的年轻人。此后,这个青年人也成了司徒雷登书斋的“常客”,他们经常是三人一起,甚至通宵议事。

关于这个青年人,司徒雷登说:“这个学生幼年时代和大学毕业都在日本上过学,他讲日语跟当地人(即日本人——编者)一样流利。在我们同日本军官和其他人经常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发挥了极宝贵的作用。”¹

司徒雷登对他的这个秘书非常重视,还晋升他为燕大的秘书长。这个秘书叫肖文安,又叫肖正谊。肖文安自称是福建厦门人,实际上出生于台湾省,幼年在日本。九一八事变时,肖文安是燕大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事变爆发,全国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强烈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收复失地。燕大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多次参加北平各大学的抗日爱国活动。每次肖文安都积极参加,还一度报名要求参加北平各大学南下请愿示威。但是,肖文安突然退学离校,据说他出国留学去了。连当时燕大地下党书记都纳闷肖为什么即将毕业却退学?经过了解,得知他不是去美国而是去了日本东京,已是帝国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了。地下党很快弄清楚是司徒雷登校长给搞的奖学金。

1.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19页。

原来当肖文安积极报名南下示威时，司徒雷登连夜召见他，在临湖轩东厢房书斋单独叙谈，告诉他献身祖国，应将目光放远放大。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靠学生一时热情游行示威，解决不了问题，应从日本老窝入手。司徒雷登肯定了他的日文基础，鼓励他去日本留学，一边学，一边多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告诉他学费不成问题。当肖文安毕业回国后，司徒雷登把他暂时安排在山东济宁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委员会做干事，实质是储才备用，七七事变后，司徒雷登不得已启用了肖文安。为避免人猜疑，还绕了个圈子，请求美国驻济南领事馆代燕大聘请肖文安到燕大任职。此后，司徒雷登的书斋又多了一个来客，每次议事肖文安必参加。

司徒雷登为在中国建立起关系网，广泛结交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一度活跃过的军政人物，如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山西阎锡山，西北冯玉祥，华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国民党何应钦，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系陈济棠等。这些人物，与司徒雷登不过是一般拉拢，需要时互相利用。至于与司徒雷登关系深的，或者与他名声有关系的，尤其是已列入他网中作为棋子的，司徒雷登一向是保密的。例如：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内蒙古德王（德穆楚克）降日，在日本支持下，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司徒雷登通过傅泾波很快与德王建立起秘密关系。东北军一团长李守信1934年投降日本，成了德王伪自治政府的副手，司徒雷登同样与其建立秘密关系。

为了反共防苏，司徒雷登特别关注“满洲”和内蒙的动向，他在这方面的关系特别多，也肯下大功夫。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对东三省人民自发组织义勇军抗日，也不支持，可是这年年底，却秘密委任盘踞在远离东北几千里地的绥远省西部河套（五原、临河）地区的土匪王英为义勇军司令，委任状上还郑重盖着蒋介石的印记。王英一本正经地把大青山前后三股土匪纠合一

起，编成三个旅，号称三个师。为脱掉匪名，也做些抗日宣传，到处招兵买马……司徒雷登无孔不钻，对这股土匪军也很关注，迅速派人了解其实力，考虑与之建立秘密关系。据知情者分析：司徒雷登此举属于他秘密构建反共防苏联盟、阻止内蒙共产党力量发展的一个步骤。

三次派人去东京秘密活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则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亲日的汪精卫公开投敌，并于1940年成立了伪中央政府。美国对于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是不同意的。司徒雷登为贯彻美国政府的意图，重点是阻止汪伪政府成立，开始与汪派接触。

司徒雷登对汪精卫的印象是：“能说善写，待人殷勤周到，但缺乏基本的做人的道德品质……他是同重庆的国民政府决裂而试图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唯一国民党要员。”^①司徒雷登没有说出与汪精卫的秘密来往的人员，但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判决与汪精卫同伙的大汉奸、清末大臣岑春萱的儿子岑德广（汪的左右手）无期徒刑，他写书面材料营救岑时才将他与汪精卫的秘密来往公开了出来。

司徒雷登与汪派的秘密来往，是通过岑德广进行的，岑德广与傅泾波是故交。

司徒雷登开始想与汪精卫本人会晤面谈，但因目标太大，不易保密，只是与汪精卫的第二把手陈公博、周佛海进行了会谈。会谈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06页。

于1910年2月24日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岑德广家秘密进行的。参加的有五人：司徒雷登、傅泾波、陈公博、周佛海、岑德广。司徒雷登说他在中国几十年，对中国有浓厚感情，不幸中日开战，他看出中国不是日军的对手。为求得和平，汪精卫应该与蒋介石合作。如果南京、重庆分裂，实非中国之福。他转达了重庆方面的要求：一、汪精卫不成立政府。二、日本撤军。三、共同反共。四、“满洲”不是重要障碍。

就在司徒雷登、傅泾波秘密去上海与汪精卫派洽谈之前，司徒雷登还派肖文安借聘请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博士到燕大担任教授为名，去东京活动，以阻止汪伪中央政府成立。

1939年7月，肖文安去了东京。他一到东京，就给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长子近卫文隆挂了电话，近卫文隆随即看望了他。近卫文隆当时担任着内阁总理大臣官房秘书。他们谈话很快转到逃出重庆去河内、发表卖身投靠宣言的汪精卫的情况。近卫文隆还问肖文安，在华北的吴佩孚是否将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并与合作？肖文安即把前不久代表司徒雷登与吴佩孚会晤的情形详细地告诉近卫文隆，说吴佩孚奚落汪精卫是妓女式的政客，谁给钱就嫁给谁，肯定不会跟他合作。近卫文隆听了很兴奋地说他父亲完全被岸秘书蒙骗了。肖文安马上问：可否让他拜见一下首相？把情况更详细地告诉他，免得……近卫文隆对当时中日问题的观点不可能与司徒雷登、肖文安等相同，但在汪精卫的问题上与他们有些接近。肖文安急想借此机会向近卫文磨讲一讲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以阻止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改变日本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作法（这是司徒雷登的重点意见）。没等近卫文隆回答，肖文安便先声明，他来东京的任务是礼聘鸟居博士，刚才所讲意见都是他个人的见解。见近卫文磨也是以个人名义把所看到的情况作反映。近卫文隆很快就在轻井泽一座日本风味的别墅安排肖文安和近卫文磨作了一次私

人会晤，对当时存在的中日问题及中日两民族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漫谈，交换了各自的看法。主要是：

1. 中日两国应当取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首先解决兵争问题。

2. 近卫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象的说法，势将战争时间无限延长而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还是采取与谁作战与谁谈判的方针实际。恢复与蒋介石政府为对手！

3. 蒋作宾大使的和平提案原则，既然为当时两国所同意，今天仍可作为和谈的基础。[注：蒋作宾的中日和平提携内容是：1. 东北问题中国暂时不提（实际是默认）。2. 中日关系在平等基础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唯与东北有关的除外。3. 中日经济提携以平等互利为原则。4. 经济提携基础之上，缔结军事协定。]

肖文安回到北平后，将这次东京的活动无遗漏地向司徒雷登作了汇报。司徒雷登找来傅泾波同肖文安三个人一起在他的书斋聚谈。司徒雷登让肖文安再作一次详细的汇报并加以分析，而后让肖文安协助傅泾波写成书面材料。司徒雷登带着材料偕傅泾波动身南去旅行——到重庆与蒋介石商谈求和条件。司徒雷登、傅泾波返回北平后，依旧和肖文安在临湖轩书房商量。司徒雷登让傅泾波把在重庆与蒋介石、孔祥熙、张群等讨论后所作出的与日和谈的具体条件记录给肖文安看，跟肖文安商量该用何种方法把这份材料送交近卫文磨，同时考虑到日本将利用这份材料作宣传，司徒雷登决定将这份材料译成英文，将原蒋介石的谈话改为司徒雷登与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谈话。其内容如下：

1. 重庆国民党政府完全用和平谈判方法解决中日间存在的问题。

2. 和平谈判开始后，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

3. 考虑到东北三省的复杂性质，可以暂不谈，其他经济合作、

文化交流、反共问题，仍以前驻日大使蒋作宾所提出的四条中第四条：经济提携基础之上，缔结军事协定。

1940年春，肖文安携带这份材料第二次去东京，仍通过近卫文隆将这份材料转交给近卫文麿。这次近卫文麿没有和肖文安见面，只是让近卫文隆转告：“待与有关方面研究后作出决定再答复。”

不久，肖文安返回北平，即向司徒雷登、傅泾波作了汇报。由于尚未得到日方答复，一时无法与重庆联系，司徒雷登、傅泾波便命肖文安在北平作一些日本人的工作，请他们协助和谈。肖文安遂拜访了日兴亚院北京分院的头头喜多诚一。喜多是主张中日问题不扩大化的。肖文安多次与喜多会晤，向他讲了中日和平谈判的途径，对他不主张扩大七七事变的方针表示敬意。此后，司徒雷登与喜多也见了面。司徒雷登把交给近卫文麿的那份材料交给喜多，请他协助促成！不久，喜多调任现役军职，回到东京，他临行前告诉肖文安：今后对和谈有关之事可与他的副手森藤中将联系。

1940年8月，为听取近卫文麿的答复，司徒雷登让肖文安第三次去东京。这时近卫文隆已服兵役，由首相府一名女秘书接待。这时，近卫文麿对和谈已显露出消极态度，仍没有会见肖文安，仅让女秘书转告，“尚无可答”。由于司徒雷登特别关心和谈，肖文安便去拜访喜多。喜多一身戎装，表示已入军界不涉及政治，介绍肖文安见了日兴亚院柳川和铃木政务官。铃木说他过去与蒋介石有交往，但回避中日和谈。铃木还说：“今日中日间的问题已经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现在问题的重点，在于整个亚洲和世界的问题上。”

肖文安没有办法，不得不无功而返。他回到北平后，惴惴不安地把近卫避而不见、喜多声称不涉及政治和铃木说的有些蹊跷的话一五一十地向司徒雷登作了汇报，司徒雷登听了不但没有批评肖文安，而且如获至宝般高兴和满意，大有表扬之态。肖文安顿时

领悟到：日本这时可能重新制定新的战略方针：“北进”还是“南进”？这样中国问题自然就成了次要。另一方面，美国可能已转变态度，准备干涉中国问题，这就打掉蒋介石求和降日的行动，一切行动完全附属于美国的战略需要了，司徒雷登当然也随之而改变态度，再也不提中日和谈之事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拉开帷幕。北平日本宪兵队马上占据了燕大校园。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从天津抓回北平，关押起来。若干教职员工也被捕。最使司徒雷登担心害怕的是那个存放在书斋中的绝密小皮箱，倘若被日本宪兵搜出，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个关键时刻，是肖文安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日本宪兵的眼皮底下，把小皮箱从书斋里取了出来，交给了傅泾波。

司徒雷登虽然被关起来，失掉自由，但他的秘密活动仍照常进行，因为他有精明能干忠诚于他也忠诚于美国的左右手。傅泾波通过大汉奸王克敏、王荫泰获得探监看望司徒雷登的机会，有时用隐语拜托这些汉奸转告司徒雷登一些事情。肖文安则与日本宪兵打得火热，陆续将被捕的燕大教授、学生尽可能弄出来。

假调解——真帮凶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了，司徒雷登也恢复了自由。形势的变化，使美国认为早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议案中提出的“让光明来临，把中国完全纳入西方势力体系之中，永为美国的附庸”的目标已能够实现了。但同时也意识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不可能唯命是从，因此需想方设法清除这一障碍。1945年12月2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对中国局势的声明：中国必须在现在国民党政府之下

建立统一而民主的政府，并广泛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府各部门，以停止内战。英美苏坚决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接着美国又决定派特使来华，打着进行调处的幌子，贯彻它独占中国的政策。具体设想是：

1. 对中国问题，希望以政治方式解决。

2. 希望国共第一步能合作，共产党参加政府，双方军队交军调部统一改编，并由美国装备训练，即军队国家化。

3. 第二步，实现宪法。政府人选，由人民从两党中选择，作出决定。

4. 认为国民党一切占优势，共产党参加政府后，军队国家化，中共成为少数党派，用政治方式解除其武装，融化中共于国民党政府之中，中国完全融入世界民主阵营中以阻止苏联赤化亚洲，逐步进行世界革命。

为贯彻这一所谓调解政策，美国先是派赫尔利为驻华大使，来华做调解工作，赫尔利失败后，杜鲁门不死心，即派五星将军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

1946年元月，马歇尔在北平主持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与此同时动用大量美国海军、空军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华北、东北和中原各地，美陆战队登陆支援抢占沿海城市和码头。经过半年多的活动，美国这套遮眼法终于被中国人揭穿。在黔驴技穷后，又不得不启用出生在中国杭州、在中国有广泛社会关系的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企图让他继续瞒天过海，融化中国人，全力以赴地帮助蒋介石平息“内乱”。

司徒雷登作梦也没有想到会提升他为大使。他欣喜若狂之余，认为自己在中国几十年，以高超的手腕推销民主自由主义已取得了特别是向西方倾斜的知识分子的广泛的赞誉和支持，再加上在中国官场内外罗织的秘密网络，可以超越前辈，为祖国作出巨大的

贡献。

1947年1月15日，美国政府正式通告，停止调解工作。马歇尔回国前问司徒雷登：“美国今后对中国应采取何种政策？”

司徒雷登回答说，只能采取三个方针，第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尤其以军事顾问的办法给予支援”；第二，“不采取任何有力的对付办法，一切听其发展，相机而行，作‘走着瞧’的打算”；第三，“完全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并告诉马歇尔，在这些方针中，他“完全赞同第一个方针”^①。司徒雷登力主援华打内仗，与马歇尔是一致的。马歇尔听司徒雷登讲完后说：“我原则上同意你的观点，但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马歇尔回国就任美国的国务卿后，立即采取了两个措施：首先是给司徒雷登发指示，要他阻止国民党政府成立联合政府，要他阻止中国共产党进入政府。其次是在没有征求中国政府意见、也不通知司徒雷登的情况下，即派魏德迈率顾问团来华，进一步策划战局。顾问团自东北到海南再到台湾考察后，向马歇尔汇报，提出将“满洲”和台湾分割出来，划归联合国托管（实际上将由美国独管）。马歇尔考虑到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中国、苏联，又恐怕如此分割引起中国人民的大规模反美，所以未敢采纳。魏德迈还建议以五年时间对蒋介石大力支援，军事上、经济上都由美国顾问团掌握施行。

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向南京正对面的长江北岸及东西两侧的渡口挺进，蒋介石即派四个军过江妄图堵截，结果当解放军进逼时，又撤了回来。司徒雷登看着他全力支持的、一直眷爱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灭亡，美国融化中国的政策随之成为泡影，内心十分凄凉。他认为“战争这样打下去是没有指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79页。

望的”，“但是投降又太丢人”^①。

司徒雷登不甘心失败，于是想出几个妄图挽救失败的招数。首先是让蒋介石下台，扶李宗仁上台，让他与中共搞和谈，创造一个新的南北朝，以长江为界，北归共产党，南归国民党，缓一口气，以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司徒雷登深知在一再吃败仗的情形下搞和谈不易，必须有点压力，于是亲自出马，提出由英、法、美、加拿大和苏联五国联合斡旋施压，敦促国共坐在一起谈和，但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婉言拒绝，不愿介入中国内政。不得已司徒雷登派傅泾波提醒代总统李宗仁火速照会西方列强，迅速派军舰来南京保护他们的侨民。司徒雷登认为大批外国军舰云集长江下游一带，起码可以延缓解放军渡江，如能够引发与列强军舰开火，就可转变战争性质。

在解放军渡江前夕，司徒雷登的这一招儿还真的引发了震惊全球的紫石英号事件。英国以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签订的《江宁条约》为依据，派紫石英号军舰由上海溯江而上，不顾解放军鸣炮警告，强行驶过北岸解放军某炮位，解放军向英舰开火，英舰还击，双方展开激烈炮战。英舰中弹 30 余发，忙悬挂白旗驶向南岸。接着，上游又驶来一艘英舰增援，同解放军展开炮战，该舰连中五弹，全速下驶，脱离火网，然后掉头偷沿北岸上驶，偷袭解放军，遭到解放军榴弹炮迎头痛击，又中数弹被迫下驶逃跑。英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中将立即乘坐旗舰伦敦号率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增援，驶过江阴，向解放军控制的江面前进，解放军沿江炮兵一齐向英舰还击。英舰频频中弹，伦敦号带着累累弹孔，处处伤痕溃逃上海。

司徒雷登作为这起事件的策划者，事后成了幸灾乐祸的旁观者，他心里感到十分侥幸，说：“本来是该我倒这个霉的。”^② 司徒雷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 209 页。

②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 228 页。

登宽慰之余，又狂吠解放军不人道，不救护负伤的英国水兵……

司徒雷登的几招，不仅未能达到阻止解放军渡江的目的，而且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但他仍不甘心，抓紧贯彻上头的“抢时间，埋‘炸弹’（安排他们所支持的地下反动武装力量）”的指示。首先让大汉奸德王（德穆楚克）回内蒙西部，组建伪蒙疆自治政府，以阻止乌兰夫的东蒙共产党军队西进。同时发动新疆阿尔泰地区头人乌斯满武装叛乱，防堵外蒙和阻止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司徒雷登命令美特务机关新闻处，拨给德王四部电台，派六名受过美国情报局严格训练的蒙族人去西蒙地区潜伏。同时命令美国驻乌鲁木齐的领事巴茂松和副领事马可南组织武装叛乱，阻止新疆和平解放。

司徒雷登在南京解放前夕，还命令特务机关新闻处，抢时间把他们所训练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百名中国特工人员，秘密派遣回到他们各自的地方潜伏；给最忠诚可靠的有相当地位和名望的亲信留下秘密电台备用。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总括地说：“不曾实现的梦想”确实成了“日益加剧的困惑”。他在美国政府示意下，鼓动所有大西洋联盟国家驻南京使节都留下来看个究竟。

司徒雷登不满意杜鲁门总统不采纳他的建议，大力援助蒋介石甚至派兵来华。当时适逢美国选举下届总统，与杜鲁门竞选的杜威则是一个支持派兵到中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人。为此，司徒雷登唆使蒋介石派得力人士去美活动，全力帮助杜威竞选，切盼杜威上台。然而现实却是杜鲁门获胜，继任总统。司徒雷登感到出乎意外，并失望地说：“美国的干涉是否可行，是否值得，就完全成为学术探讨性的问题了。”^①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14页。

可悲的下场，临终的叫嚣

1949年4月21日，南京解放。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4月24日星期天清晨，最后一批国民党政府官员正好刚刚乘飞机离开，他们（指解放军——编者）就进了城。”“第二天早晨刚过六点半，我从卧室的开门声中惊醒过来。只见几名武装士兵走了进来。我大声地呵斥他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退了回去……我跳下床，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那群大约十到十二名士兵走了回来，他们的发言人十分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好奇地四处瞧瞧，没有加害于人的意思……由于看出我不太友好，所以他就领着其他人出去了。”^①

司徒雷登对解放军的“光顾”，像发生了严重的事件似的，认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以此大作文章，以洋大人的傲慢态度亲自出马，到市军管会找主任刘伯承抗议，碰壁后又到市外事处、市公安局大嚷大叫，要求保护。

刘伯承下令，给他保护！解放军随即在司徒雷登住处周围增加了岗哨，凡出入的人，一律盘查登记。司徒雷登这才真正领教了中国共产党的厉害，认识到跟共产党耍赖是不行的。他深深感到这样一闹就把他与外界特别是秘密联系的渠道都堵死了。于是，他又接连请求解除岗哨。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国侨民相待。同时宣布保护守法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和人身安全。按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出一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33页。

切可疑的中外居民的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之前，原外国使节不得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国侨民，自当保护其安全。

南京外侨管理科，遵照上级指示将外侨活动区域限制在城内，并加强了对原驻华使馆的管理和警卫工作，既保护了守法侨民的安全又打击了帝国主义嚣张气焰。5月7日发生了一件涉外事件，原法国驻华使馆武官雷蒙酒醉后乘一辆雪佛兰小轿车在大街上超速疾驰，撞伤一名小学生，南京市交通管理科依法将雷蒙扣押起来，给他严厉警告处分，还勒令他负担小学生的全部医疗费用，而后取保释放。

司徒雷登知道这事件后，先是大怒，接着是发呆，他不曾想到南京解放刚刚几天，就变了样子，而他所在的南京上海路84号，两扇灰色铁门紧闭，门可罗雀。他感到自己被冷落。但这只是一刹那的失神，其专横心理立刻恢复，他马上找来傅泾波，让他再去外事处联系，他要以个人名义去北平。他自信如果去了北平，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晤谈，会有成果的。因为据他观察，毛泽东的脾气个性较似铁托，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后，不一定完全听斯大林的，所以中国共产党掌权也不一定可怕，事在人为，何况国务院已示意他尽可能地留下来，争取与共产党建立关系。

1949年6月28日，北平方面来了消息：同意他以个人身分去燕京大学，也可能与他希望会见的人晤谈。司徒雷登十分兴奋。他感到自己精通中国的人情世故，正如他所料，共产党搞建设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帮助。搞工业，要资金，要技术。司徒雷登想得太美了，竟像30年前奉调北京筹建燕大时一样，兴奋得彻夜未眠。他怀念西奥多·罗斯福的精神的文化的输出及融化中国人的深谋远虑。就为这个目标，他改变了厌恶来华的思想，要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终生。而今由于蒋介石的无能即将全盘输掉，美国百年来与中国“友好”的这条纽带，形将随之断裂，而且要断在他的手里，这太可怕

了！他庆幸美国国内已有认识，改变策略，授意让他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接触。他思考如何在共产党掌权后贯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

但司徒雷登的美梦，随着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而彻底破产。“谁丢失了中国”成为美国两派政客争论的焦点。在台上的杜鲁门、新国务卿艾奇逊为美国的利益要司徒雷登留在中国寻找机会，守住阵地，但顶不住另一些政客们围绕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问题的猛烈攻击。为进一步推卸责任，杜鲁门、艾奇逊以白皮书的形式，将美国百年来侵华政策的老底，公之于众。其中就有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期间（1946—1949）年的 212 份绝密电报。这些绝密电报是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秘密报告，里边涉及提供情报者的真实姓名及其他忠诚为美国服务的人名，公开这些东西，不仅彻底剥去了司徒雷登伪装的面纱，也完全改变了美国政府让司徒雷登留下来的决定，限期让他回国。白皮书的发表使司徒雷登感到万分惊异和忧虑，他说：“我越来越不安地想到：所有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我还接着问自己：对那些被提到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其观察、估计和建议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对美国的外交和领事官员将来的呈文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它（指白皮书——编者）不承认美国政策有什么错误，而将一切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它暗示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以及对该政府的生存所应尽的义务已经了结。”^①

然而，在“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支配下，美国在台上的政客把侵华政策失败的责任，推卸在了司徒雷登的头中，司徒雷登成了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 262、263 页。

众矢之的。司徒雷登回到华盛顿后，美国政府禁止他开口说话，不许他与人接触，命令他离开首都到指定的地方隐蔽。司徒雷登遭到这样的待遇，自然憋了一肚子的气。他抑郁在胸，不久便中风瘫痪，卧床不起。他患如此严重疾病，门庭冷落，政府把他一脚踢开不管，连他的亲生儿子，当时已是基督教的牧师也只是偶尔探望，自己又无力请人护理，幸而有他那个多年随身的秘书傅泾波，虽早已成为美国人，但仍有些中国传统的道德，将他瘫痪了的恩师接回自己家中护理，直至送终。

司徒雷登虽已身败名裂，以至瘫痪，但他头脑中消灭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始终没变，在他未写完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反共叫嚣：

“我也不承认中国(大陆中国)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

“我不相信这样一个政权会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我确信要不了多久，这个极其可恶的魔鬼就会走完它自己的道路……”^①

“‘共产主义’否认上帝的存在，不承认有灵魂，宣传一直是物质性的，一切行为须唯物，它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制度，是依靠武力或欺骗或两者兼而用之来维持的。它渴望统治全世界，是一个邪恶的魔鬼。它靠吞食别人而生存，永无厌足……这是应该绝对反对的，是必须反对的。”^②

“美国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行动；也不可能采取会削弱自由世界的行动。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将大大帮助共产主义世界，同时将大大损害自由世界。这就会使共产党人在巩固其在华地位的道路上去掉一个最大的障碍，这将毁灭中国国民政府，从而取消了它对共产党的抵抗……对共产主义事业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前言，第2页。

②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92--293页。

有利的行动无不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我诚恳地希望美国基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为自身及全人类的福利,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人民政府’,继续反对在联合国中让那个政府占据中国的席位,坚决反对一切旨在加强那个政府的行动,坚决支持和援助一切旨在防止那个政府及共产党集团得到巩固和发展所开展的运动以及所作的努力。”^①

司徒雷登在中国毕竟待了几十年,平素极善伪装,勤于交际拉拢,精于表现友好并培植亲信和建点设网,故在中国建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当这些友好特别是一些倾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得知他回国后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尤其是中风瘫痪的不幸消息后,发表了许多对他抱不平、惋惜、同情的言论。燕大友好们痛心地说:“他该离开燕大! 70 高龄还去作官!”有的惋惜地说:“根本不懂政治,去搞政治能不失败?!”也有抱幻想的说:“南京解放后已联系好以私人身分到北平,那个计划如果实现了的话,中美关系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吧!”

至今已半个世纪过去了,但还有个别人写文章为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歇斯底里的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恶毒的反共叫嚣辩解。这充分说明,美国对华文化侵略,从意识形态上对中国人的影响残余还未完全消除干净,我们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 298-299 页。

1924—1929 年的苏中外交关系

〔俄〕 П·И·彼斯科娃 著 李 颖 译

译者按：本文作者 П. И. 彼斯科娃是俄罗斯外交部历史文献司科研部研究员。本文是她利用大量俄罗斯外交部第一手历史档案材料写成的一篇有关 20 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文章。由于处于各自的立场，她的叙事方式和看待问题的角度，与我们有所不同。而且，一些史实和观点还有待考证和推敲。但是，为了尊重原意，在翻译过程中，基本忠实于原文，未做大的改动，部分内容略有删节。

20 年代中期，中国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各国与北京中央政府保持着官方关系。当时苏联的对华政策是，促使中国革命的发展，全力帮助孙中山政府。同时，苏联不得不考虑到中国各军事政治力量的现实情况，以及它们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对各个政治集团进行了积极的工作。

苏联对孙中山政府的支持

苏联代表们与孙中山定期就中国国内的局势和爱国力量的任务交换意见。1924 年 7 月 11 日，加拉罕在给孙中山的信中惋惜地说：“国民党要成为人民革命的司令部，做得还太少。如果组织工作不伴随着广泛的政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有系统地同时进行，提高

党在全国的威信,那么,组织工作就会毫无结果。”^① 1921年9月12日,孙中山在回信中写道,同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公开斗争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这场斗争中,我非常寄希望于贵国。贵国的友谊和帮助将有助于我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强大的魔爪下解放出来,恢复我们政治和经济的独立”^②。

应孙中山政府的邀请,苏联派出许多顾问和军事专家来到中国,并及时向孙中山政府提供武器,使其平息了1921年10月发生在广东的反革命叛乱。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开展了广泛的声援中国革命的运动,掀起宣传高潮,抗议西方国家和日本支持中国的反革命。为了加强舆论攻势,1924年9月12日,契切林在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B·M·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议,向苏联人民通报中国国内镇压革命运动的情况,并在报界详细报道中国国内发生的事件。契切林还特别强调党组织工作的重要性,他在信中写道:“目前有许多混淆视听的传闻。应当在党组织内加强宣传对外政策的活动,要在党组织内作报告,力求使每个党员了解中国问题。”^③ 苏联领导人的行动在中国南方得到了良好的回应。1924年10月,孙中山说:“我们知道,对不公正的事情,苏维埃从来不会坐视不管。如果苏联支持我们,就意味着真理在我们一边。而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正义必定战胜邪恶。”^④

1924年11月,由于害怕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国家的分裂,北京政府首脑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参加改组政府的会议。1925年1月13日,契切林致信加拉罕,对孙中山的北京之行表示担忧:“我十分怀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3,卷宗25,第283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3,卷宗25,第283-293页。

③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8,案宗112,卷宗9,第31-35页。

④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4,卷宗1,第210页。

疑孙中山的北方之行。他脱离了基地。会不会出现这种结果：他将失去基础。而没有他，广东基地也将难以支撑。会不会是某些共产党人在蓄意挑拨，想把孙中山从政治舞台上赶下去？”^①但孙中山来到北京后便断定，在民主的初始阶段，军阀不可能真正盼望国家的统一，因此他拒绝参加会议。1925年2月15日，加拉罕报告：“由将军和官员们组成的改组会议是想给段政权创造基础，并不是为奇，它几乎可以被看作是段的私事。”

不久，孙中山在北京病重。1925年2月1日，加拉罕向契切林报告：“孙生命垂危……现在我们只是尽力设法让他立下政治遗嘱。这一点在中国很重要。由孙中山确定的可靠人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名单已经列出，这个委员会将是党的领导核心。经孙中山签字后，这些优秀的国民党党员将主持工作，然后，在4个月内召开党代会。如果孙中山去世，我们应当就此做出引人注目的反应：1. 可否暂停工作一段时间；2. 组织纪念孙中山、推进国民会议运动的集会；3. 向国民党和孙中山家属发出唁电。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人是最近才开始接近我们的。也许，这表明，我们要像从前一样影响国民党的事务，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②

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在苏联引起很大反响。对他的逝世，苏联政府、党和社会组织表示深切哀悼，举国上下开展了宣传国民党政治目标和孙中山在中国民族运动中作用的活动。莫斯科专门成立了以孙中山命名的劳动大学。加拉罕提出的关于必须加强在中国工作的建议，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完全支持。1925年3月16日，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在信中指出：“我们认为，现在是加强我们在中国影响的特别有利的时机，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放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 3100，目录 9，案宗 111，卷宗 1，第 2 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 3100，目录 9，案宗 111，卷宗 1，第 25—26 页。

过这一时机。”^①

苏联在冯玉祥和张作霖两个军阀集团关系中的立场

1925年3月22日,加拉罕向契切林报告北京局势时写道,段祺瑞为巩固其地位而召开的善后会议毫无结果,“为了支撑衰败的政权,段正在千方百计地搞一个由各省代表组成的新政府”。但是,北京的政权问题非常复杂,不会因为段祺瑞的“宪法幻想”而得到巩固。段祺瑞仍然是各种争斗势力特别是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施力点。最近,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关系极度恶化。段祺瑞周围的人是一群骗子,他的办公室就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其中包括他的首席秘书,也是一名重要的掌握大权的人物。所有这群人,不顾段祺瑞的困境,拼命抢占肥缺,搜刮国库,尽力不让别人接近这些肥缺和钱财,与张作霖产生矛盾的主要根源便在于此。张作霖推举的候选人没有一个被安排位置。对北京政府感到失望的张作霖已着手准备将段祺瑞赶下台,建立只服从于他的政府。张作霖最初的设想是:拿掉段祺瑞,让前总统黎元洪取而代之,组建以张作霖原内阁总理为首的新内阁。加拉罕写道:“非常有趣的是,安排黎元洪的原因是,他的总统任期还没有结束。您当然还记得,黎元洪在1923年曾任总统,后来被冯玉祥赶到了天津,给曹锟的上台扫清道路。而且,黎元洪并不是国家的临时首脑,而是依法选出的总统,让黎元洪登上王位,可以为与列强的关系带来某些方便。黎元洪没有任何党羽,没有政党,没有军队,如果他当上总统,也就是做做皇帝而已,而一切实际事务仍将由张作霖把持。”加拉罕继续写道:“但是,段祺瑞及时进行宣传,向张作霖派出特别代表。后来,双方妥协,段的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4,卷宗1,第195页。

首席秘书、军事部长等要职被忠于张作霖的人取而代之。现在，张作霖正在等待时机，准备应付将来与冯玉祥的冲突。张与冯将要发生冲突，对此大家都深信不疑。因为正是冯玉祥的出现，使张作霖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冯玉祥也明白这一点。现在的问题在于，双方都在等待冲突的时机。换言之，当某一方认为准备就绪，将立即诉诸武力。目前，无论是张作霖还是冯玉祥，都不想马上发生冲突，因此双方尽量保持对话，互派代表团，互致书信甚至礼物，建立虚假的友好关系。”^①

孙中山去世后，苏联政府对冯玉祥集团寄予了厚望。加拉罕分析：“最近的力量对比已变得有利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和国民党。我正在把这四方人员联合成反张作霖的力量，使他们保持公开关系，形成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最担心的是，国民军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与张作霖爆发冲突。因此，胡景翼和冯玉祥正在着手准备组织自己的军队，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现在，我们与保持着经常的联系。”^②

当时苏联十分重视开办军事学校，为中国革命军培养干部。加拉罕在给契切林的信中指出：“已通过的关于军事学校的决定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是，问题在于，张作霖会不会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军校培养出哪怕是第一期毕业生。当然，在开办军校和训练军队的初期，胡景翼和冯玉祥会遇到麻烦。许多新的陌生人将聚集在一起，即使冯玉祥和胡景翼支持双方人员的融洽相处，这种融洽也不会进行得很快，不会没有一点摩擦。因为，目前的指挥人员和将军，或因保守，或因怀疑，或因害怕，或因担心失去位置，都会在暗中抵制这种相互融洽。”^③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 0100，目录 9，案宗 111，卷宗 1，第 235—240 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 0100，目录 9，案宗 114，卷宗 1，第 235—240 页。

③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 0100，目录 9，案宗 114，卷宗 1，第 235—240 页。

1925年5月8日,加拉罕向契切林报告,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冲突已不可避免。他认为,这种局势下,段祺瑞可能会扮演正面角色。“张作霖对冯玉祥的一贯压制,在一系列省份影响的扩大,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张逐渐巩固了最重要的战略和政治制高点,使他在与冯的角逐中占得上风。在这个准备和平的时期,如果不对段祺瑞进行有效的抵制,那么,围攻、削弱冯玉祥的趋势会继续发展下去。并且,对于段祺瑞来说,无限制地削弱冯玉祥,无异于自我毁灭。”^①

苏联专家对冯玉祥开展了耐心持久的工作,并取得了效果。当苏联为冯玉祥向张家口运送第一批武器时,英国报纸对其大肆渲染,但冯玉祥表现得十分平静。加拉罕说,“这种平静使人感到,他已坚决把自己的命运和我们联在了一起,破釜沉舟也在所不惜。”加拉罕继续写到:开始,当冯玉祥同意派遣教官时,他请求一切要做得有备无患。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建议,让教官们住在苏联领事馆里,“现在这已不成问题了,我们的教官就住在冯军营中心、紧靠冯的住所。起初,冯把所有的教官都安排在张家口,置于他的监督之下。而现在,他已要求他们分散到各师,就地参加工作。每天的大事小情都证明,他与我们越来越接近。如果可以用我们的术语来形容的话,可称冯为完全的‘左派’”。

与孙中山短暂合作的经验,非常有利于苏方开展同中国有亲苏倾向的力量的工作。加拉罕向莫斯科报告说:“在冯部的工作条件要比在广东容易得多。因为广东各外省军队的关系错综复杂,又缺乏统一的领导。孙中山只是个有名无实的领导,各派军队都各行其事。因此在广东很容易建立起了黄埔军校,并同时创建了样板部队,还成功地整顿了广东军队……但是,对于其他杂牌部队,我们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400,目录9,案宗114,卷宗1,第245-246页。

大都不能对他们有所影响和控制。张家口的情况就不一样。这里有真正的主人——冯玉祥，整个军队都归他领导，他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他的师长和高级指挥人员都是一些较年轻的人，他们对冯玉祥的忠诚不是出于畏惧，而是出于忠心。冯玉祥在他们中间享有崇高威望。指挥人员中没有为了个人私利而自作主张的人，更没人企图背叛冯玉祥。至少，目前是这种状况。这将形成十分有利的局面，我们同冯达成的一切共识都可以付诸实施。”

加拉罕在报告中还说明，苏联专家应当如何处理中国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他写道：“除了把熟悉部队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前提外，最迫切的任务是创办军校，组建骑兵，建设装甲火车。关于政治工作，我们的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应作为顾问，作为富于首创精神的、积极工作的、起到促进和引导作用的人上，补充到国民党人员中。看来，这项工作很有可能取得成功。和各地一样，困难在于缺少领导者和普通工作人员。”

加拉罕在描述冯玉祥的积极立场时指出：“冯邀请我们的同志、中央委员李大钊来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此外，我请求中央再动员 20—30 名同志放下其他工作，专门为冯玉祥军队工作。最近几天已有 10 人到来，中共中央答应再派人来。尽管这样，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是不足。政治工作领导中心将设在北京。此外，为培训政治工作者，在北京开办了有几百名学员的短期培训班。我们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公开组织样板俱乐部，开展文化教育和政治工作。鲍罗廷的任务是向冯灌输，政治工作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必不可少的。冯在与鲍进行三次长谈后完全明白了这一点，他本人也开始召集高级指挥人员，向他们解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每一个士兵都应该明白，他在为什么而战。他不是为我，而是为国家和人民而战。如果我反对人民，你们可以立即枪毙我。’这使人感到，他已明白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我想，这将

对我们很有好处。”^[1]

冯玉祥的军队被改造成了能够随时反击外国干涉的军队。加拉罕指出：“5月7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屈辱日，冯军是唯一下令纪念这一天的军队。他们举行会议，纷纷发言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事非同小可，它说明冯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任务困难，人手紧张，翻译缺乏，力量不足，但我们将竭尽全力。”

在描绘冯玉祥的政治形象时，加拉罕指出：“最近，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极左倾向。也许，对此要加以限制。我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他想向我们证明自己的左倾，或者，这真的是他极端复杂思想的结果。这种复杂思想是由基督意识、民粹主义情绪、对外国人的仇视，以及我们的影响形成的。”加拉罕继续指出：“毫无疑问，孙中山去世后，冯玉祥幻想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袖，甚至取代孙中山……我们支持他的这种幻想，因为这可以促使他做许多事情。”

加拉罕认为，冯玉祥对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颇有好感，虽然形式上他还不是国民党员。“当别人问起他有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诚恳地说，他是国民党员，只是形式上还不打算这样做。一周前，他向当地的国民党组织宣布，他想加入国民党，但他要求保守秘密，因为事先宣扬出去于事不利。当地的国民党组织决定吸收他入党，但没有公布此事，甚至连记录也没有。”

加拉罕在归纳上述情况时，得出结论：“可以同冯玉祥合作。事实证明，我们对他的初步看法是对的。主要威胁在于，张作霖可能会在他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打败他。我们应当尽力帮助冯玉祥延长休战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做许多事，给他实际的援助。如果张作霖战胜冯玉祥，其损失要比我们

[1]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 0100，目录 9，案卷 114，卷宗 1，第 250—253 页。

用于阻止张取胜的物质损失大得多。我想,与其将来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如现在就做出牺牲。”^①

在给契切林的通信中,加拉罕坚持自己的判断,说冯玉祥的军队需要苏联方面刻不容缓的军事援助。他写道:“我急切地盼望您的回电和中国委员会对是否给冯军提供帮助的决定。我未得到确切的回答,只有得到确切的回答,我们才能全力以赴调派卡车,因为那样超长距离和超大难度的运输,每一天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加拉罕继续写道:“冯玉祥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他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实力。必须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错误,至今冯还不知道我们援助的规模。我只好含糊其词。我们唯一能告诉他的,只有六千支步枪和六百万发子弹,但这点支援简直微不足道。冯对张的抵抗程度完全取决于我们提供援助的大小,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他会被迫做出许多重大让步。这将不仅破坏他的政治地位,而且将破坏他的战略地位。如果我们对待冯的态度是严肃的,我们就应当有始有终,不要半途而废。我们的援助不能是名义上的,必须是真实的,必须能够产生真正的结果,也就是说,要加强冯的军队,使之有能力抵抗张作霖。在这里,我要事先说明,指望冯为武器支付费用是绝对不应该的。如果不能无偿供应,那么可以采取无期贷款的形式。此外,运输问题也十分突出,我们应该准备做必要的牺牲,帮助他支付运输费用。我们已经卷入了‘游戏’,因此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在冯的命运已经同我们的威望,同我们在中国的影响联在了一起。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不应当逃避,我们无所畏惧。”^②

对于军事援助冯玉祥一事,莫斯科希望保守秘密,但没有成

1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 0100,目录 9,案宗 114,卷宗 1,第 251—255 页。

2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 0100,目录 9,案宗 114,卷宗 1,第 257—260 页。

功,全世界都知道了此事。1925年5月29日,加拉罕在给契切林的信中强调:“我们与冯玉祥的关系已不可能再是秘密。虽然莫斯科在一份电报中指示,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公开。但我想,这仍然缺乏对具体情况的正确判断。我们教官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沿2000(俄)里长的公开运输线上运送货物也是不争的事实。张家口有我们的人,也有不少张作霖的间谍和外国间谍,这些都是事实。日本、法国、英国都支持张作霖对冯玉祥施加压力,因为他们认为,冯玉祥是带有明显排外情绪的新兴民族力量。”^①

苏联在中国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建议帮助冯玉祥制定战略计划。加拉罕报告说:“冯的策略十分灵活机动,即最大限度地退却,以避免立即发生冲突。这个策略是正确的。我们的军事人员认为,北京近郊的战斗,对冯来讲,看似失利,但是,当冯离开北京、进驻张家口后,他处于良好的战略地位,从而使他能够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坚持更长的时间。因此,当他询问我的意见时,我对他说,我认为放弃北京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不能再做退让,必须固守张家口和内蒙古的两个区。”^②

谈到与张作霖的关系时,加拉罕说:“看来,我们与张的关系将恶化。既然我们支持国民党和冯玉祥,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违反了中东铁路的有关协定,而是出于张对我们刻骨铭心的仇恨,因为我们阻碍了他成为中国和北京的主宰。”加拉罕指出了张作霖在中国掌权的现实可能性和其危险的后果,他认为,早在吴佩孚直隶政府时期,张作霖的计划仅仅限于巩固他在满洲的地位。加拉罕说:“现在,当他取得胜利,占领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和北京部分地区后,就竭力完全控制这些地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4,卷宗1,第257页;目录10,案宗123,卷宗2,第103—104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4,卷宗1,第257页。

区。因此，毋庸置疑，张的野心已超出了满洲的范围。现在，他正在进行统治全国的斗争，并且已部分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同冯玉祥和国民党进行斗争，不是他们威胁了满洲这个他的世袭领地，而是因为他们不让他顺利在全国进行扩张。”^①

在强调张作霖在全国范围内的作用时，加拉罕提出了苏联政策目前和将来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取得张作霖的完全信任，使其相信，我们对满洲的政策不妨碍他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势力。我认为，我们不能建立这样的信任，否则，我们将失去同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军的联系。有人会问，国民军在全国范围和北京的胜利，能否保证铲除满洲的张作霖。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目前很难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但可以说，如果国民军取得这样的胜利，即使没有在满洲消灭张作霖，也会杀杀他现在的锐气。换句话说，张作霖将被限制成为一个副省长，一个满洲的小皇帝。并且，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他将规矩一些。我个人认为，冯玉祥在北京的胜利，不会马上导致张作霖在满洲的失败，因为这里还有日本人。众所周知，正是日本人在1922年阻止了吴佩孚消灭张作霖。但是，国民军在北京的胜利将只是第一阶段，接下来，从军事观点来说，完全有可能的是，用不着我们在北面牵制，张作霖就会在满洲跨台。我想，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只要北京有一个对我们友好的政府，即使有张作霖的存在，满洲局势就会朝有利的方向发展。”^②

但是，在对待张作霖的战术上，还不周密，缺乏逻辑性和急于求成。加拉罕在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央在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时，总是不灵活，反应迟缓并屡犯错误，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4，卷宗1，第261—262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4，卷宗1，第121—123页、136页、158页；目录8，案宗112，卷宗9，第85页。

这给苏联政策在中国的实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加拉罕认为：“不能让张作霖觉察我们在敌视他，为此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向他提供武器、在奉天（沈阳）设立代办处、在中东铁路向他贷款等。如果我们不失时机地这样做，将会取得预期效果。我认为，由于莫斯科坚持反对派驻代表，我们失去了机会。在武器问题上，张作霖产生了这种印象，即我们在愚弄他，不想向他提供武器，而向冯玉祥提供武器。在一次会面中，他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武器已足够了，不再需要武器。如果他相信我们会给他武器，他绝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我想说，如果接受了我所有的建议，我们就不会与张作霖发生冲突。”^①加拉罕继续写道：“我不是说，如果我的那些建议被采纳，我们就不会同张作霖发生冲突了。当然不是。前面我已经说了，冲突和关系紧张有着深层次的、严重的根源。但是，冲突可以是比较猛烈的和经常的，可以是非常尖锐的，又可以是比较轻微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备必要的条件。”^②

1925年5月27日，苏联外交代办处在—项政治通报中分析张作霖对苏的态度时，指出，随着张作霖与冯玉祥冲突的加深，张作霖对苏联采取了公开敌视的方式。“小反击的方针已被公开的斗争方针所取代。”代办处认为，张作霖采取这种立场的基本原因是：“冯玉祥接近并与苏联保持着新的关系。寻找中国革命运动的支持者，包括国民党左派，冯玉祥不能不同时与所有革命力量接近，不能不把苏联当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和盟友。冯玉祥对苏俄的这种友好态度，不可能不引发反动报纸，特别是外国报纸的新闻宣传，他们试图歪曲苏联和冯玉祥的关系。这些报纸报道，苏联给冯玉祥提供了大量武器，几十万支步枪，几万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1，卷宗1，第121—123页，126页，158页；目录8，案宗112，卷宗9，第85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4，卷宗1，第265页。

挺机关枪,几百门火炮,等等。显然,这些传闻对张作霖起了作用。于是,他企图采取恶化对苏关系的方式,对苏俄施加压力,破坏苏联与冯玉祥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加深并巩固在北满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在铁路建设,即夺取交通命脉的斗争中。同时,满洲政府不断服从这种影响,使日本把满洲政府当作反对苏联、破坏中国经济的代理人。有证据表明,中东铁路中国代表已与南满铁路日本代表举行谈判,加强两条铁路的联系,试图以这种方式加强日本对中东铁路的渗透和影响,把中东铁路变成日本在满洲铁路网的附属。由于资金严重短缺,张作霖可能四处求援,如向政府施加压力,或直接向帝国主义列强寻求新贷款,以获取资金。因此,张作霖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不仅有中国内部的原因,同时也是整个国际环境和帝国主义列强对苏关系的反映。”^①

1925—1926年的苏中会议

1925年8月26日,根据1924年5月31日签署的协定,苏中会议在北京召开。代表苏联出席会议的是全权代表加拉罕,中华民国方面是外交部长王正廷。会议设立四个分会:签署领事和商务条约的分会、法律分会、勘定边界分会和讨论各种争议的分会。这些分会一直工作到1926年4月。

第一个分会就领事条约的条款基本达成了一致。但苏方提出的有关领事有权兼任苏联外贸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领事馆工作人员必需的数量、派遣外交信使等问题的建议没有达成协议。这些建议被提交给会议的全权代表做最后的决断。

在初步交换意见过程中,讨论了中方提出的商务条约草案。但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7,卷宗22,第24—26页。

是苏方没有接受这个条约草案,因为该草案没有考虑到苏联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即国家专营外贸和通过外贸机关发放许可证的制度。中国代表也回绝了苏联于1925年底提出的条约草案。

法律分会通过了引渡罪犯公约和民事诉讼条约。达成一致的还有遗产公约。

勘定边界分会一共举行了三次会议。中方坚持废除十月革命前苏方同中国签署的各项条约,要求重新勘定边界,归还他们认为是非法划归俄国的领土。而苏方的立场是,俄国与中国签署的边界划分条约不无法律根据,也没有违反国家主权原则,因此不能由苏联来废除。苏方认为,分会的主要工作应当是确定现有的边界,而且只能是在划界出现错误,以及条约规定的边界遭到破坏或发生边境事件时实施工作。

在讨论各种争议分会会议上,中方向苏联提出了数额为4000万卢布黄金的诉讼,主要目的是要求赔偿由于俄国革命和卢布贬值给中国商人造成的物质损失。^①

另外两个分会:中东铁路分会和航海分会,没有举行会议。北京的各次会议是在十分良好的条件下举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25年冯玉祥军队进入北京。毫无疑问,他对中央政府对苏关系政策方面起到了遏制作用。

后来发生的事件,其中包括冯玉祥撤出北京,影响了中苏会议工作的完成。军事上的混乱状态,动荡的国内政局,中央政府的缺席,中国代表的回避,资金的缺少——所有这些导致中苏会议于1926年3月闭会。苏方一位代表尼科利斯基在评价会议成果时指出:“虽然各分会做了大量工作,起草并签署了大量文件,这些文件成为会议进一步工作的基础。但是,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充分利用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9,案宗117,卷宗22,第1—41页。

政治上的有利时期,因此中苏会议的工作没有取得圆满的结果。”^①

1926年苏中关系中的满洲和中东铁路

1926年,北方军事政治集团发生了力量分化。由于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胜利和政权的巩固,满洲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区域。1926年2月5日,契切林在给加拉罕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问题:对满洲独立应采取的路线……困难在于,承认新的满洲政府将在中国的民族运动中遭到反对。根据协定,中东铁路委员会应当是苏中委员会,而张作霖希望成立苏满委员会。我们加入这样的委员会,就意味着承认满洲国的独立,这必将遭到全中国的强烈反对。事实上,承认满洲独立是会得罪人的,我们将永远落入完全被人误解的境地。此外,满洲独立的事实也会使人想到,由于担心失去在南满的控制,日本将以某种方式影响北满局势……日本规划建设齐齐哈尔—察哈阳铁路就是个例证。该铁路贯穿北满,使北满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并且完全压垮中东铁路。我们的处境将非常困难和微妙。”^②

两周后,1926年2月19日,契切林在给加拉罕的信中又提到了满洲问题:“原以为满洲会宣布独立,而现在只能谈得上自治,并且还具有临时的性质。离心力比许多人预料的要小得多。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现在,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下,可以建立同张作霖的关系。我们应当同张签署纯技术性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意同他签署诸如商务条约的协议,也不意味着他不会失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6100,目录9,案宗117,卷宗22,第32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6100,目录10,案宗123,卷宗1,第37—38页。

掉中央政府的特权。”^①

1926年3月18日,契切林在给加拉罕的信中强调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失误:“假如奉天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我们或者因威胁未起作用而完全损害了自己的声誉,或者落入难以自拔的险境,并且会破坏我们所有的东方政策。目前,我们的敌人清楚地知道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正在准备新的挑衅……”“我们在东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历史本质和我们事实上的帝国主义方式之间的矛盾性。沙皇时期的政策内部上是统一的,而现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必须承认,我们的政策完全缺乏内部的统一。一方面,我们声明要团结被压迫人民,而另一方面,却奉行沙皇暴君们的路线……如果我们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向全中国人民实行的是帝国主义行动的恐吓方式,对他们实行压迫政策,轻视他们,我们的中国政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将中东铁路用于政治目的是十分有害的。”契切林主张彻底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他写道:“立即彻底改变整个路线的时机已经到来。今后,中东铁路的全体行政管理人员要坚决执行苏联的方针,停止将中东铁路用于政治目的,恢复中东铁路的纯商业企业的性质,并使之隶属于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最后,契切林向加拉罕建议“采取这样一种路线,即团结中国人民,停止歧视压迫中国人民的路线。应该采取完全相反的方针。不应该在广东和北京采取同一个政策,而在哈尔滨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②

1926年5月4日,契切林在给加拉罕的信中再次分析了苏联对华政策的效果,指出政策强弱的两个方面:“当中东铁路转到我们手中后,我们为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进行了斗争。关于这一点,已达到了一半,应当继续利用现有成果。中国内政发生了变化,我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10,案宗123,卷宗1,第57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10,案宗123,卷宗1,第71—77页。

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最初的方针是个时代错误,它十分有害,影响了我们的总方针,使我们误入十分难堪的冲突。我们的工作仍抱旧观点看待东方问题,认为与东方人打交道必须使用恐吓,决不能向他们让步,必须向他们显示自己的优越,必须始终使他们感到恐怖和烦恼。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在东方采取的方式,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东方政策是背道而驰的。所幸的是,我们的领导人已经着手彻底纠正这个时代错误。”¹

1926年6月7日,契切林在给加拉罕的信中谈到最高领导层对中国的看法时,指出,莫斯科准备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因为“许多人担心冒险的行动或攻势政策会增加我们的困难,引起新的麻烦。”

1926—1928年国民党的分裂和苏联同 蒋介石政府关系的恶化

1926年春,中国南方出现不稳定的局势。国民党右派加紧分裂国民党的活动,苏联领导人试图制止事态的发展。1926年1月1日,契切林在给加拉罕的信中要求“向日本施加外交压力,削弱其在满洲的势力,全力援助国民军。”他写道:“必须尽快指示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在系统地暗中替换国民党,通过国民党发布口号,用共产党人占据国民党的领导职位,排斥国民党左派……如果国民党发生分裂,那将给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国民党右派将成为那些中间派的中心和帝国主义的幌子。无论如何要制止国民党的分裂。”契切林还指明了国

¹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10,案宗123,卷宗1,第91—94页。

民党与张作霖的斗争,他写道:“国民党代表大会应当打出统一全党的口号,打出为国民会议运动、为依靠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有生力量,包括直隶部队的临时政府而同张作霖斗争的口号。如果无法制止分裂,那么至少要把分裂变成一种清沉,使中国只有一个国民党。为保障对民族解放运动有效领导,必须建立在国民党代表主持下的行动委员会,成员按平均分配的原则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会和农民联盟的代表。”^①

1927年初,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关于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问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昌右派集团同武汉左派集团争论的焦点。北伐军顺利北上,以及攻陷上海,大大巩固了与左派公开斗争的蒋介石的地位。苏联代办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整个危机都被蒋介石所操纵……他的所作所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事态的进一步发展”^②。

四一二政变后,4月18日,蒋介石在英美的支持下,在南京组成了国民党右派政府,宣布反对共产党。7月6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发表正式声明,称反共运动不是反苏运动,因此南京政府准备同苏联恢复友好关系。但是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南京政府断定苏联机构和人员援助了共产党,终究成为他们掀起新的反苏浪潮的借口。

这个时期,苏联同中国南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仍不稳定。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活动的加剧,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更加仇视。苏联领事的工作十分艰难,通信中断,同莫斯科的联系实际上已经中断。1927年10月22日,长沙发生了袭击苏联领事馆的事件,领事馆被搜查、查封,领事秘书被捕并被押往汉口。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10,案宗123,卷宗1,第1—2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11,案宗116,卷宗128,第21—27页;目录10,案宗133,卷宗111,第26—27页。

与此同时，中国军阀以各种借口扣留苏联在中国各港口的船只。1927年12月9日，一艘苏联租用的中国船只由于没有悬挂国民党旗在青岛被扣留。12月13日，“辛菲罗波尔”号船被指控发现有中共出版的宣传品而被袭击，虽然一周后两艘船只被释放，但12月22日，前一艘船又在吴淞口被扣留。苏联商船队代办奥尔洛夫斯基被捕。根据这种情况，苏联政府决定暂停苏联船只在中国水域的航行。

12月11日，广东发生了人民起义，被残酷镇压。12月13日，苏联设在广州的领事馆在当地政府纵容下被捣毁，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被捕并遭到残酷的审讯。以副领事哈西斯为首的五人被枪决。G. A. 波赫瓦林斯基总领事的命运也十分危险。直到12月31日，他和他的家人，以及被捕人员的部分家属才被释放。

12月14日，上海报纸刊登了蒋介石接见中国记者的谈话。他说：“现在，我们应坚定地确定我们的对外方针。目前苏俄领事馆已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我的观点是：在国民革命取得成功之前，必须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只是待我们的事业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可再恢复与他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以前支持与苏联结盟，但是，现在我们是这个联盟的敌人。我认为，我们不仅要与苏联决裂，而且要联合其他强国，共同对付共产党……广东事变只是一个开始……全社会各阶层应当为消除共产主义团结在一起。”^①

1927年12月，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苏联驻广东、上海、汉口（武汉）的领事馆和其他苏联机构被关闭，财产被没收，一些被指控参与共产党宣传的工作人员被逮捕。驻北京代办处的全体外交人员，早在1927年4月遭袭击后即被召回国内，虽然两国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其他数十个苏联领事馆的命运也岌岌可危，只有新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11，案宗117，卷宗136，第16页

疆没有理睬南京的命令，因此苏联继续在乌鲁木齐、喀什、伊宁、承化、塔城进行领事活动。与此同时，中国领事馆仍像从前一样，在苏联各地开展工作。

苏联政府声明，苏方不接受南京政府的指责，强调苏联各领事馆是根据1924年与北京政府签订的协定开展工作的，苏联断然否决了国民党政府有关苏联领事馆和商务代办处被用作“进行红色宣传和共产党人的庇护所”的指责。1927年12月23日，苏联报纸刊登了契切林就中国事件的一份声明。声明中说，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中国反动军阀，企图把中国的国民革命描绘成苏联政策的结果。契切林对中国反革命的暴徒表示抗议，重申苏联政府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力。

1928年4月，蒋介石进行的北伐得到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支持，6月5日阎锡山的部队占领了北京，此后，中央政府已不复存在。10月10日，南京政府宣布自己为国民政府，南京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美国第一个承认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其他国家也相继效仿。但是苏联不承认蒋介石，不认为他的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

此后再未出现改善苏中关系的现实条件。

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和权利受到威胁

与此同时，中东铁路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1928年6月，在政治游戏中，一直指望张作霖的日本人断定，他们的傀儡已失去作用，决定将他清除掉。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张学良成为满洲新“主人”，他比他的父亲还要敌视苏联，完全与蒋介石的反苏政策遥相呼应。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承认南京政府。

后来的局势瞬息万变。1928年12月22日，警察占领了中东

铁路在哈尔滨的电话局。当地政府在声明中声称,此行动是合法的。苏方提出一系列提议,宣布:为了铁路的需要,中东铁路装备并使用通信设备的权利符合1896年合同的各项条款以及1924年北京奉天协定。此外,中东铁路管理局使用电话的权利,也得到过东北各省当局在1927年6月20日签订的一份专门协定的肯定。

1928年12月31日,加拉罕向苏共中央书记И. В. 斯大林报告中国的最新事件:“12月29日,全满洲升起了国民党旗,奉天正式宣布隶属国民政府。有理由认为,侵占电话局事件不是偶然的。”加拉罕认为,苏中关系的紧张,主要原因是日本人的介入。日本可能在策划苏中发生冲突,使中国人敌视苏联,掀起“反对红色帝国主义浪潮”,以此削弱中国的反日运动。^①

1929年1月22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此发出的照会毫无结果。外交部远东司认为,占领电话局不会是唯一的事件,中东铁路事件是与满洲的整个政局分不开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分析认为,苏联在满洲的整个权利和利益已开始受到威胁;警察加强了对中东铁路员工活动的监视,袭击苏联工会,大规模地开除哈尔滨的医院、学校等机构的苏联公民。

1929年2月中旬,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在通报中报告,满洲当局中的吉林派致信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С. Н. 梅利尼科夫,建议就调解有争议的问题举行谈判:关于中东铁路、苏满边界中国关税、滨海地区中国人的处境和满洲的苏联人处境,以及边境冲突等问题。梅利尼科夫声明,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举行谈判。

但是,由于满洲当局中亲张学良的人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并推行制造冲突和破坏关系的方针,谈判最终没有举行。

反苏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日、英、法等国加紧向中国政府施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第,全宗 0100,目录 13,案宗 156,卷宗 5,第 1—6 页。

加压力,以夺取中东铁路,取消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并扩大自己的影响。日本通过外国报界散布消息,说苏联打算向第三国转让中东铁路的权利。出于自身目的,日本希望能够得到中东铁路的南线,或者以某种形式管理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完全由中国管理未必对日本有利,因为那样它将失去在南满铁路的特权。同时,关于苏联转让中东铁路的传闻引起了反响,并进一步在中国人中传开。1月17日,国民党上海党部发表声明,呼吁公众要求南京政府立即购买中东铁路,否则中东铁路将落入日本人手中。上海一家报纸认为,这些传闻是苏联在试探中国和日本。而另一家报纸认为,苏联的确正在与法国就上述问题进行谈判,说1924年的苏中协定已经失效。这家报纸证实说,东北三省自治委员会一致同意张学良关于夺取中东铁路的建议。北京和哈尔滨的一些报纸则支持改变中东铁路的制度,要求任命中国人担任铁路主管,使用汉语为官方语言,并将苏联员工的数量裁减到30%。

1929年春,中东铁路局势更加严峻。中国人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当地报界在北满掀起了一系列反对苏联行政机关的行动,要求夺取铁路,强制购买铁路等等。这些行动,达到了为中方在中东铁路谈判中创造有利局面的目的。而此时,谈判已经在哈尔滨开始。

1929年5月27日,加拉罕接到梅列尼科夫的紧急电报,说当天有一伙警察突然闯进总领事馆大楼,并进行了搜查。所有工作人员被赶到一个房间里达6个小时,副领事兹纳缅斯基遭到暴力。尽管梅列尼科夫强烈抗议,警察还是逮捕了39名苏联公民,并进行了审讯。被捕人员中有中东铁路管理人员,属于总领事馆的物品、钱财和部分领事记录被没收,与总领事馆的联系中断。中国当地政府解释说:警察得到消息,总领事馆里要召开共产国际会议,他们进入大楼后,发现有一些外人和已销毁的文件痕迹。警察没有找到直接的线索,也没有道歉,只是官方出面建议不要将此事扩大化。

第二天,满洲当局外交官请梅列尼科夫转告苏联政府,不要将此事国际化,并声明说,这是吉林省张总督的愿望。梅利尼科夫认为,总督的道歉是真实的,因为,在主张坚决同苏联断交、争取中东铁路的支持者们与持相反立场的吉林派之间经常进行斗争。袭击事件是有预谋的,目的是要破坏中东铁路协议。1929年5月30日,驻奉天总领事H. K. 库北涅佐夫在哈尔滨被逮捕,但在莫斯科的强烈抗议下,他很快被释放。中国东北还发生过多起反对苏联工作人员的事件。

1929年5月29日,就哈尔滨总领事馆被搜查事件,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向中华民国驻苏代办提出抗议。5月31日,加拉罕照会驻苏代办,强调,哈尔滨发生的袭击苏联领事馆的事件,是在长期的反苏活动后发生的,其结果造成苏联在中国的领事机构无法正常工作。照会中还提到了1927年4月6日发生的袭击苏联驻北京使馆的事件,1927年11月7日发生的袭击上海总领事馆事件,1927年12月驻广东领事馆被毁事件。

不久,当地一家报纸《公报》刊登一则消息说,搜查到的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的文件证明,苏联打算把北满和中东铁路“共产化”。满洲的中外报纸大肆宣传苏联领事馆文件,巩固了政府内亲英反苏的右派的地位。他们想挑起蒋介石与冯玉祥争斗,果真蒋指责冯与苏联搞阴谋。

南京政府曾在5月31日致电驻莫斯科的中国领事馆,回复苏方5月29日的抗议。电报中引用了张学良提供的情报,说在苏联领事馆发现有50名共产党人在开会,总领事本人也参加了会议,还发现了宣传品。南京政府根据这些事实,不仅回绝了苏方的抗议,还指责苏联领事馆的行为破坏了苏中协定,表示保留进一步采取措施的权利。

6月初,开始传言,南京政府作出决定,断绝同苏联的关系,关

闭苏联驻华领事馆。后来这些消息未被证实。但是，莫斯科并没有排除南京在亲英派压力下作出这种决定的可能。

1929年6月7日，就中苏关系，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对新闻界发布了一番自相矛盾的谈话，但口气比较缓和、不确定。这次谈话表明，搜查领事馆不是在南京政府的授意下进行的，并表示，南京将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希望缓和苏中关系的紧张局势，但表示反对第三国干涉中国内政。

上述事实表明，不论是南京政府还是满洲当局，主张断绝和恢复对苏关系的两派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特别是满洲，这种内部争斗更具特殊意义，因为与苏联友好就意味着那些与哈尔滨事件有关的人是错误的。

侵占中东铁路和苏中关系的破裂

据中国报纸报道，1929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有蒋介石、张学良和王正廷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夺取中东铁路。7月6日，上海《国民》报刊登了王正廷的谈话。王正廷一改过去的立场，声明：“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时机还未到来。”奉天也积极行动。当时南京给予张学良这个反苏倡导者很大的权力，这位满洲领袖希望，夺取中东铁路将使他更加独立于蒋介石，更加巩固他在东北三省的地位。同时，组织夺取中东铁路的人员也清楚地知道，离开了外国列强的支持他们将一事无成。

美国积极参与中东铁路事件的离间活动。据苏联驻东京大使A. A. 特罗杨诺夫斯基提供的情报：“美国正以某种形式促使中国人夺取中东铁路。”^①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 0100，目录 13，案宗 136，卷宗 5，第 14 页。

特罗扬诺夫斯基还认为,当时英国也在这场冲突的准备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英国也想通过使中东铁路国际化得到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英国人自由地在中国其他有切身利益的地方行动,如西藏等地^①。

特罗扬诺夫斯基认为,法国由于与俄罗斯亚洲银行有利益关系,一直都希望摆脱沙皇时期的债务。因此,法国也希望苏中关系恶化,以满足自己的财政需求。

日本的对华政策自然主要是满洲问题。日本希望保持满洲现状。任何变化都可能破坏现有的平衡,引起难以预料的复杂局面。日本政府也不愿意美国在中国扩大影响。日本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制定了一套计划。中东铁路冲突的拖延有利于日本,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将更容易从奉天手里得到建设东北铁路的租让合同,并促使南京政府在签署商务条约的问题上让步。1929年6月6日,特罗扬诺夫斯基致信加拉罕指出:“不论从日本与美国关系的角度,还是从日本与中国关系的角度,日本的国际地位将促使它同我们改善关系。”^②

奉天政权在协调与南京政府立场的同时,在外国的支持下,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计划。1929年7月10日,在奉天当局的授意下,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遭到多次袭击,电报局被占领,商务代办处等其他机构被查封,与苏联的交通中断。随后,中东铁路中方理事长兼督办吕荣寰要求铁路经理 A. H. 叶姆沙诺夫把中东铁路局交给他任命的官员。第二天,吕荣寰向董事会成员发表声明,指出,最近5年来,苏方违反了1924年协定的条款,“经理及其助手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以及职工员额分配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现行制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46,目录12,案宗138,卷宗2,第5-6页,65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46,目录12,案宗138,卷宗2,第74页。

度遭到破坏。最近,苏方的违法行为发展到了极点。在苏联领事馆召开的会议表明,中东铁路大多数职工成为共产党宣传的积极分子。他们向工会施压,夺取中东铁路的权力……牺牲中方在中东铁路的利益。苏方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协定的各项基本条款。由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国家的政治制度受到了威胁,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威胁。”^①

由于拒绝执行中方提出的要求,叶姆沙诺夫、他的助手及其他管理人员被解职,取而代之的主要是俄国白匪军人员。200多名苏联职工被逮捕,其中包括经理在内的约60人被遣送回国。与此同时,满洲部队和白匪军沿苏联边界集结。据统计,这时中国东北有7.5万白匪军^②。

1929年7月13日,加拉罕向中国驻莫斯科代办发出一份照会,指出,中方的行为严重破坏了苏中现行的各项协定。“按照北京和奉天1924年协定精神和条款,中东铁路应由苏中双方共同管理。同时,中东铁路可在协定失效前或失效后以购买的方式归中国所有。但必须经双方协商同意。中东铁路督办的违法行为,实际上意味着夺取中东铁路并单方撕毁现协定。”1924年协定已就调解有关铁路争议问题制定了制度^③。

苏联政府在抗议中方违法行为、指出局势严重性的同时,仍然声明准备就中东铁路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谈判,条件是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苏联公民,并取消中方作出的各项命令。照会最后警告,如果三天之内,苏联政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它将被迫采取其他手段,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1929年7月17日,南京政府命令中国驻莫斯科代办向苏联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13,案宗157,卷宗21,第2页。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13,案宗157,卷宗21,第148页。

③ 1929年7月14日《消息报》。

外交人民委员部转交一份电报,指出,1924年以来,两国外交关系的确得到了“巩固”,体现了平等互利的精神。但是,最近,“苏联方面有煽动中国人民破坏中国社会反对中国政府各种有组织之宣传及工作”。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必要手段,以“维持中国社会之安宁”。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事件和奉天就中东铁路采取的行动,被解释为希望“消除破坏安全稳定的突发事件,因而政府被迫采取必要措施,同时保持了高度谨慎的态度,防止事态扩大”。电报还列举了中东铁路主管和其他苏方管理人员的“不法行为”,声明,违反苏中1924年协定的责任完全由苏联方面承担。

电报还指出,苏联安全机构逮捕在苏联的约二千名中国侨民和商人是没有理由的。中方认为,最近发生的逮捕苏联公民、关闭合资机构的事件“完全是为了消除反动宣传,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如果苏方按照中方的要求释放所有被捕人员,保证在苏联的中国人的安全,中国则可以改变立场,其中包括对待所有被查封的苏联机构的态度。

电报最后希望,苏联政府应“纠正以前的错误行为,尊重中国主权及其法律”,同时中方表示愿意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一起,在“公正、合法”的基础上解决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所有苏中关系问题。”^①

接到南京政府这份不能令人满意的答复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政府于同时,即7月17日,向中国驻苏代办发出照会。照会在原有的理由和论据的基础上,揭露了中东铁路事件的真相,引用了中国领导人蒋介石7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有关苏中关系的发言摘要。对中国政府在中东铁路事件中采取的行动,蒋介石辩解说:“我们采取收回中东铁路的行动,没有什么特殊用意

^① 1929年7月18日《消息报》。

……我们想先收回中东铁路,然后再开始讨论其他问题。”照会指出,苏联政府为调解中东铁路问题已竭尽全力,现在不得不“被迫采取以下措施,其后果由中国政府负责:

1. 从中国召回所有苏联外交、领事和商务代表。
2. 从中国召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全部职员。
3. 停止苏联与中国的全部铁路交通。
4. 命令驻苏的中国外交和领事代表立即离开苏联。”^①

同时,苏联政府声明,保留1924年苏中协定中规定的苏方所有的权利。

1929年7月19日,南京政府就苏中冲突“向各友邦”发表通报,就苏中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份文件仍然是老调重弹:“1927年苏联在中国北方和南方进行的许多阴谋被揭露,这表明,苏联政府利用在华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商务代办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并为旨在推翻中国政府的共产党人提供庇护,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中国政府被迫不再承认苏联大使馆和领事馆,并清除苏联的商务代办处。”

中国政府还把1929年7月13日苏联发出的照会评价为“不负责任的,其中列举的材料也是为了蒙骗国际舆论。”中国认为,最近发生冲突的根源是“苏联政府违反了中苏1924年协定,而不是中东铁路的问题。因为根据协定,中东铁路应当是一个纯商业公司……两国政府应避免在对方国内进行反对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任何宣传活动。但是,苏联政府破坏了这项协定,利用领事馆和铁路局,以及从铁路中获得的利润,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支持中国的反革命分子推翻中国政府,在东北制造动乱。这不仅粗暴地破坏了

^① 1929年7月18日《消息报》。

两国协定,而且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破坏了中国的主权”^①。

由于苏中冲突,根据苏联7月13日的照会,1929年7月,苏联关闭了在中国的总领事馆和领事馆,主要有:驻北京、天津、哈尔滨和奉天的总领事馆,以及驻满洲里、绥芬河、黑河、张家口、海拉尔和齐齐哈尔的领事馆。

1929年8月16日,苏联政府作出了中断对华关系的第499号决议,称:

1. 断绝与中华民国的外交、领事和其他关系。
2. 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部立即将此事通知中国政府。
3. 建议各加盟共和国政府,苏联人民委员部及其他相关机构,采取必要措施执行本决议的第1项内容。”

这样,夺取中东铁路最终导致了1929年7月苏中关系的中断。

(译自俄罗斯《近现代史》1998年第1、2期)

①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0100,目录13,案宗159,卷宗49,第37—41页。